

# 共产主义者

◀ 月刊第9期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2026.01

**革命理论**  
**中国农村问题**

**时事评析**  
**易力声的工人之**  
**声：加班的权利**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http://bolshevikleninists.com)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mailto:Leninists1917@proton.me)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统一的政治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世界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国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双手开拓的更美好的世界！

联系我们：  
[Leninists1917@proton.me](mailto:Leninists1917@proton.me)

# 我们是谁

官方网站：  
[bolshhevikleninists.com](http://bolshhevikleninists.com)



# 《共产主义者》

官方YOUTUBE中文播客

- 总结历史
- 学习理论
- 时事评析
- 文艺评论
- 组织建设
- 政治/生活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 时事

I	《芳华》解说爆火：反建制思潮的解构寄托	05
II	南京大屠杀 88 周年的反思——何谓和平？	08
III	易力声的工人之声：“加班”的权利	15
IV	评中国最新吸毒档案封存	20
V	江苏科技大学的学术造假	24
VI	不眠的斗争之夜：长沙骑手深夜的车水马龙	27
VII	郟城一中：屡禁不止的校园霸凌	33
VIII	澳大利亚枪击事件：从阴谋论到民族叙事的瓦解	35
IX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真帝国对阵假革命	41

49	阶级观与共产主义	X
55	共产主义队伍内如何处理“懒惰”	XI
58	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革新与坚持	XII
65	我们不该以什么心理参与革命？	XIII
68	“我都懂，但没用”：犬儒如何吞噬左翼的行动力！	XIV
73	我们的建党路线与“左圈”	XV
80	新知识运动指南纲要：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美国篇）	XVI
90	中国农村问题	XVII
116	战争不是意外：帝国主义危机下的全球冲突与反战觉醒	XVIII

# 理论

# 《芳华》解说爆火：反建制思潮的解构寄托

作者：原上风



近段时间《芳华》解说视频在国内视频平台大火了一把，随之而来的是王洪文同志、四人帮和文革至改开期间相关的信息以谜语故事和黑话的形式在年轻人们最常关注的各大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的热度确实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往只是在网左小圈子中流行的梗和故事这次却前所未有地吸引了本来网左圈外的人。不得不承认，这种浪漫化的叙事手法确实正好能够填补上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那段历史的认知的不足，并且以这种类似民间故事般流行的方式博得大部分人的眼球。

究其原因，中共本身对于这段历史的遮掩和片面叙事是人们会对其好奇的前提。不论是在初中或是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上，基本对文革到改开为止的历史都是尽量一笔带过，这毫无保留体现了中共作为一个官僚化严重且根本上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政党在历史叙事这方面的避重就轻。这是由中共这种国家官僚政党机关其本身的性质决定的。随着现在社会问题频出，经济下行，改开所做出的承诺迟迟没有兑现，政府宣传的话语一次次沦为空谈，反倒是官僚主义四处横行，裙带关系、形式主义等真真正正发生在每个人身边，人们意识到中共的虚伪，同时对中共的信任程度骤降。由此，人们自然会或多或少怀疑国家宣传机器说讲的每一件事。再加上中共自己的

宣传者，从专家到普通老师基本上对于文革都是谈虎色变。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引起了人们对于中共原本叙事的怀疑，从而追求另一种更能让自己接受的叙事。于是部分比较先了解到这段历史的人在自己的摸索中得出了一种通俗化的叙事，在线上线下将这段历史又分享给其他人，这种带有逆反心理式的故事流行是人民大众对于当权的一种消极反抗，一种对官方权威主流叙事的挑战。我们熟知的网左群体便是仅停留并只满足于这一步的人。在以往我们经常能看见网左与嘲讽网左“放暑假了”以及一大堆网络各式政治意识形态的人在网左上争得不可开交，可这一次《芳华》解说视频在简中互联网中带来的却几乎是网左的大获全胜，无数本不了解的人被这些谜语故事所吸引，甚至当人们在线下都会将这些话题当作茶余饭后的闲谈内容，人们（大部分是青年人）对于参与政治生活的诉求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增加，正如网友们自己调侃道的“全民大键政”或“觉醒年代”那样。同样，这也反映出中共管理下的权力与广大人民群众断层到了什么地步。



### 英雄史观在分析历史问题中是不可取的

网上流行的浪漫化叙事通常只停留在那么几个关键人物身上，从毛泽东、四人帮再到叶剑英、邓小平，在这种故事化的表述中充斥着英雄史观，仿佛只要王洪文当时不去开会或者把“党内走资派头头”邓小平给拉下马，当下的一切社会问题压迫剥削都会迎刃而解，或者至少劳动者会得到更多权利。然而历史不是由几个人物决定的，而是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再者，这种叙事缺乏一种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清晰且客观的认识，将一场为解决资本主义复辟而发动的运动片面理解成了毛泽东与党内走资派的斗智斗勇的故事，文革期间的工人造反派运动始终不是一种独立的政治运动，地方工人权力机关缺乏可以控制的工人武装，并且也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工人民主。如果只是对于当下感到不公而盲目地呼吁要再次发动文化大革命，而不是以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吸取其历史经验教训，那么无产阶级解放的事业依然没有推动。对于文革的详细分析可以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事实与教训](#)这篇文章。

对于大多数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来说，在经历了生活的不如意之后，用这种解构的方式来调侃、消极反抗当权以娱乐自己或表达自己对领袖的敬意以及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追求确实是再方便不过的办法，但对于所有不满足于做空想家，想要切实为共产主义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来说，这肯定是不够的。我们不能够一边喊着“学习他，成为他，超越他”，一边将毛泽东放在不可置疑的神坛。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将自己束缚在宗派主义的观点内。不认识到革命者自身的局限性，怎么能进一步推动革命事业的发展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神化任何一个为全人类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革命者，相反，我们要批判吸收革命前辈的身上的经验，也只有这样我们才真正成为他们的继承者，成为共产主义者。希望各位同志不要为当下的革命困境气馁，不要将自己对人类解放事业的追求只满足于调侃娱乐等非严肃性的行为，不要将自己束缚在革命前辈的流派之内。未来的革命事业需要你我每一个人去建设，就此行动起来，学习他们，成为他们，超越他们！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II

# 南京大屠杀 88 周年的反思——何谓和平？

作者：梧叶



12月13日是“国家公祭日”，中共会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举行仪式以纪念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在庄严的气氛下，大多数人对其的了解，除了三十万的人数与日军的残暴之外，似乎就没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影视的宣传或许还会在这一认识上添加日军的新闻战、安全区等等。事件本身被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方式宣传着：被侵略者与侵略者、无辜与恶意、人民与军国主义、手无寸铁与长枪大炮、中国与日本。对历史的建构总是指向当下；不过，先让我们看看历史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这样我们便能更好地了解它如何为现实服务。

## 面目模糊的大屠杀

不过，先需要声明：我们准备在考察的过程中，暂且搁置道德因素对考察本身的影响，以免有人从道德的角度揣测我的意图。道德好像一条绷带，人们用它束缚住伤口，使得话语体系看起来更加自洽；但是当理性的解剖刀将伤口重新暴露出来时，我们才会发现，这条绷带完全没有促进伤口的愈合，只是遮住了伤口而已。伤口一经暴露，老旧的绷带本身就显得多余而无用，因为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能解决病痛的药，而不是自欺欺人。



民？可见，这种逻辑还是有不足，因为它最多充当一个口号，但是还不足够充当一个科学的结论，它还没有跳出道德评判的窠臼，只不过是“人民群众”“脱罪”而已；但仅仅从这个结论中不能得出任何有益的信息。

重新审视大屠杀，我们首先发现它至少需要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1）绝对的权力。这点已经由日军占领南京城达成了。（2）严密的组织。没有组织的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而军队恰恰是很严密的组织（虽然日军的军纪并不是很严明，但这不代表当时的南京是完全混乱的，许多文献都承认，南京大屠杀是明显的有组织的屠杀而不是单纯的士兵失控，否则不可能持续六周之久）。（3）屠杀者认为需要进行屠杀，在这里主要是为了使中国人感到恐惧、瓦解中国人的抵抗意志，不过就现实来看，它适得其反。

屠杀者如何成为屠杀者？在这里或需要指出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即执行大屠杀者实际上多是“正常人”，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精神层面。甚至连纳粹的党卫军都适用于这一点，因为“不正常的人”反而有可能破坏组织。社会心理学家斯坦利·米尔格伦曾进行著名的电击实验，发现只要有适当的引导，特别是在权威的命令下，人很可能会做出超出他们道德判断的事，因为他们认为责任不在自己而在权威。表现在日军身上，就是军官会要求下级进行“杀人训练”，去杀死那些手无寸铁的平民，以此不断克服他们“动物性的同情”。此外，丸山真男还指出，日军的暴行还与日本社会特殊的道德观念相关：战前日本个人是被忽视的，天皇被视为“绝对价值”，个人只有对天皇实践“臣道”才能体现出价值。官僚制与这种绝对价值的结合导致压力与责任层层传导、转嫁，最终落到每个最底层人民的头上。他们要么“下克上”，但这种反抗在天皇观念的刻意引导下很难走向革命；要么就只能对“敌人”施以暴行以保证贯彻“皇道”了。日本统治阶级塑造的文化霸权中对中国人的系统性丑化与本质化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中华民族被视为低人一等的种族，这也增强了屠杀者的“正当性”，减少了他们的负罪感。

当然，迫于“道德”的因素，关于南京大屠杀这些现实性的讨论很少曝光在公众视野下。中共大概只愿意让无产阶级相信，参与侵略与屠杀的日本人一定都是“人面兽心”，在本质上就把日本人非人化；这倒是和日本帝国把中国人称为“支那猪”产生了奇妙的共鸣。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当时的日本进行一个更全面的考察。

## “分散”的帝国

关于中共宣传下日本形象的构建，有一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九一八事变、成立伪满洲国、七七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描述它的时候都会加上一个定语，“蓄谋已久”。这个词语用高度的凝练规避掉了战前日本社会的复杂性。对近代日本的情况稍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日本实际上形成了“双重外交”的态势，即军部与内阁的意志很多时候并不统一。无论对朝鲜的侵略、干涉内政的行为还是在中国侵略战争的最初发动，都和军部中下级军官的“独走”有关。由于理论上军部有直接向天皇上奏的权利，因此军部经常先斩后奏，以逼迫内阁同意它的战争计划。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是，在关东军把溥仪接到奉天后，甚至还没有确定即将成立的伪满洲国的国体是什么。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也是典型：当内阁还在讨论如何“限制冲突”以保证在国际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地位时，边境的军人已经踏入了国界的另

一侧，悍然挑起了战争。

这个事实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战后责任认定的困难。相比于纳粹德国对自己行为目的、过程和目标有着明确认识与严格执行，日本在战争问题上则是混沌的，或许大多数的势力都在期望着战争，但对于是不是应当现在进行战争、应当在多大规模上进行战争、应当最终得到什么结果总是在相互争吵。结果，在战后审判时，相较于纳粹对责任的承担与自己行为正当性的辩护，日本几乎没有人承认自己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为自己是被“推着走”的。他们的最高领袖是天皇，任何正式的国家行动都会以天皇的名义进行；但天皇又不承担任何责任。他们平时作出政治家的样子互相辩论，一到承担责任时又变成了“只是服从命令的官僚”。

可以做一个最粗略的划分：战前，日本的中央政府，除了军部，往往并不主张如此快地出兵；中下层军官和小资产阶级由于右翼意识形态的影响，则是战争的狂热支持者。战争爆发后，日本需要建立总体战体制，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近卫文麿受到纳粹德国启发，曾计划建立一个“一党一国”的“大政翼赞会”，以实现“同志式的结合”，达成“全体一致”，但是各方面的利益集团（包括政党、财阀、官僚、军部）并不因此就结束对立，结果不了了之。当时的日本想要进行总动员无法仅仅依靠一个代替议会的组织，而必须要依靠地方官僚和农村的“名望家”阶层（往往是地主等）。

与这种情况相适应的是右派运动的零散性。战前日本是法西斯主义吗？事实上很难这么说。法西斯主义运动往往发生在失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后，法西斯党以“真正的社会主义”和“无产者阶级的代表人”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又利好资产阶级。可是当时的日本几乎没有产生大规模的左翼运动。日本共产党不断遭到检举与警察机构的破坏，连许多党员都转向了国家主义；作为工会党的社会民众党更是打出了“反共产主义”的旗号，在战争爆发后支持总体战体制。在许多右翼的意识中，工人阶级也是被极度轻视的，倒是有着极为浓厚的农本主义。民间运动还由于较为专制的社会体制不能经常扩大，必须在军部中找到自己的代言人；但下层青年军官每一次试图政变都是加强了既有的政治势力的控制力。政府依旧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多方势力的大杂烩。这样，整个日本民间的右翼运动就变得五花八门，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趋势与可能性，最终也只是加强了政府的力量，延续了这个体制。

正如上文提到的，真正的左翼在日本战前的政治生态中是缺位的，日本共产党没有承担起把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统一党内思想教育的任务，使得面对经济大危机的凋敝时，民众想要改变、想要行动起来时，甚至几乎没有左翼的可选项。他们有着模糊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反政府情绪，但统治阶级文化霸权的灌输却把他们的情绪导向了军国主义、“精神主义”（既拒斥物质文明，认为东洋精神才是最宝贵、最有价值、最值得争取的）的意识形态，并且也正如上文所说，完全没有达到改造日本的结果。总得看下来，天皇意识对民间运动有着极大的制约，因此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必须把反对天皇制作为一个中心任务，才能引导群众的情绪走向真正的革命。当日本的共产党决定放弃反对君主制时，也是日本左翼运动失败的一个标志。我们知道，日本的无产阶级同样地也是中国的无产阶级的同胞，可是他们却由于日本特殊的社会政治结构走向了支持、至少是配合与默许战争，可见一个共产主义政党的重要性。



### 战时日本对全社会的总动员

因此，假定日本全国是一个邪恶的“大本营”，一个步调一致的战争制造者，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近代日本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前现代的机构与思想，并拖着这些累赘成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国内政权取得了一席之地，再加上对外扩张政策符合其利益，几乎没有设想过进行彻底地资产阶级革命，从而一直与地主与官僚的势力同流合污。工人阶级由于共产党的虚弱并没有形成气候的运动，使得右翼占据了民间的政治生态位。农民人数一直占据人口的一半以上，既是最大程度地保留着前现代特征的群体之一，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损害程度最大的群体之一。他们的诉求在地主、政党、财阀、官僚那里都看不到，只能借着军部以曲折蜿蜒和被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军部曾假惺惺地表达对补偿农村的支持，并以此获得了大量支持，取代政党成为政府真正的掌控者，并成为侵略政策最暴烈的执行者，成为社会危机以最坏方式解决的持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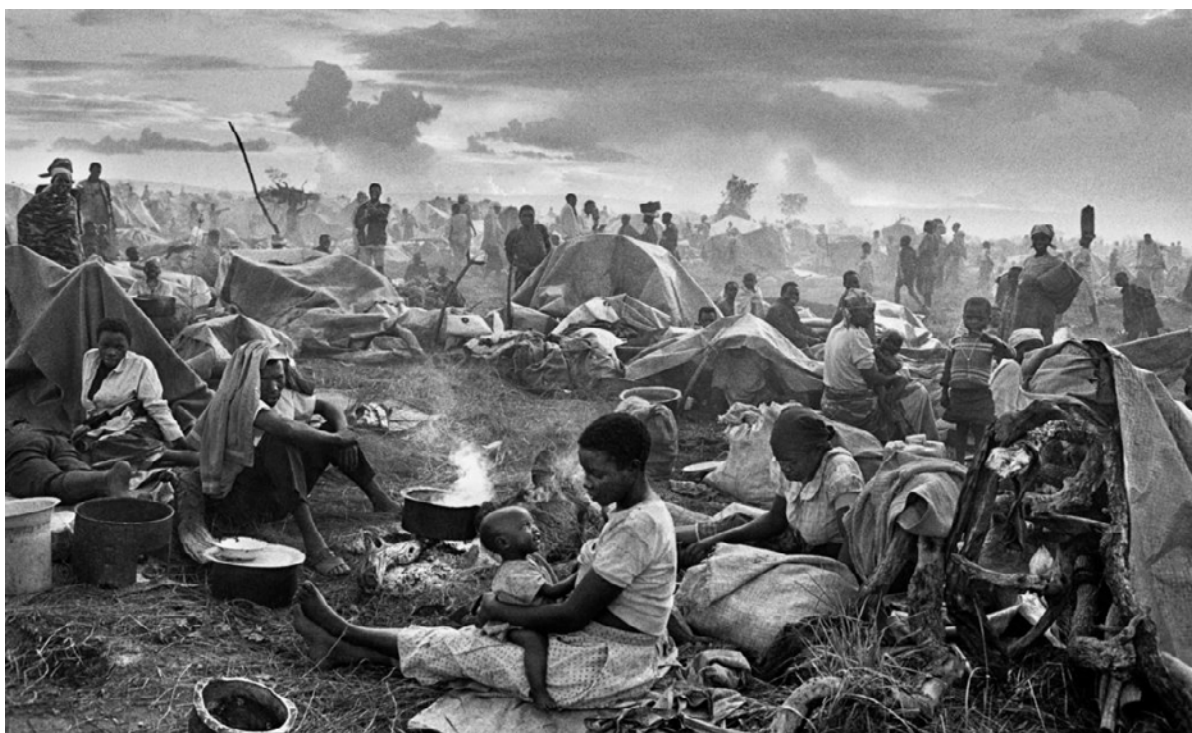
很明显，这一系列的历史过程以“蓄谋已久”来表述存在着很大问题，它忽视了日本内部的复杂性，把一个在人们意识之上以客观规律显露出来的历史进程说得像是一个人的主动的决定。很显然，这种说法仍旧是意图让人们从纯粹的道德视角来审视这个问题。这么看，仅仅说“日本的人民群众是无罪的”也是肤浅的，这种说法也只是在道德的层面上主张自己的观点，从而只能是无力的回击。如果要提炼一个能成为口号的、足够简短的表述，我认为可以是“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没有完成应有的历史任务”。

## 南京大屠杀叙事与“战后时代”的虚妄

如果把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看作一种“义务”，那么显然是忽略了一个事实：南京大屠杀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三十多年中几乎完全淡出了公众视野，偶尔几次提到也是为了批判美国对日本的再军事化。在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想时，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克制尚且是有可能的。

但到了80年代，思想的“放开”使得南京大屠杀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首先是民间的纪念运动和向日本索赔的运动，随着官方对这种运动的肯定乃至鼓励，南京大屠杀迅速在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的诸多战争罪行中突出出来，并成为“国耻”之一。1985年，大屠杀纪念馆建成。有关从南京大屠杀中得出的启示，最多的是“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和平是好的、战争是不好的，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价值判断，但是它忘了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有战争？是的，军国主义右翼对发动战争负有很大责任；但不是说几句“不要右翼”“反对战争”他们就会自动消失。因此，表面的珍爱和平实际上指向了对右翼的批评；但只是对日本的右翼的批评，因为中国一直被它自己塑造成“和平之邦”。这种意识深处的中国特殊论隐藏着分化不同国度的无产阶级的可能，并将口头的和平转换成实际上的国家之间的相互对立与战争的可能。

这些纪念运动想要被认为是有意義的，就必须有一个前提：和平依靠宣扬和平的观念就可以保全。但即使战争是“不祥之器”，也有“不得已而用之”的时候。比如国与国之间的恐惧：以一战为例，当时双方最开始都还没有做好打欧洲大战的准备；但是一看到敌方进行了动员，为了防止自己被敌方击败，也必须进行动员，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两大集团之间的对立，最终走向全面的战争。战前日本也一直有“满蒙线就是生命线”的说法，日本统治阶层一看到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就会担心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受损，从而在地缘政治上落入不利的地位。在这里，要消除战争，最重要的不是“消除国家之间的‘误解’”，因为那事实上就是绥靖政策；产生战争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互相对立本身。一个主权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与自己的阶级统治，必须要有军队，而这种军事实力往往同时也是对外扩张的工具，其它国家侵略或者侵犯其利益的可能性又更进一步论证了保有常备军的合理性。要消除战争，最终必须消除国家与常备军。



大屠杀从未终止（图为1994卢旺达大屠杀）

国外一些学者也对南京大屠杀重新发掘，并将其称为二战三大惨案之一、“人类文明的污点”。这里蕴含着这样一种观念，好像战后时代这种污点越来越少了，至少是在“文明国家”“现代国家”越来越少了。他们把文明的过程看作同时也是暴力从社会生活中消除的过程，但这其实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每当阶级斗争激烈到一定程度，暴力就会出场。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依旧在不断地以战争手段维护自己的全球利益。日本也并不因东京审判和修改宪法而完全消除了自己的反动性质，不仅仅是因为右翼的残留，还因为日本由一个半前现代半资本主义的国家转换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处在阶级社会。因此，要摒弃那种“二战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的看法，如果说法西斯是邪恶，那么抵抗法西斯的资本主义国家也称不上有多么“正义”。中国抗战的正义性也不只是来源于反对侵略，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战争的过程中带来了共产党对人民的组织与战后进行革命的力量准备。

战后世界绝不是什么战争逐渐走向消弭的世界，绝对不是什么所谓“和平与发展”为主流的世界。现在全世界右翼势力抬头、中美帝国主义之间互相博弈、民族主义思想泛滥，这都是实际的可能导向战争的因素。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一天，只要无产者之间的相互分裂与仇视还存在一天，只要国家与常备军还存在一天，这种可能性就永远无法消除。关于那种浮在表面上的和平主义的谬误，可以参考这篇文章（[人道主义与和平主义 - 共产主义者](#)）。因此，“愿世间和平”不是一群人在网络上发几条评论就能达成的，它需要我们作最现实的斗争，用无产阶级的革命回答所有隐藏着战争可能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要做的远不止纪念死难者，还要建立最彻底的工人民主使得一个“集中所有权力”的情况不会发生；用无产阶级本身的武装反对所有试图发动战争乃至屠杀罪行的统治者；用无产阶级的组织与联合反对所有试图用民族仇恨分化无产阶级的野心家；用革命反对发动战争的反革命！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III

## 易力声的工人之声： “加班”的权利

作者：成梦



行将就木的夕阳企业妄图在日益颓靡的中国经济环境下最后再扯上一批垫背者，而工人阶级不会坐以待毙。12月4日爆发至今的斗争浪潮清晰地给了那些试图把工人阶级视作软弱、无知、不成熟的迷途羔羊的评论家们有力的一击。

### 易力声的工人之声

早在10月，易力声就全面废除了加班制度，并在11月宣布将会贯彻这一确保“五天八小时”工作日的措施持续至2026年3月底。作为千百年来社会主义运动所争取的对象，八小时工作制这一改良性的措施，在当代与其他任何改良措施一样，不过是最后一次革命变革所给予历史的推动，在它身上还发生作用的方向上和时期内进行的。资本的利​​益就是改良的自然界限。

因此，看似是八小时工作制得以贯彻的表象背后永远深深掩盖着资产阶级最恶毒的企图。工人们发现自己**必须在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完成此前十小时的工作量**，工厂

的机器还在不断被往外搬迁。此外，由于过低的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加班费就意味着工人无法在低的可怜的工资之外获取更多可供糊口的钞票，就意味着他们将在拿不到补偿金的情况下自己乖乖地离职和忍气吞声继续在流水线上无望的“奋斗”之间做出选择。然而，易力声的工人们毅然选择了第三条路，他们用行动宣告：两害相权取反抗！



### 罢工的信息在社交媒体上快速传播

早在罢工前，先进的工人们就已经在私底下开始了微信群的组建，在积极工人的鼓动下，罢工的意识如野火般传遍了厂区。他们热切地讨论着其他厂罢工的消息，有意无意地提到罢工的可能性。对于12月不加班的员工发放200-300元的一次性生活补助的杯水终究没有浇灭易力声工人們的怒火。12月4日上午，罢工最终爆发了，数千名工人聚集在工厂大门附近，对拉货车辆进行了阻拦。工人们提出了明确的两个诉求：**支付赔偿金，恢复加班。**

不需要经过什么分析与思考就能够理解赔偿金对于工人們的意义。易力声为了规避平均每人数万的赔偿金，取消加班并靠过低的工资逼迫工人們自我离职。但对于恢复加班的诉求，许多报道和评论都陷入了一种奇特的狂热：严厉地批评工人們的落后，因为他们居然“帮助资产阶级”，居然当“工贼”，居然要求“加班的权利”！

## “加班的权利”

今日易力声的罢工，并不是什么让人“颠覆认知”的崭新情况。去年4月26日，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的无锡工厂约2000名工人就举行了这样一场罢工。由于订单不足，公司决定从5月1日起给无锡工厂的员工放一个“无薪假”，工人认为公司此举是变相裁员、用低薪造成的经济压力逼迫员工主动离职同时不需要付出成本，便进行罢工要求适当补偿。

对于很多中国年轻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只从陈旧的理论书中学习了阶级斗争的道理，却从未真正关注过近年来中国工人阶级的情况，更不清楚他们采取过的各种行动。他们在听说工人阶级因为“工时不够”而进行罢工，要求“加班”时，就做出了非常滑稽的暴论：

**“这些工人都是工贼！被洗脑的反动工人！”**

我们可以看出抱有这种思想的青年是多么地不食人间烟火。他们从书中学到，工人阶级过劳、遭受剥削，历史上共产主义者都在为减少工时而斗争，高喊“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觉，剩下八小时留给自己”的口号，于是便在听到不符合“教义”的新闻后，不经调查、不经思考，拿着片面的信息，给工人群众扣上帽子。这种将革命队伍和群众自我隔绝的宗派主义是不可取的。

共产主义者怎样看待这样的现象？我们说，不是从意愿的立场出发对群众运动作主观判断，而是从历史必然性的立场出发、以群众运动于其中产生并发展的具体的社会因素为根本对群众运动的根源进行客观考察。在预设一个工人本该采取的标准行动之外，我们必须意识到工人阶级总需要吃饭。当下中国经济下行、需求不足的环境下，工厂为了降低成本、缩减生产规模，都纷纷将厂区搬迁到中国帝国主义影响的落后国家以剥削“廉价劳动力”，同时在国内关停企业、大量裁员。为了避免裁员导致的开支，资产阶级厚颜无耻地用生存压力逼迫工人主动辞职，将被迫、无奈的离开包装为“工人自己自由的选择”。在这种朝不保夕的时刻，每位劳动者首要的诉求都是保护自己仅有的饭碗，而不是成为失业者被无情地抛到大街上。更何况，留在工厂共同进行罢工斗争的工友越多，公司直接开除罢工工人们的压力就越大，罢工斗争就越不容易遭到轻松的镇压。但很明显，对于部分“共产主义者”来说，工人阶级要求工作而不是怠工在他们那里是“破坏规矩”的。

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来不只是抽象的“工时长”，还有实际工资和工作环境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同时考虑三个因素。就像是这次罢工，工时减了，而工资却少了，那么这对于工人们显然是更差的处境，因为这也很可能逼迫他们同时有两个工作，这显然会让他们体力透支，并活的更像一个牲畜而不是人。

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日益展示出了自己走向成熟的探索，而共产主义者决不能不负责任地否认这一点。在专制的政治环境下，任何将斗争局限于局部的经济斗争的企图都将在事实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府面前碰壁，群众将意识到政府究竟是谁的政府，而这正是他们从朴素的经济主义倾向走向激进的政治口号的契机。

对工人阶级在难以忍受的压迫下采取的措施的评价，只有在摒弃了道德说教式样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在于：这样的行动是否符合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是否有助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即使这样的斗争意味着自发性，意味着不是经过中央委员会的密谋和精密计划，而是无产阶级在为自己的权利甚至生存而战的情绪和历史必然性的自然反映。毕竟，无产阶级只有在伴随着夺取政权而来的那种政治危机的过程中，在长期顽强斗争的烈火中，才能达到足以完成最后的伟大变革所必需的政治成熟程度。先验地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评价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即群众运动，并试图以机械的模板修剪阶级斗争本身的反映，事实上恰恰就是对无产阶级运动本身的反对。

先锋队即革命领导的危机已在工人运动乃至无产阶级革命的危机中格外地凸显出来。

## 工人运动的瓶颈在于何处？

每一次工人阶级进行大规模动员之时，在互联网上我们能看到各左派组织对其进行追踪报道、大力声援。这是真心关注中国工人阶级现状的革命者们的一种自然而本能性的驱动，但在很多情况下，它被仅仅当作了一种常规和边界来遵守，而无视了根本上必须要进行的突破。

“声援”，我们的声音要让谁听到？很明显，互联网（尤其是外网）与罢工运动的直接联系是很弱的。互联网本身不足以构成和工人的高效沟通，如果我们的“声援”是想要振奋工人的士气，那当下所做的完全不够，更不用说工人阶级光有了“士气”也不足以确保行动的胜利。那莫非，我们是想让中国政府听到，威胁他们不要动工人阶级一根毫毛？那也很明显是苍白无力的。



共产主义者必须坚决地走到工人中去

我们不需要更多的空谷传响了。我们不能也不该日复一日就停留在这个无能的阶段，眼睁睁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工人一次次奋起反抗，而革命组织只能在暗处躲藏着、呻吟“工人运动万岁”。声援的声音需要被听到，更需要起到实际的作用。为了建立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仅仅在某个角落里成立它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在某个角落发出自己的声音是远远不够的。无论面临什么阻碍，都必须找到一条通往群众的道路：必须坚决地到他们中间去。

停止那自我感动的“革命声援”！现状已经很明显地暴露了两个问题：一个革命党的缺失让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无法针对突发的社会运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介入；一个全国性地下网络的缺失，让革命者只能隔着手机屏幕臆想“工人工作”，无法抓住身边的机会，进行领导。运动乃至革命的主动权决不是靠着自欺欺人等来的。如果革命事业要前进，如果要使无产阶级夺取胜利，如果要使社会主义不再是一个梦想，那么就必须建立一个跟得上时代、懂得引导和运用群众的战斗能力的领导机关。

在任何一次革命中，只有那个有勇气提出向前推进的口号并把它贯彻到底的党才能掌握领导并且夺得政权。任何直指旧社会生产关系本质的运动都意味着一场场反对最赤裸裸的形态的资本统治本身的雇佣奴隶的起义。它就像天空中带着迅猛的自然威力的暴风骤雨一般爆发出来。这时候，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只有一种选择：要么是走在洪流巨浪的前头，要么就让风浪抛到一边去。

我们坚决地支持易力声工人们勇敢和果决的罢工。除了口头声援之外，我们更要求建立革命党以不辜负时代的浪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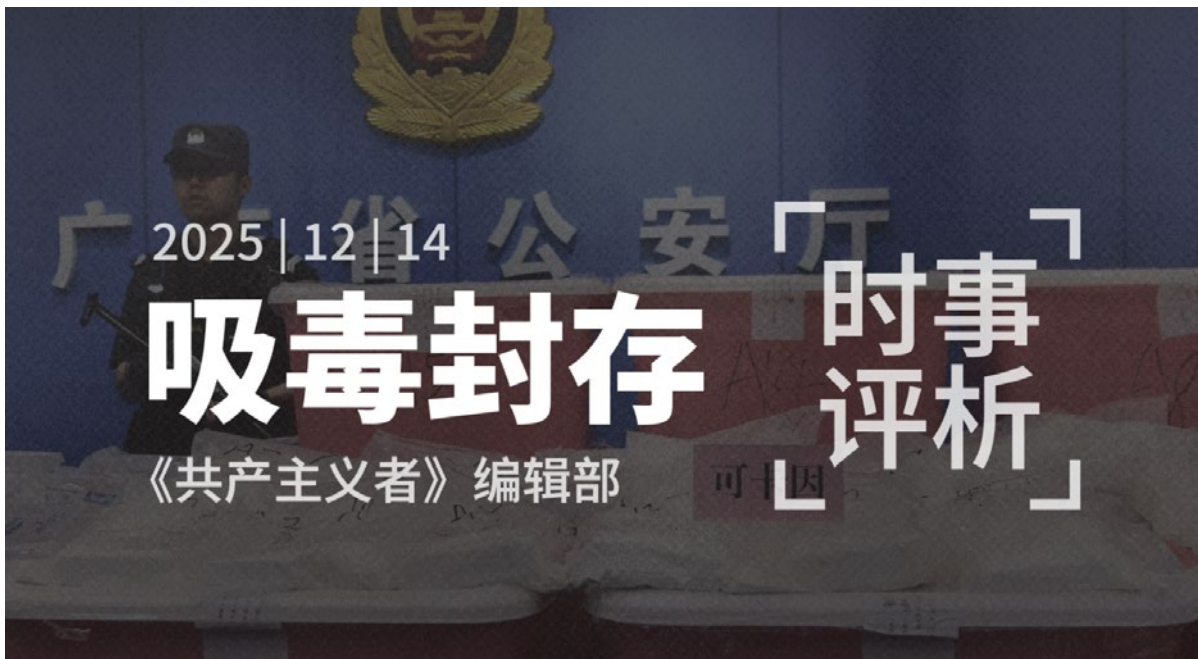
帝国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世界已经走投无路，他们的陪葬品只会也只能是无产阶级身上的锁链。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正以自己的语言呼唤着一个坚强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党，而革命等不了太多时间。我们的结论简单而不曾改变：必须用十倍的精力去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先锋队。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IV

## 哪位“少爷”将权和钱想疯了？—评中国最新吸毒档案封存

作者：仁菜



这两个星期，中国官媒的消息点燃了全网的舆论，根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从2026年1月1日起，“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其中包括吸毒行为——的封存将覆盖全部年龄段，区别于过去仅未成年人。“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记录应当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或者公开，但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违法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而“南通文旅”这一官媒更是在一个普法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哪位少爷又吸了”，结合12月初需要进行政审的全国公务员考试，网友们纷纷开始留言抵制新法案的施行，最近更多人甚至扬言明年的元旦要再到天安门游行，抵抗新法案。

民众对毒品和吸毒者的抵制是出于最基本的、最朴实的判断，因为毒品无论是天然的（如大麻与鸦片）还是化学合成的（如麻古、冰毒和可卡因）对人与社会所造成的伤害都是巨大的，吸毒的人不仅会因为毒品上瘾而不断的掏钱购买毒品，甚至在没钱时进行打，砸，抢的活动去掠夺钱财，这在一些毒品合法化的国家并不少见，

毒品不仅会摧毁一个人的身体，更会一步步的摧毁他的心智，让他们与社会脱节，而被社会的忽视和越来越依赖毒品带来的愉悦则会更加让他陷入吸毒的泥潭中。同时，吸毒现象背后的毒品行业也是完全由强迫劳动、腐败、利诱、走私、帮派和各类犯罪编织起的一张网，如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和朝鲜的边境地区就多次出现毒品走私团伙和缉毒警察的火并情况。2020年6月24日，云南省公安厅就曾公布过边境地区警察与毒贩交火的执法记录，同时中共的宣传机器也反复强调：“吸毒者在毒品上消费的每一分钱，都将成为打在缉毒警察身上的子弹”，这一长久以来的宣传策略也和本次的处罚法修订形成了概念上的冲突。就这一问题共产主义者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反对吸毒、毒品贸易和一切与毒品相关的犯罪，我们更不允许将“吸毒”这一行为轻描淡写地忽略。



### 中国军警机关正在检查其查获的毒品

不过会有小粉红们和中共的支持者反对我们，他们会照抄官媒的解释，说：“这是给那些吸毒者的改过自新的机会，更是能够体现我国人文关怀和社会关怀的表现。”诚然，很多吸毒的人可能是因为不小心落入陷阱或是因为生活苦难和未来无望而选择靠毒品安慰自己。我们也应该给予他们认识错误，弥补自己行为的机会，很多吸毒者往往也是流氓无产阶级，他们与社会的脱节和自封自闭的情况也是我们应该去引导的。社会主义下的社会制度将通过建立科学的社会机构来完成对吸毒者心理上和生理上的戒毒，以确保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解放不会落下任何一个受旧世界荼毒之人。

但是，中共是这么想的吗？中共的想法果真是像官媒说的一样那么关怀底层人民，这么有社会关怀的吗？我们的许多文章都曾揭露过中共的本质——一个疯狂的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资产阶级官僚政党，他们做的一切的一切，只在乎一项东西，那就是这件事情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少的利益，他们与那些无底线的追求利益的资本家和“自由市场”一样，只要能对他们产生利益的，即使会毁灭自身也要达到，何况一个小小的封存吸毒记录的法律呢？那又为何，中共明明一直宣传自己是一个公正的

“禁毒国家”，甚至常常要搬出如林则徐这样的禁毒英雄标榜自己的民族历史，却又要今天冒着风险将无数的失去理智的吸毒者放入市场和社会呢？

我们很清楚的是，中国目前的就业环境并不好，大量的就业岗位已经饱和，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又缺少相对人才，但以往一些仅靠大量人工生产的（如电子厂等）的企业都被持有新科技的公司所挤压，导致企业利润下降，发给工人的工资减少，也因此大量的劳动者不堪忍受恶劣的工作环境和薪资，导致劳动力离开了企业和市场。但长此以往，没有多的廉价劳动力流入市场，一些中小企业也必定会破产和倒闭，既然他们不愿意提高工资去招聘工人们，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招聘那些与社会脱节者。中共也不愿意看到大量的中小企业倒闭，中共还需要他们维持自己政权和利润的基本盘。因此，让大量的社会脱节者进入市场一定是最好的办法。一方面，这些人愿意以低的薪资进入企业工作，因为他们别无工作可选，另一方面，中共也可以借此宣传自己的“亲民”形象。

毒品档案的封存可远不止能带来这些好处，这几天就有言论在网上流传：提议建立毒品档案封存的人是某位高官的儿子，并且他也有吸毒史，虽然目前已经被证明为谣言，但我们不妨想想，当吸毒史被封存，一些无法无天的官二代花花公子是否又能在违法乱纪上再进一步？就算他们吸毒，到未来可能都可以依靠“封存”，继续花天酒地。再进一步来讲，毒品交易的利润也是巨大的，倒卖毒品是否会有官员也在其中获利？这些一个个问题我们又不得而知了。

当然有些人会说明，记录封存仅仅只是不向社会公开，如果单位依据法律规定需要排除掉吸毒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人，就可申请查询。只不过查询之后，也不能泄露出去。所以并非高枕无忧没有影响。但对于那些权贵们，就算“依法查询”，他们是否能“依法执行”将其开除呢？对于群众来说，今天中共政府的公信力已然是让他们面对这个问题选择了否定的答案。

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深知只要统治阶级仍然凌驾于人民头上一天，只要现实的实际的压迫和剥削没有消灭，那么所谓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教授们的好听的屁话——人们的社会地位和所支配的经济、社会资源等等是如此的悬殊，所谓的“形式平等”又任何意义吗？更何况封存后群众将失去任何的对其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这样巨大的不信任和恐慌感也推动者舆情的持续发酵。

我们应该做的，是跳出所谓“法律该如何制定”的思维怪圈，因为他始终只是在现有的资本主义秩序内打转。我们认为，只有彻底的废除私有制，建立起无产阶级民主下的计划经济，对一切的从原料到产品的加工等环节进行完全的公开透明，由人民组建的例如消费委员会或是工厂委员会等进行生产的控制，使得毒品生产从源头上以及市场流通环节就被掐灭。同时，对于政府的所有法律或是政策的制定都是在真正按巴黎公社和苏维埃原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代表大会上进行，实现“人人是官僚，因而无人是官僚”，让立法权和行政权等真正掌握在人民手上，而不是掌握在一小撮统治阶级以及他们圈养的走狗们手上。

共产主义者从反对吸毒封存并非是以反对单个政策的角度，我们反对的是鱼肉百姓与只追求无限利益的中共和它的体制。我们应当团结起来、推翻这些只知道利益的

官僚和资本家们，让每一个人都沉浸在共产主义社会的解放中，而不是淹没在毒品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下！

**(责编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江苏科技大学的学术造假

作者：囚徒



2025年11月18日，江苏科技大学发布一则情况通报，称该校一位博士生导师郭伟涉嫌学术不端，并已被警方带去调查审讯。这件事看似只是一件很普通的学术问题，毕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这种事可太常见了。但我们再仔细审视这件事，事实真是如此简单么？

当我们在树里发现虫子的时候，很可能这棵树本身就已经烂透了。郭伟的“事迹”如果仅仅简单地用学术造假概括的话，那可就太便宜他了。他一共犯了三大错误：学历造假，履历造假，骗取经费。他把自己包装成陕西省的高考状元，谎称曾在某纳米材料公司担任经理，又以出国留学、发表论文等等履历来装饰自己，最后被江苏科技大学花重金聘请为教授。他实则仅为高中学历，其经理身份也是子虚乌有，他只是曾经在公司里面担任过一个小职员。那他所发表的论文是怎么被他给“神不知鬼不觉”地造假成功的呢？一方面他悄悄地以权力施压，占据了他人的学术成果，让他人把第一责任人改成自己。另一方面他利用自己与他人重名的巧合，与他人“共享”成果。

是“福”的同时也正是“祸”的开端。也正是这么多头衔出卖了郭伟。很多网友在郭教授冲击中科院院士的时候看见了他那众多头衔，都觉得很不可思议。这么一个

好端端的人才，怎么只能屈身于江苏科技大学呢？他们纷纷运用网络的力量，把郭伟的“家底”翻了个底朝天，并在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就在各社交平台上发表了有关郭伟学术造假的消息。最终迫于舆论压力，学校方面也不得不开展调查，最终在对外象征性地表示一下：人是骗子，但我们也是受害者。

高校哭丧着脸，摆出一翻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什么都不知情的嘴脸。可是仔细想想，这么明显的造假，审核考察人员怎么会放他进来冠冕堂皇地享受着这个头衔呢？难不成一个人的履历都很难在高校的系统内查到吗？难道没有拥有专业知识的面试官去考察他吗？难道没有同行去举报他吗？难道学校就没有每学期结束之后的审核考察制度吗？就这样肆无忌惮地让一个骗子在里面潜伏了两三年？还没有任何人对他产生怀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高校已经腐败到了什么地步。



### 大量科研经费落到了学术造假之人手中

其实，这种学术造假的情况在中国已经屡见不鲜了。这不仅是“帽子人才”的单方面的输出，而是“帽子人才”与高校的双向奔赴。“帽子人才”为学校提供了表面上的资深教师团队，高校则给“帽子人才”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钱和权。可以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了。而国内的很多高校明知这些所谓的科学家都是一群江湖人士，但他们还抢着招这些骗子，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为了迎合官僚体系、引进“高人才”来讨好他们所颁布的政策从而获得大笔的研发基金。他们把院士、杰青等帽子奉为珍宝。这些帽子渐渐地不再是荣誉，甚至早已脱离了学术能力的本质，而是异化为资源分配权和人脉网络的代名词。在面对他人的举报时，高校也经常以“维护学校荣誉”而敷衍了事。现在，已经不是“授予有能力的人以职位”，而是“有能力的人凭借关系才能得到职位”。

此外，高校“非升即走”的制度也会给研究者带来压力。科学领域的官僚制度使得对研究者的管理变得僵化、指标化，即使是有志于学术的研究者也很有可能为了完成指标而被迫放弃更有深度的研究，转而变得唯结果主义。如果正式的途径、那个依靠能力逐级晋升的幻想变得渺茫，那么依靠人际关系等灰色办法实现晋升反而就

成了更现实的抉择；毕竟，谁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刚好坐在内定给领导亲戚的位置上。

学术圈，或者说学阀运行的底层逻辑就是官场的底层逻辑，其运行的规律就是中共官场的运行规律。在这里，科学家想要成名靠的不是科学研究能力，而是职称级别编制头衔资源项目等方面情况。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在中共的官场逻辑里，科学家就是科学领域的行政长官，项目主管和政绩展现者三者的统一结合体。而一旦科学与资产阶级政府挂钩，科学的性质就变了。人们不再那么热衷于探究科学的奥秘，而是转而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打通人脉。学术研究不是为劳苦大众所服务的，而是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

当然，我们并不是宣扬“所有科学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所以科学都是假的”这种阴谋论逻辑。为了让社会正常运转，统治阶级的科学必然要客观地反映（至少是一部分）客观世界的规律。但就像资本家占据工人的劳动产品一样，学术研究无论从目的上还是实际上，都很少真正地给工人阶级带来实际的利益。我们并不是在违背什么“学术应当政治中立”的准则，而是说，首先，这个准则已经被资本主义秩序与官僚体制有意无意地违背了；其次，现代的整个学术研究体系建立在越来越细化社会分工的基础上，而这种分工本身就是在不断地再生产出阶级分化与压迫；因此，学术研究就不可能完全地独立于社会阶级的利益。自动化的机器被研发出来，就以工人的失业为补充；网络平台技术的应用，就以运营人员通宵达旦地工作为补充。只有真正地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科学家的学术研究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纯粹的，是严谨的，是具有创新的。它不应被死气沉沉的资本掩盖其耀眼的光芒。科技成果应该是可以拿来与人民群众共享的，而不是成为被资产阶级所霸占的用来剥削工人阶级的工具。

既然学术这个传统的神圣的殿堂都可以被骗子们随意进出，那么其他领域自然也早已充斥着那些善于伪装的骗子们。他们把伪装的外衣当作自己的保护色，牢牢地包裹住自己那颗有着贪婪欲望的心。他们就如同变色龙一般到处变化着自己的颜色，最终在经历多次颜色变换后，连自己的本色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他们为自己谋取数不尽的金银财富，同时也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孰不知一旦从高高在上的位置坠落，下面便是万劫不复的深渊。无数人想爬上这个位置，他们想拥有属于这个位置的特权，他们是骗子们的复制体。

但我们主张废除这样的位置。我们深知，一旦拥有属于这个位置的特权，就会被特权给反噬，再也下不来了。我们认为，只有让每个人都拥有一席之地，走民主的道路，这样，这个位置才能贴近群众，才能达到真正地解放人的目的。

作为一位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在今后的斗争中，我们会见识到很多的骗子们。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性——为了一己私欲，用各种手段剥削人们。而我们的使命就是去揭开他们的面具。先让人们真正地看清他们丑恶的嘴脸，进而组织群众起来去革命，去真正地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去在各个领域夺回本应属于我们的劳动果实！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不眠的斗争之夜：长沙骑手 深夜的车水马龙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当地党组织



外卖骑手和各地小区安保制度的矛盾由来已久，许多小区往往出于管理方便的需要而以“减少安全风险”等借口对试图进入小区送餐的外卖员百般刁难。长沙合能璞丽小区就是又一例子：该小区在允许居民在小区内骑电瓶车的同时，却强制要求骑手推车或步行进入小区送餐。12月22日下午，这种刁难外卖骑手的不合理制度最终引发了小区保安和外卖骑手的冲突，其中保安恶劣的态度激起了长沙外卖骑手们的公愤。22日晚，越来越多的骑手在怒火下开始向该小区集合，并且停止接单，进行罢工示威。

截止到23日的凌晨，抗议还在持续。现场视频显示，全城的外卖员都在火速赶往事发地点，沿途以鸣笛，闪灯等方式进行示威。几乎与此同时，中共政府迅速开始封杀在网络上的关于此次事件的直播和视频，但中共部署公安和特警机关前往小区附近待命的消息还是被更多主动传播现场状况的市民爆料了出来。

这是长沙骑手们团结斗争的不眠之夜。于此同时，这晚和某些赛博革命家们其他寻常的晚上一样，是左圈熬夜玩乐的一夜。他们先是在自己的小团体内嬉笑打闹着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无产阶级轻骑兵”的“冲锋”，后来又是在群魔乱舞地创作着幼

稚至极的“热狗大合唱”。一旦有人打破这种温馨的氛围，胆敢质疑这般毫无营养的网左行径，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将质疑者禁言、封禁，并扣上经典的“共革阵间谍”的帽子。

中国无数伟大的群众运动和工人罢工里，这些“吃瓜者”，评论区和键政群的常客，就这样一方面自诩“和群众打成一片”，另一方面闭着嘴、缩着腿，蹲坐在屏幕前逍遥地冲浪。在我们目前仍然在修订、即将发布的关于共革阵建党路线的细化的文章中这样说：

“做好参与到、领导起现实中的阶级斗争的准备。哪怕现在的能力力不从心，也要在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工人罢工这样的各种事件中，争取得到锻炼，无数的声援和文字都不如这样的提升效果。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党，那就必须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可以推测，革命组织一次次实干的行动，会多有力地将左圈排挤为无人问津的小团体。”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的同志们不会搀扶这些自甘堕落的阿斗，在从读者的反馈中得知他们又在谩骂、甚至策划对《共产主义者》官网的DDoS攻击的同时，共革阵当地党组织的同志们第一时间星夜兼程向运动现场集结，和在场聚集的骑手进行接触，详细了解了斗争的情况并与一部分骑手建立了联系。

## 向谁斗争？为谁斗争？

2024年8月12日的浙江杭州也发生过类似的冲突事件。事件中，外卖骑手由于不小心损坏了绿化带就遭到物业人员扣留电动车钥匙，并被要求罚款人民币200元，由于骑手依然有订单着急派送，这种堪称强取豪夺的无理要求甚至逼得他不得不下跪请求原谅。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怒火立刻在当地骑手群传开，大批外卖骑手来到现场高唱国歌并要求物业道歉，随着警察到场试图维稳，骑手的怒火逐渐扭转方向到了警察身上，甚至出现了有人用水瓶砸警车的现象。

自由派尖酸地将此类现象一概归类为“底层互害”，满足于悲悯地做出“可悲可怜”的评价。然而革命共产主义者却要仔细地多问两句：这种现象根本来说源于何处？斗争的烈火该燃向谁才能根本上烧尽这样的问题？

一方面，长沙的这起事件恰如一年前杭州的那一起一样，美团等外卖平台非但没有出面维护骑手的权益，反而立刻暂停了事发地点附近的外卖服务避免更多还未得知消息的骑手不自觉地现场靠拢。一年前，美团甚至还在事后封禁了到达现场参与抗议的骑手的账号，排除了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平台对骑手的剥削力度在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持续低迷，越来越多人选择外卖作为保底饭碗的情况下还在持续增强。近日，网上还出现了大量骑手吐槽外卖平台“偷时间”的视频。在平台利用算法高度压榨配送时效的情况下，订单计时出现了计40秒为一分钟的骇人现象。

另一方面，诸如禁止外卖骑手进入小区等等不合理的要求往往发于小区物业乃至业主们而非保安本人的意愿，就这起事件的起因和经过而言，过程中就不乏盛气凌人地指责与歧视外卖骑手的业主。根据骑手们亲口的控诉，他们对这个小区早已是积

怨已久。即使其余上门服务都被业主和物业允许入内，骑手的电瓶车依然要被严格限制。这并不很让人意外，事实上，根据公开的资料显示，该小区是配套有健身房、恒温游泳池、图书馆等等设施，二手房价约一万四千元每平的准高档小区。社会中自作清高的“中间阶层”的落后分子，不能不靠着极力贬低无产阶级来维持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和维护。因此，这份保持住自己的饭碗的渴望，对于惧怕订单超时的外卖骑手和惧怕物业和业主责罚的保安来说同样适用。

最后，中共当局对聚集起来的群众的无尽恐惧也已经在一次次的事件中显露无遗。以抖音为代表的各大平台不仅开始清空关键词下的内容，也开始封禁试图传播现场情况的账号。现场的民警得到了数轮增援并列好了阵型与骑手们对峙，共革阵当地的同志们甚至发现，至少两辆大巴车的特警也被部署在了一般骑手难以察觉的角落位置以时刻准备增援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四点多，在骑手喊出要求把歧视骑手的女业主放出来的时候，面对马路另一头集结好的警察，人们把一个白色垃圾桶拉到十字路口中间用木棍奋力敲击，巨大的声势逼得警方不得不徒劳地尝试驱散越来越兴奋的群众。

物业、平台和中共当局所立足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角度，所考虑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诉求，所希望的从来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这类事件从来不是个例而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在青岛，这种冲突甚至直接导致了32岁外卖员被保安刺死。他们乐于看到外卖骑手和保安为了保住各自最基本的饭碗相互仇视甚至大打出手。

## 组织起来！调转枪口！

长沙外卖骑手们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从消息传播到向现场靠拢的过程，他们集结的速度甚至将公安远远甩在了后面。视频显示，骑手们默契地在道路中穿行，不断有新的骑手无视身边闪着警灯的警车汇入滚滚洪流，驰援抗议现场。骑手们在路上肆意地呐喊，释放着自己对长期以来遭受的系统性压迫的不满。一个骑手被其他人披上了印有龙图的“黄袍”，得到了阵阵欢呼，在小区门口，他们更是在指挥下整齐划一地喊出稍显粗俗但足以说明问题的简短宣泄：“操你妈！”

只有最胆怯的懦夫才会对群众运动视而不见或满足于假惺惺的声援。我们毫不客气地指出，日渐走向觉醒的群众与他们必然在现实的斗争中走向的革命倾向，时时刻刻都在威胁着以蒙蔽式、命令式的愚民政策为核心“思想”的波拿巴的崇拜者们。他们渴望的制度是建立在对人民表达自我意志的抑制、群众和革命者的背离之上的。相反，作为历史进程发展中必然经历的阶段，列宁高度评价以各种各样出人预料的形式开展的群众运动：“一向不抛头露面因而常常被肤浅的观察家所忽视或甚至轻视的群众，以积极的战士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这些群众在实践中学习，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迈着试探性的步伐，摸索道路，确定任务，检验自己和自己的切思想家的理论。”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高度重视在一次次的群众运动中展现出越来越高的组织素养的无产阶级，这也是同志们在接获消息后立刻赶赴现场接触先进群众的原因。安全问题从来不是阻挠我们进行群众工作的借口，相反，我们始终铭记着列宁的结论，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消息的流通和集结的外卖员们已经在这次斗争中漂亮地完成了一次革

命斗争的预演，这类运动无疑“使无产阶级逐渐学会了为争取工人和全体人民的权利而同政府进行斗争”，而此刻制约群众运动向更深更广发展的因素则在于一个可堪重任的革命党的缺乏。列宁解释道，“能够领导这一斗争的，只有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因为它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关于政府和关于工人事业的正确概念。”

正是通过集体斗争，工人们才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阶级的力量，才逐渐敢于不仅仅是把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且是人格尊严和政治诉求提上口号。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仅仅要求那些对骑手态度恶劣的保安出面道歉是远远不够的——害人的规章制度不仅不是由他们制定，甚至他们不去遵守也会丢掉自己的饭碗。事实上，当事件发展到如此地步的时候，真正开始限制骑手们的反而不是最初的那一个保安，反而是畏惧意识到团结的力量的全体无产阶级的反动当局。讨论个人的对错并将矛头对准某个人已经毫无意义。需要有一个能够顺应群众的诉求，提出科学有效的纲领并指明斗争方向的革命党，才能不至于白白浪费掉发展至此的运动形势。

## 向哪里去？因何消散？

根据当地共革阵同志们的反应，贯穿这场运动的核心弱点不在于工人阶级的“动员程度不够”，而是缺乏一个明确的纲领和斗争目标。当初步的诉求——要求歧视骑手的女业主出面——被提出时，时间已经在凌晨四点左右，不仅对于形势是过期的，对真正需要打击的对象也是模糊的。

我们亲自采访了参与的工人，询问他们加入抗议的原因。工人们反应，他们并非是一时兴起，而是长久以来这个小区就只是不让骑手们骑车进小区，只让跑腿进去，认为业主是“借着物业的盛气凌人”也在欺负、歧视他们。

因此，工人们核心诉求是围绕“骑手被保安欺负进不去门”和“有人歧视我们骑手”展开的，而它在运动中不仅没有在骑手中被统一起来，对外人也是“不明所以”。很多旁观的群众，对运动的整体发展十分疑惑，无论以标语、口号还是演讲哪种形式展示，纲领对于运动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动员全市的外卖工人不仅在小区门外宣泄情绪，而是对小区进彻底的封锁，举行集体罢工，拒绝对长沙配送任何一单。不是一个不眠之夜，而是不达到目的不罢休。必须让运动除了喇叭声外以实际的经济打击和物理意义上的存在造成影响、施加压力：让业主从挨饿的肚子、不便的生活里学到教训，让平台从无视雇员的难处、对他们进行高压剥削还置骑手的利益于不顾中遭受经济和名誉的重大损失，让政府不得不在妥协或野蛮镇压、进而上升冲突局势扩散不满中作出选择。

让城市看到：是我们工人阶级供应、维持着一切的运转，对我们的尊重不是恩赐，而是我们向任何人提供服务的前提！

但由于一个革命性领导层的缺失，这场运动不需警察作出什么行动，在人的困意下就自然消亡了。同时，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流氓和捣乱者也因为运动缺乏纲领得以混入其中。我们的同志们反映，后期“鬼火”、“黄毛”等等群体逐渐入场，在他们

眼中，这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场肆无忌惮的狂欢，他们看到工人们骑着电动车鸣笛转圈，看到的是飙车而不是一种斗争的形式。

破坏者借着局势混乱之时的介入进一步将运动带入了娱乐性解构的深渊，这和我们在洛杉矶抗议中看到的趁火打劫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抹黑运动、将旁观群众推向相反面而不是争取过来，他们的作用强过统治阶级公告的污蔑上百倍。有纲领的群众运动不仅要与之划分界限，还要进行严厉的打压，彰显工人罢工绝非流氓分子的炸街。

同时我们的同志汇报，骑手通过骑手群尽管可以在短时间进行大规模的动员，但这种组织方法仍然存在弊端。骑手群作为工人阶级不成熟基层组织的雏形，现在仍然保持了很多不利于骑手利益的行会色彩。行会立足于“行”，关注的是一个行业的利益，是同行业小资产者谋取共同利益打压敌对行业、处理行业内的恶性竞争的组织；而工会的核心在于“工”，它倾向于以阶级而非职业划分界限，是工人联合行动、组织总罢工的武器。

对于外卖工人，如果只有“自己人”的支持，那是不可能胜利的。骑手们需要长沙广大无产阶级同胞们的支援。骑手们的组织方式，现在构成了排外的威胁，在这场运动中以再清楚不过的方法展现了出来。革命者需要力求推进工人的自发基层组织方式走向成熟。

## 我们学到的经验

任何群众运动，如果是在运动开始后才开始想办法介入，往往都已经过晚了。即使我们当地的同志较早赶到了现场，可是花在信息的传递以及交通上的宝贵时间仍然被浪费掉。同时，即使是赶到了现场，群众们又怎会信任你一个姗姗来迟的“旁观者”，甘愿接受你提出来的纲领、诉求，接受你的领导呢？

特别是例如我们在本次骑手们这里看到的微妙的排外心理，（当然我们完全能理解这是工人们为了安全等等方面的朴素考虑）如果没有长期的通过行动向群众证明你不是一个“外人”，也绝无方法实际的“介入”或是所谓的“领导”。其实某种意义上，“介入”等词本身也蕴含着有一丝傲慢和将自己划分为群众之外的外人的心理。我们不只能想要“介入”，而是成为群众运动中有机的一部分。

正如事件后续的发展逐渐走向纯粹的娱乐化情绪宣泄的“炸街”等等，如果没有一个提前建立好的严肃组织提出明确的纲领和诉求，排除闲杂人员混进队伍，那么对于特别是例如骑手这样的本身并没有在像产业工人那样能最为直接的共同协作和一同劳动，也没有在平日的工作中培养出集体主义的战斗精神的群众来说，即使初期声势浩大，最后也容易除了情绪宣泄以外，几近没有起到任何的除了教育以外的现实作用。但也可以想象例如骑手群这样的自发组织，即使往后发生类似的运动，在缺乏革命党有效领导的情况下，除了再复刻一次情绪宣泄以外大概仍然没有什么变化。群众固然从经验中学习，但经验需要被总结以避免重蹈覆辙。

因此，正如我们一直坚持的那样，必须以最紧迫的态度去对待建立一个战斗性的无

产阶级革命党，只有提前的在当地的数年的积累和影响，才能在当地掌握一手消息来源，在事态还未爆发时提前介入。同时，也只有长期的远远不只是所谓“声援”、“宣传”、“采访”亦或是“教育”的仅是停留在嘴皮子上的实际行动，让群众们看到你是真诚的愿意为了劳苦者们战斗、愿意为他们的利益去奔走东西，愿意与他们站在一个“战斗的街垒”里，才能逐渐得到他们信任，同时建立起当地的初步群众组织，为往后的任何运动做好十足的准备。

让统治阶级在工人阶级的伟大动员中颤抖吧，让打着革命幌子的破坏者们和聒噪者在羞愧中自我毁灭吧，让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阶级斗争的有机经验中成长、组织起来吧！建立全中国的地下网络的任务摆在了所有革命者的面前。让我们从当地同志们的榜样中学习，并继续前进：我们不只要长沙，我们要整个中国！

# 郯城一中：屡禁不止的校园霸凌

作者：顾言



2025年11月29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一中的一名十七岁高三学生徐某在忍受长达半年的校园霸凌后，在学校对面小区坠楼身亡，结束了自己的短暂生命。在离开这世界前，他给含辛茹苦抚养他长大的外婆和舅舅留下了最后的只言片语：“感谢17年照顾，但是我要去找我妈妈了。”

亲属们纷纷承受不了这样的惨痛的现实，开始向学校讨要说法，但是无论是老师还是学校领导都对此事件刻意回避，试图掩盖此事件。事发后，面对家属在微信群里的焦急质问和对真相的渴求，班主任张衍国做出的回应，竟然是直接解散了家长群。

12月1日，面对学校和老师的推诿，走投无路的家属们被迫选择了最惨烈的方式来为孩子讨回公道。他们将灵柩运至校门口堵住大门，拉起写有“校园霸凌害死学生”等控诉的多条横幅，摆放花圈，焚烧纸钱，用喇叭哭喊着要求一个公道。当天，他们等来的不是校方的道歉与真相，而是迅速赶到的警察。维权行动被驱散，横幅被没收。好在有围观群众在现场直播，使得此事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

根据亲属和同学的透漏，徐某在过去的半年里持续遭受同班同学的歧视与霸凌。以

班长为首的小团体多次当众称徐某为孤儿。徐某曾多次哭着跑回家喊着“不想上学了”。同学们在网络上曝光的多段视频显示，徐某生前曾多次惨遭同学的拳脚相加和围殴。这种心灵与肉体的双重摧残，彻底压垮了这名少年。这样的惨案在网上获得了极大的同情，人们纷纷转发并给郟城当局施压，迫使校方和当地政府回应此事，但后者依旧对“霸凌导致自杀”的说法，表示“不知情”或“尚不能确定”，呼吁“不信谣不传谣”，并对发布有关视频的社交帐号封禁删除，对涉及此事的学生也只是拘留，而徐某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那一刻。

## 校园霸凌为何屡禁不止

无论是今年一月的陕西蒲城，还是四川江油的校园霸凌事件中，都可以看出中共的学校官僚们对于霸凌永远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于学生的生命他们是不会在意的。他们更关注学校的声誉和自己的仕途。

作为“正义之剑”的法律成了霸凌者的避风港。被霸凌从来不是受害者的原因，而是受害者的家庭过于软弱。无论是在学校还是社会，刺头恶霸和富二代永远不会被欺负。当然也有消息称，被霸凌者徐某所在班级的班长为官二代（消息有待验证），但无论霸凌者到底有没有背景，我们应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弱者没有资格存活，只有人吃人互相拉踩才能活下去。孤儿和穷人自然在这种社会中不被待见的。在江西万载事件中，霸凌者甚至公开直播讽刺受害者，以强者自居。统治阶级当然深知这对社会的破坏，但为了延续资本主义体制的价值观，使更多人维护资本主义，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也是为何我们经常短视频平台刷到所谓的刀枪炮（流氓暴力）视频。

无产阶级的学生忍受着糟糕的教育资源，拼尽一生也很难过上统治阶级口中的体面生活。他们忍受着世界的不公，可却又渴望成为强者，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一届又一届学生成为了霸凌者的玩物。如果不是网络平台，这件事情不知道要被雪藏多久。

## 如何解决

资本主义下结构性失序造成的悲剧，不是开几个班会和座谈会就能解决的。唯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构建起具有工人民主的计划经济体系，社会一切的导向不再鼓吹强者和利润，以社会效益和公共道德为主。

学校不再是为少数人培养奴隶，而是真正的教书育人，法律也是真正由人民民主制定的维护公平公正的工具（并由人民的政权来实施），而非维稳手段。

不要再让万恶的资本主义存在下去，它只会让悲剧一直重复。我们不要再忍受下去了，唯有团结起来，共同打倒它，将全世界人类从资本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澳大利亚枪击事件：从阴谋论到民族叙事的瓦解

作者：过涯



### 引言

2025年12月14日，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著名景点——邦代海滩（Bondi Beach）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事件的发起者是一对父子，其目的是当天正在进行犹太教传统节日——光明节（Hanukkah）的哈巴德犹太教会与参与其中的犹太人。截至本文撰写完毕，这一事件已经造成包括一名发起者在内16人死亡、40人受伤。

澳大利亚是一个对于枪支管控非常严厉的国家，这源自于1996年4月28日发生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著名景点——亚瑟港（Port Arthur）的一场大规模枪击案。这一事件造成了35人死亡，17人受伤；而邦代海滩枪击案则是自亚瑟港枪击案以来澳大利亚最大的一起枪击事件。

这是一件难以定论的事件；不同于1996年由个人纠纷与欲望驱使的亚瑟港枪击案，邦代海滩枪击案的背景涉及到当代严重的一股民族仇恨——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矛盾。以巴勒斯坦或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一系列战争为主线，这一仇恨

横跨民族、宗教、政治主权和人道主义危机等问题，成为诸多仇杀事件的影响因素，而邦代海滩枪击的事件似乎再次将仇杀这一概念展现在了全世界面前。邦代海滩枪击事件的动机与真相也其背景而变得扑朔迷离，各种各样的解释、分析、甚至是阴谋论也在网络社群中层出不尽。

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互联网上流通着的冗杂信息使得我们必须沉下心来，以科学的方式梳理。共产主义者无论何时何地都应该付出巨大的努力来探明客观事件的真相，而非对着网络上随意飞舞的，新闻台上死气沉沉的信息粗暴地得出假设并将其当作结论。

## 事件经过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7:00，哈巴德犹太教会主办的“海边光明会”在邦代海滩活动开始。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8:30 之前，两名枪手到达了现场。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8:42，在摄像头的画面中，海滩上的游客开始大量逃离，几分钟后海滩空无一人。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8:45，枪手在海滩北侧开始瞄准并射击。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8:48，见义勇为的阿默德·艾哈迈德（Ahmed al Ahmed）夺过两个枪手其中的父亲赛义德·阿克拉姆（Sajid Akram）手中的霰弹枪，并瞄准他。一会后，赛义德再次出现，并被警方当场击毙。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8:50，两个枪手其中的儿子纳维德·阿克拉姆（Naveed Akram）被警方击倒，现场至少开了 103 枪。

于 2025 年 12 月 14 日 19:47，澳大利亚警方发布就地避险令以确保该地区安全。执法部门的调查仍在继续。

于 2025 年 12 月 22 日，澳大利亚警方公布了一段枪手手机中录制于 10 月的录像，表明两名枪手曾在数月前在新南威尔士州乡村进行枪械训练；并在公布监控中表明了枪手在作案前曾经前往海滩“踩点”。在警方公布的资料中表明，两名枪手曾在枪击事件前将两支霰弹枪、一支步枪与自制简易炸弹用毛毯包裹着，运往案发地点。

## 事件定性与各论调

在枪击发生后，对本次事件的定性成为了最重要的话题。官方层面，澳大利亚政府将该事件定性为针对犹太人的民族仇恨犯罪，并表示枪手父子为穆斯林。事件的影响会让本就不欢迎穆斯林的大洋洲进一步扩大民族与宗教之间的裂痕。警方报道，在这两名枪手的车辆上搜出了自制的伊斯兰国（ISIS）旗帜和简易爆炸装置，因此

枪手极有可能是受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影响并有充分的针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动机。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更是直言本次事件是“仇恨意识形态”导致的“大规模谋杀”。



### 枪击现场对逝者的纪念活动

但在非官方、非主流媒体的话语体系内，质疑官方定性的声音不绝于耳。自邦代海滩枪击事件发生以来，它传遍世界各地的社交媒体之上。正如我们曾经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群众运动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无限扩大化。借着这一媒介，有了许多全新的抗议方式，有了比曾经更加激进、更加新颖的运动方式。”（《共产主义者》编辑部《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革新与坚持》）网络可以在群众运动之中取得广泛的效果，也可能加剧各种矛盾的演化，悄然种下怀疑的种子。

事件发生后，外国贴吧 Reddit 平台上有一篇贴文爆火，这激起了“此次枪击事件是否为刻意而为？”的讨论。在这一贴文中，贴主与大量讨论者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一事件为以色列的假旗行动：即通过牺牲一部分犹太裔平民，以及几个演员来塑造穆斯林的“可恶”并维持以色列政府的“犹太人受害者论”叙事。我们可以从历史案例中一窥这一论调的合理性。在 1954 年夏季，以色列于埃及进行了名为苏珊娜行动（Operation Susannah）的隐蔽行动。在该行动中，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的特务在埃及的电影院、图书馆等公共场所安置炸弹，并试图将此行为栽赃至埃及当地的穆斯林兄弟会、埃及共产党或埃及本土民族主义者身上。然而这一行动由于炸弹爆炸失败而半途搁浅，被称作拉冯事件（Lavon Affair）。

在此之外，人们还提及了令一起由民族和宗教而起的仇杀案件，即 2019 年 3 月 15 日的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在澳大利亚的邻国新西兰，一名 28 岁的澳大利亚籍新纳粹分子布伦顿·塔兰特使用半自动步枪无差别的射杀了 51 名清真寺附近的平民。这一针对穆斯林的枪击事件使我们看到了仇杀事件在网络舆论和社会现实种都产生极强的互联性。这一事件也导致了大洋洲对于穆斯林的不友好开端。

如果我们关注邦代海滩的枪击事件背后的种种细节，我们就会发现本次事件中有太多吊诡的事情，使得“该事件背后有别的势力参与”的怀疑不断地在互联网上发酵。例如两位枪手曾在案发前一个月去往了菲律宾，根据马尼拉边检机关的汇报，这对父子分别使用了印度护照和澳大利亚护照入境。这种处处充满异常的、去到第三国的旅行不禁让人思考：他们时候是去接受军事训练吗？还是去和自己的联络人接头？这背后是伊斯兰国还是以摩萨德为首的以色列情报体系？为什么事件发生地点正好是大洋洲这样对穆斯林排斥的大陆？我们不会去揣摩，但我们一定会警惕。

在堆积如山的舆论中，我们仍然能够找到一丝积极的信号：哪怕这些言论的外表以阴谋论示人，其内核已经有了抗拒民族叙事的迹象。这代表虽然民众缺乏来自先进理论的指导，但其对传统的、官方的民族主义叙事之反对是非常明晰的。例如在对假旗行动的推测中，已经有群众开始警惕以色列政府与资产阶级，认为这一事件是统治阶级为了稳定其在中东的领土主动权与政权而自导自演的一场戏。统治阶级乐此不彼地套用老伎俩，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民族与宗教分化人民群众，使得群众之间相互仇恨，好像这样就可以稳坐高位坐观龙虎斗。可是现实已经告诉了这些统治阶级，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这一套把戏反复蒙骗，就如狼来了一般，喊多了只剩下谎言；即使这一事件最终被证明与以色列政府无关，但民众的怀疑与敌视，也早已证明它们失去了民心，或者说失去了民族叙事这一意识形态根基。正如列宁所说：“猖狂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钝化、愚弄和分化工人，使工人听任资产阶级摆布，——这就是当代的基本事实”（弗·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

## 基于出身还是良知

在这场枪击案中，无论枪击事件是否是以色列的假旗运动，这位尝试阻止枪击事件的市民艾哈迈德无疑都是一个变量。据报道，阿默德·艾哈迈德是一名拥有叙利亚血统的、有两位孩子的43岁水果店老板。而他的出现无疑对于民族叙事最响亮的一记耳光。



徒手夺下枪手武器的阿默德·艾哈迈德

起初，他的举动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争议的源头在于——阿默德·艾哈迈德作为一名穆斯林在阻止另外的两名穆斯林攻击犹太人，这种行为在两个本就是敌对民族与宗教的眼里，更像是叛徒。针对于他的各种无法辨别的小道消息也因网络而走红，有人说他是基督教徒；有人说他是犹太教徒；也有人坚持他是穆斯林这一观点。这些讨论应接不暇，如排山倒海般涌来，且都尝试在一个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阿默德的见义勇为是源自于他的民族血缘和信仰。然而，这些民族叙事的拥趸，无论是穆斯林还是犹太人，都忽略了一个事实：“救人”这一最朴素的概念是不会受其身份动摇的。

想要构建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就必须要有被构建的“他者”。民族主义者将他者中的人本质化、抽象化为某种符号，以把真实的生活抽去，把具体的人的对抗幻化为抽象的民族的对抗、宗教的对抗，并进一步把这种对抗视为“正义”和“邪恶”的对抗。无论这件事背后是否有某个势力在暗中资助、支持，统治阶级都一定会竭力将其渲染成它是如下观念的表现：某一批人本质上就是残暴的、邪恶的、顽冥不化的、无法融入“现代社会”的、必须严加防范的、非人的。它给国家以充分的理由加强“公共安全”、侵犯群众隐私、没收民间武装，进一步加强国家机器的专制性，而国家能够如此做的前提之一就是它看起来是能够进行这种管理的唯一者，是某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的调停者。因此，这位热心市民的出现，一方面能够打破抽象的民族观念，另一方面也证明群众的力量而不是为了维护国家统治而存在的暴力机关才是制止犯罪的最重要的手段。

而相对的，以色列犹太资产统治阶级针对于穆斯林群体的压迫也导致了今天的结果；澳大利亚枪击事件并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而是以色列资产统治阶级过度利用自己的历史受害者身份并压迫巴勒斯坦人民等种种原因埋下的祸根。在这里我们必须声明：民族的压迫与压迫民族的压迫是两回事；正如列宁所说：“抽象地提民族主义问题是极不恰当的。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弗·列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总是反动的，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则具有民主性质。

## 民族主义的真面目

在这么一件迷离扑朔的复杂事件中，我们的锚点其实非常具体。锚点其一在于民族叙事的真相，而其二则在于我们该如何看待民族事件的矛盾与仇恨。

澳大利亚枪击事件固然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的事件，然而它却揭晓了民族主义叙事的真面目。当统治阶级通过民族叙事来反反复复为自己民族的苦难扩大化，并以此来尝试奴役群众以仇恨他人之时，无产阶级人民群众绝不会再容忍下去。正如阿默德一样，不被统治阶级的民族主义所绑架。

马克思曾对民族斗争、民族解放做出了相当多的解释：“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

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

所谓的“民族光复”、“民族觉醒”、“为我们的民族苦难而报复回去吧！”这样的话无非就同本文所说，不过是资产阶级利用民族叙事来压迫本国人民，伤害他族人民的武器。当工人运动越来越发展，民族主义则越来越惊慌失措，也越来越疯狂。列宁曾经说过：“工人运动愈发展，资产阶级和地主就愈疯狂地企图镇压或分裂它。用暴力来镇压和用资产阶级影响来分裂，这两种方法正在全世界、在各个国家中经常地运用着，统治阶级的各个党时而采取这种方法，时而采取那种方法。”（弗·列宁，《腐蚀工人的精致的民族主义》）当一次又一次的民族仇恨事件出现，群众的运动与反抗也会愈来愈强烈；直到有人不再被仇恨卷入两极对立的漩涡；直到有人开始跨越种族与仇恨只为帮助他人；资产阶级民族叙事那可悲的幻梦就会毫不犹豫地进步的无产阶级瓦解。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真帝国对阵假革命

《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当地时间 1 月 3 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白宫新闻的记者当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对包括军事设施在内的多个委内瑞拉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之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号召民众走上街头。一小时后，[特朗普发帖](#)声称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及其妻子“被俘并被空运出境”，同时他证实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打击。委内瑞拉副总统表示，委政府不知道总统马杜罗及其夫人现在何处。而美国的态度也有过起伏，先是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不会对委内瑞拉作进一步行为”，但特朗普于当地时间 1 月 3 日在佛罗里达海滨庄园释出的信号又表示美国可能发动“第二次的打击”并将介入委内瑞拉的政权过渡和“整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建。

截止到目前，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挟持并押送至纽约已成为公认的事实。事情的发展是如此之快，我们有必要在感叹美国军事行动的迅速、入侵委内瑞拉的公然暴行之外，了解这场战争因何而起、将向哪里去。

## 战争因何而起？

没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会喜欢“出无名之师”，哪怕是纳粹德国，在向波兰展开行动前也会寻找理由；曾经的大日本帝国，也懂得利用卢沟桥事变作为借口掩盖真实的侵华动机。美帝国主义十分清楚这点，在国际舆论、内部维稳上，必须用一些“高尚”的东西欺骗群众战争是合理的，要不是把自己包装为正当防卫，要不搞出经典的一套“我们将为他们提供民主”。

美国一直以来都把拉丁美洲当作自己的“后花园”，拉丁美洲也是美国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第一个受害者。美国在拉丁美洲的行动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光荣”的传统，那就是颠覆掉不利于美国跨国企业利益、不接受美国指挥、不认同美国作为第一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政权，然后扶持极右翼亲美政客、支持自由化、私有化（换句话说变卖本国经济成为美国企业的傀儡）的独裁者执政。危地马拉的哈科沃·阿本斯推行土地改革，触动了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利益，因此被 CIA 策划的政变推翻，使军政府控制危地马拉；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国有化铜矿直接影响了美国矿业公司的利益，被美国赞助的屠夫皮诺切特替代；巴西的若昂·古拉特因为维护劳工权益、限制资本外流，被美国明确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巴西进入了长达 21 年的军事独裁；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因为亲古巴、亲苏和自己的反美立场，在美国数十年赞助反政府武装、实行经济封锁、开展水雷战后下台。

当互联网上的“自由派”社群（或者说是欧美华人、香港澳门台湾华语网民和自媒体账号的互联网键政圈子，其政治生态更加贴近欧美保守派政权的支持者，和真实意义上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没有关系）欢庆委内瑞拉独裁者被“执法”时，当他们又在颅内宣告要对中国独裁者习近平采取同样行动带来“民主”时，一边忘掉了自己曾经对于特朗普的担忧，一边暴露了自己对于国际关系、社会矛盾的理解并不比他们嘲讽的“粉红”高出多少。

这些“民运”无非是“粉红”的另一个极端，将粉红信奉的倒转过来并不意味着找到了真相，不过是变成了同样愚蠢、被舆论操控的、被情绪裹挟的“浅蓝”。他们作为一批“乐子人”，从来不会严肃地考虑中国的未来、中国人民的福祉，无非是自以为“觉醒”、“中产”的一批底层人，不从和自己同样处于底层的劳动者那里团结起来找到力量，反而从贬低自己同为的中国人——一天天精神错乱一般“支那支那”地叫——那里寻找虚幻的身份认同感。且让我们不听他们的聒噪，看看战争到底是否真的只是因为美国官方宣传“罢黜独裁者、审判毒贩”的借口而起。

随着美国在全世界的霸权体系逐渐衰落，拉丁美洲也愈来愈表现出对美国的背离，而其背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当属中国。从经济角度看，中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正在增长：2025 年 1-11 月中国与委内瑞拉双边货物进出口额约为 59 亿美元，虽然还比不上疫情前的最高值（约 89 亿美元），但值得注意的是委内瑞拉在与中国的贸易中于 2020 年从顺差国变成逆差国，且逆差额越来越大，2025 年 1-11 月这一数字已达 38 亿美元。中国卖给委内瑞拉的商品主要有智能手机、服装、家具、钢材等。可见对中国的来说，委内瑞拉的角色在原料产地（石油）之外又增添了一个商品倾销市场。委内瑞拉居世界首位的石油储量也成为其被大国重点关注的原因之一，2024 年委内瑞拉货物出口总额为 152.90 亿美元；而 2025 年 1-9 月其石油出口就达 117 亿美元，可见其石油出口占经济体系的核心地位，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卖给中国；在美国突袭委内瑞拉期间，对委内瑞拉的封锁也导致输往中国

的油轮被阻。中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石油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这明显会对美元霸权产生冲击，使得美国的金融资本家的触手能操控的范围更少一些；美国方面也需要相对廉价的石油以平稳国内通货膨胀，而减少中国的石油供应也能对中国经济造成明显冲击。所以，委内瑞拉这个曾经隶属美国控制的“后花园”，正在因为新帝国主义土匪的出现进行“易手”，而美国的这番行动则是试图以暴力手段保证自己的统治不受他国染指。



### 委内瑞拉居世界首位的石油储量

此外，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委内瑞拉推行“21世纪社会主义”，属于相对左派的一方（尽管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左翼民粹主义的大锅烩），而在拉丁美洲，左派和反美有着很强的联系。但中国的出现似乎提供了一个在依附美国与受到孤立乃至制裁之间的新选项。在上个世纪中后期，这种新选项还是和彻底改变社会形态相联系的；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盛行以及拉美国家所受到的数次冲击，这种新选项的革命意味就越来越弱，只是权衡与哪个帝国主义交易付出的代价更小而已。

地缘方面，中俄两国都与委内瑞拉有着军事方面的贸易乃至合作。我们不知道特朗普作出这个决定时有没有想起1962年引起整个美国社会恐惧的古巴导弹危机，但他知道，美国必须用所有的可能手段保持自己的国土安全，因为这种安全曾是它打败其它竞争者的优势之一，也是美国特殊论一个支撑。

美国与委内瑞拉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体现了中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和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为了给国内的过剩商品找到销路，把手伸到了美国的后院；美国为了维持国内的稳定与国际霸权体系，不得不用越来越暴力的手段敲打与中国有合作的国家。这些在看似的“边缘地带”的争夺对双方都有重大的意义：在经济上，这些地区的消费能力是缓解生产过剩、从而缓解经济危机冲击的暂时性手段，它们的原料则是生产的血液；在政治上，对这些地区的影响力无论对国际话语权来说还是对内部宣传来说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在军事

上，这些（有限度的）冲突是检验双方武器力量对比的最直接的指标。

这种冲突也说明，尽管中美两国似乎一直在“克制”自己不要作出太过火的举动，但是双方还是不得不受到帝国主义逻辑的支配。当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冲突、混乱与阶级斗争高涨到一定程度时，其在国际间的冲突也必然会越来越明显、激烈与猖狂。在这里我们必须反对那种仅仅谴责美国介入别国内政的说法，它通常包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因为美国是邪恶的帝国主义，所以反对美国的就是正义的。中共也反对美国，但这实际上不过是因为想要打破美国霸权体系对中国帝国主义的限制。想要论证“中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比美国帝国主义的统治更好”是荒谬的，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不过是在一个复杂的充满矛盾冲突的体系当中，某个国家强势一些或弱势一些、某些规则是否得到遵守都不会改变它们本身的性质。我们真正应当主张的是力求消灭全球的帝国主义，而这仅仅要求某个国家或某一区域改变自己的政策是不足的一一要解决全球帝国主义的问题，就必须在全球都使用解决帝国主义的办法，也即在全球组织工人阶级革命。阵营不以国界划分，而以阶级划分。

## 查韦斯的教训



乌戈·查韦斯（1954-2013）

今天我们看到的委内瑞拉政治，一方面反映了中美帝国主义的争霸，也一方面反映了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的政策余波。1998年底，乌戈·查韦斯以一种明确反对旧有两党寡头政治（90年代中美洲内战结束后整个拉美各处都是这样的政治格局，可谓天下苦寡头资本家久矣）、否定精英石油买办掌控的国家体制合法性的姿态赢得选举。随后，乌戈·查韦斯开展了一场以彻底改组委内瑞拉国家形式为起点、以民族民主诉求为主要目的的政治风暴，并最终在经济领域中一定程度上采取了社会主义和公有制的元素。1999年制宪会议与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玻利瓦尔革命”首先在上层建筑层面获取了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将群众对国家主权独立、人权平等的追求与拉丁美洲自玻利瓦尔革命期间的反帝传统结合，创造了全新的

“左翼宪政”——一种不打破委内瑞拉共和国法统、重新追溯南美洲独立战争后昙花一现的地区统一记忆的政治模式（整个拉美都有过这样的尝试，只不过乌戈·查韦斯的尝试有体系化得多）。而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正是通过选举合法性与大规模群众动员（尤其是通过全民公投的方式不断占领资产阶级议会的传统权力边界）相结合的方式，把此前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城市贫民与无固定职业劳动者纳入国家叙事，将“人民”的概念民粹化甚至是神秘主义化，在政治空间和上层建筑的各种层面将抽象的人民集体概念转化成为一种可被不断召唤、也可被持续组织的政治主体——这一现象与某些国外共产主义者认为乌戈·查韦斯是所谓“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是绝对冲突的。

2002年至2004年的反对派政变未遂、石油罢工与随后的反击构成了“玻利瓦尔革命”的第一次决定性转折：在这场围绕国家控制权展开的公开对抗中，查韦斯政权不仅击退了反对派联盟与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的直接冲击，更重要的是借此完成了对国家关键部门（尤其是国家石油公司）的直接掌控与事后的国有化。在这一轮风波中，乌戈·查韦斯掌握的国家机器在阶级斗争中明确站队“劳动者”，并为之后依托高油价周期展开的大规模社会计划与再分配政策奠定物质基础。随后，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大规模开展“使命计划”，包括扩张公共支出、完善医疗与教育并实现全面下沉、城乡结合部与乡村基础设施扩张和工业化、以及对贫困社区的直接资源投放。随着全球石油价格的水涨船高，玻利瓦尔革命在2004至2008年间呈现明显的扩张态势，政治忠诚、社会改善与国家干预在现实中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反馈。

2006年连任之后，查韦斯开始系统性地提出“21世纪社会主义”的概念，这一意识形态尝试并非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复刻，而是一种将民族国家主权、反帝国际主义与国家主导的再分配机制拼接在一起的政治语言：在国内，这表现为新一轮国有化、工人参与话语的上升以及执政阵营的组织整合——统一社会党（PSUV）的成立，标志着革命从松散的选举联盟转向一种以国家资源、群众组织与干部体系高度耦合的政党—国家结构；在国际上，则体现为美洲玻利瓦尔联盟（ALBA）框架下的区域合作、石油外交与对古巴等盟友的制度性支持，这些举措既是反对美国霸权的象征性实践，也是在高油价背景下以租金换取地缘政治空间的现实策略。

然而，正是在这一“激进化”的高峰期，委内瑞拉革命力量的青涩与经验缺乏的隐患也慢慢显现。在当时，国家主导的再分配并未没有能够导致对生产力结构的全面改造，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反而在公共支出扩张中被进一步固化。而由于资产阶级力量依然强大、查韦斯高度依靠行政命令为基础的律令制度统治，导致国家行政体系迅速膨胀，最终令“官僚化倾向”与“政府对带有左翼色彩的意识形态之忠诚”形成了一种难以分离的关系。这些矛盾在查韦斯晚期已隐约可见，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依然坚挺，外部有利条件搁置了委内瑞拉国内改革的进程。

2013年查韦斯去世后，他的继承人尼古拉斯·马杜罗所面对的是一个在政治上高度动员、在经济上却极端脆弱的国家体制。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依赖国际油价不断下跌，委内瑞拉外汇枯竭、通胀失控，革命由大扩张迅速转入防御。委内瑞拉不再有能力通过“扩大福利”巩固群众支持，只能通过价格管制、调控汇率、通过食品配给制度与扩张安全机构来调节稀缺并镇压不满。但这样的战略紧缩并没有拯

救委内瑞拉在经济上的脆弱，以2016年实行的“地区供应与生产委员会”（CLAP）为例，这一原本期待在基层分发食物与药品的政府机构遭受了腐败缠身、食物定价波动和来自联合国就实际食品质量的批评。与此同时，此前在群众动员中被击败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在街头与议会内卷土重来，而经济条件恶化催使委内瑞拉政府进一步暴力镇压反对派，使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其的制裁有借口逐步升级。最终，在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委内瑞拉国家生存与政权存续被提升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这更加证明了革命不可能在一国内取得最终的胜利，特别是委内瑞拉这种极端依赖国际贸易的国家，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渗透很容易侵蚀掉革命的所有内核。

就是在这样的事件发展中，玻利瓦尔革命开始嬗变，它的阶级联盟也开始崩溃解体。此前，统一社会党获得了委内瑞拉共产党及各势力的社会主义者支持。但由于查韦斯和马杜罗迟迟不肯宣布全面公有化一切资产并转入计划经济，加上部分国内马克思主义力量与工人组织一贯对政府在危机中向私人资本与市场机制作出的让步及其展露的威权主义倾向进行批评，2016年后他们更是认为其已从反资本主义立场堕为资产阶级的尾巴。在2018-2019年经济政策转向之后，马杜罗政府在高通胀与制裁压力下，采取了一系列事实上的市场化与紧缩措施，包括实际上放弃工资指数化并压低实际工资、对工人罢工与基层工会采取更强的行政与司法干预、鼓励美国和欧洲资本引入等等。最终，在2020年，在当年的议会选举中，委内瑞拉共产党首次拒绝加入统一社会党领导的“大爱国极点联盟”，转而与其他左翼组织共同组建选举联盟“人民革命替代”并在地方层面获得了不小的成功。这一大分裂彻底暴露了左翼阵营内部关于国家角色与工人政治独立性的根本分歧，更是揭露了马杜罗政府与统一社会党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中间地带策略的失败。PSUV在2020年后进一步演化为以基层民兵和社区动员单元、仿照古巴革命保卫委员会建立起来的委内瑞拉国家行政体系与资源分配体制交织而成的组织机器。它既保持了群众性的外壳，又在实践中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纪律与控制，使玻利瓦尔革命那曾经充满活力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群众力量彻底蜕变为国家机器的捍卫者。

## “毒品战争”

美国精妙地利用了毒品作为进行干涉的突破口。早在2020年美国就指控马杜罗夫妇与国际毒品走私网络有关，尤其是委内瑞拉境内贩毒集团太阳集团（Cartel de los Soles）有强关联。美国对外宣传这种行径与毒品流向助长了美国境内的毒品交易与芬太尼危机，将它包装为良好的理由以攻击马杜罗政权。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委内瑞拉存在毒贩不假，但所谓的太阳集团连是否存在都存疑，因此说“美国政府在意反毒品行动”，则是错误的。美国政府很清楚毒品流通是在美国社会内部创造不威胁体制的一个“假想敌”的好手段，是给予对外军事行动和对内警察行动的一个完美理由，是消散因为经济不景气导致的社会矛盾的致幻剂，是转移人们对根本问题的关注度的稻草人。

这一战争迹象并非这几天才开始；早在2025年中旬，美国就已经在委内瑞拉海域部署了大量的军舰船只，以“打击毒贩”作为理由对可疑船只实行空袭。且这一行为已经在东太平洋海域和加勒比海附近导致多起沉船事件，引发大量国际外交危

机。

南方之矛行动 (Operation Southern Spear) 也是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侦测、干扰及削弱跨国犯罪及非法海上网络”。这项行动结合了美国长期推行的反恐与反毒策略；推翻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可能同样是其隐含目标之一。然而今日事件结果恰好进一步证明了南方之矛行动依旧在稳步推进。

委内瑞拉拥有着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储备之一，过分依赖石油出口导致其经济结构相当畸形。自 1999 年查韦斯上台以来逐渐向左翼“玻利瓦尔革命”倾斜，强调国家控制经济和社会改革。正如上文所讲，委内瑞拉属于相对左翼的一派，而拉丁美洲的左翼通常与反美形成强关联。这并不是一次单一的事件，而是一次由大量历史问题堆积而来的一次泄洪；其本身是美国对于左翼力量的一种打压与针对。

这和百年前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没有本质区别，无非在口径上，一个是为了“卖毒”，一个是为了“禁毒”。在真实动机上，都是出于打击独立于自己控制的政权、操控弱国的经济与政治，为自身帝国主义利益服务。

## 委内瑞拉向哪里去？

委内瑞拉的悲剧在于，一个自称为社会主义、自诩革命的领导层已经背叛了曾经信任自己的群众基础。在缺乏真正的左派替代方案——一个有组织、有方向、有群众性、有阶级独立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共产党——的委内瑞拉，所有的不满情绪都被右派动员起来支持自己更加反动的政策。委内瑞拉的左派至今未能逃离查韦斯的余波，只有彻底和旧日的改良主义决裂，革命才有进一步前进的可能。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科丽娜·马查多

反对党领导人马查多是委内瑞拉国有实体（包括委内瑞拉石油公司）私有化的最大主导者，这就等于将委内瑞拉的经济命脉交给美帝国主义，重建畸形的奴隶式国际

贸易地位。马查多支持外国势力在危机期间制裁委内瑞拉，就像呼吁日本陆军“解放”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的独裁政权一样，主张以外国干预的方式“基于人道理由”推翻马杜罗。这里的“境外势力”是谁不用多说，不过是用隐晦的方式在说美国。这枚帝国主义的棋子还用自已的忠诚“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马查多不止一次公开自己仰慕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那个被英国工人阶级痛恨的屠夫——对外方面也积极支持以色列极右派政府，表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哈马斯击倒。她的立场可谓一目了然。

现在，她在社交媒体上宣告自己准备接管政权。但很显然她不过是利用局势放狠话，并非真正具有在委内瑞拉建立新政权的实力：首先，特朗普在新闻发布会上直言马查多“没有成为领导人所需要的敬仰”；其次，除了将委内瑞拉总统带走外，美国没有任何意义上“打败”委内瑞拉。对比下历史上美国对拉丁美洲的干涉就能看出，今日发生的行动不仅不能被拿来宣传美国的强大（虽然表面上跑到别人国家逮捕他国总统很厉害），反而凸显了美国对南美经济控制能力的大幅下降和政治影响力的微小。曾经的美国单用经济封锁就能让一个国家民不聊生，单通过赞助反对派就能推翻现有政府，这次行动——美军的亲自介入——是无招可用的下策。这将对美国国际舆论造成恐怖的影响，也进而给予它的对手干涉的理由。

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被逮捕并没有让整个政权土崩瓦解，军队在当晚就开展了行动——不是保卫国家，而是控制群众——组织起来确保委内瑞拉政权的牢靠。很有可能，军队内的高层领导已经和美国达成了妥协或者说在努力恢复平静，甚至配合了整场抓捕行动。但美国仍无法用“合适的过渡方法”把自己的傀儡放到委内瑞拉的王座上，除非美国用全面战争的形式对委内瑞拉进行占领，否则无法帮助建立亲美右翼力量对委内瑞拉的稳固统治。阿富汗的撤军已经证明了美国无力支撑新的一场这样的大规模入侵，只剩下特种部队的秘密突袭这一种手段。

统一社会党政权无论选择加剧局势还是平息事端，都无法执行自己“反帝国主义”的承诺。残酷的事实放在我们面前，全世界的有识之士、激进的共产主义者都应该看清我们紧迫的任务了。我们缺乏组织，缺乏革命党，在这种社会危机面前，政权在统治阶级的各个代理人手中转移，而劳动群众无力获得解放。

我们必须团结起来，推进革命共产党的成立，推进属于被压迫者的一个崭新的国际同盟的形成。

**打倒战争！主要敌人在国内！**

# 阶级观与共产主义

作者：郁炆



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越是发展，其阶级的构成就越是复杂，也使阶级的矛盾变得复杂了。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使社会日益统一分裂为利益完全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他的阶级越来越不能保持其原有的地位了。其他阶级如果不是跃迁上升为资产阶级或为资产阶级吞并为奴仆，就是要破产为无产阶级。

其中的原理，可以从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生产资料集中上进行理解。社会的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就意味着多数人都会沦为没有区别的、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没有就是没有，不会有两种或者三种类别的“没有”。没有生产资料的无产者要想谋生，唯一的途径就是出卖自己唯一的、不能从无产者的血肉上剥离的财富——劳动力，这是所有无产者的共同特点。资产阶级的共同特点就是拥有大量货币和生产资料（不变资本），这些作为资本被资产者用来采买、支配唯一具有创造价值的魔力的劳动力，其最终目的是实现资本增值，以及满足资产者的个人享受。产业行业的类别、国家疆域的界限，并不影响资产阶级的个体和无产阶级个体，承担着共同的资产阶级整体与无产阶级整体的矛盾，阶级的个体的利益在阶级整体的利益上是一致的。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会有内部的分化。世界的两个阶级根据民族国家被划分了。在一国之内，两个阶级也根据产业划分了。在一个产业内，两个阶级又根据企业划分了。即使在同一个企业里，两个阶级也有分化。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有竞争，工人与工人之间也有竞争。

然而，资本家与资本家的联合是容易的，工人与工人的联合却很艰难。在二十一世纪下，国际资本主义的经验相当成熟，资本家竞争不可避免，却在广泛层面上，能达成普遍合作。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链分工、标准与市场的统一努力、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普遍对话机制，都是这种联合的表现。而无产阶级却远落后于他的敌人。无产阶级的联合比资产阶级的联合困难，无法离开一个始终不能消除的原因：无产阶级的联合是多数人的联合，而资产阶级的联合是少数人的联合。无论怎样，少数人联合一致，要比多数人联合一致要简单得多。此外，资产阶级作为统治阶级，使用了相当大的声量去欺骗无产阶级，利用一群无产阶级去施压另一群无产阶级，有意造成其分裂。



### 俄乌战争再次将军事动员这一政策展现给了世人

乌克兰资本家向西依附欧美的资本家，好战地谋求军事援助向东威胁，而俄罗斯资本家就以军事行动威胁乌克兰。现在俄乌两边的统治阶级拼了命地以国家、民族的安全为由，强行推动两边的无产阶级在战场上互相厮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可耻地参与这种欺骗，成为分化无产阶级的帮凶。然而，两国的无产阶级在一无所有、只能出卖自己劳动力谋生上有什么不同吗？不仅在两国，世界的无产阶级在这一点又有怎样的不同吗？对于交通便利、将整个世界纳入市场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首先是一个地区的、其次是一国的、然后是国际的——这三者的界别也已越来越模糊了——整个无产阶级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养料。无产阶级的相互冲突，除了削弱整个无产阶级的实力本身，使整个无产阶级都更加被整个资产阶级采补的作用外，不构成别的什么作用。一个地区的无产阶级受损，使其必须以更廉价的方式出卖他的劳

动力，如今，就会使别的地区、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也要跟着廉价。不能再将整个无产阶级看作分散的个人、群体、民族了，因为谁也不能幸免于整个阶级受到打击。对整个阶级受到的打击幸灾乐祸的无产阶级，不是伺机投靠资产阶级成为奴仆的工贼，就是迷失地愚蠢。

某个民族主义分子说：“若其他民族的人不领你的情，难道你不应该首先保证捍卫自己民族的工人的利益吗？不该首先确保自己打败其他民族吗？”这句话真正的语言是：如果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没有能联合起来反抗，那么你就应该不惜同时打击那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来保卫自己本民族无产阶级的利益。这正是分裂无产阶级的行径。这就是在说，俄罗斯无产阶级没有能反抗普京的军队占领乌克兰的土地，在 frontline 杀害乌克兰的士兵，那么乌克兰无产阶级就应加倍地杀害俄罗斯的士兵，把他们的侵犯赶出去。这同样也是在说，乌克兰无产阶级没有能反抗乌克兰资产阶级倒向北约，没有阻止资产阶级的军事组织威胁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无产阶级就应去打击、支配乌克兰民族。这完全是加深分裂的内战行径。如果一个民族野蛮地威胁另一个民族，而前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不能作出反抗，或者甚至推动它，那么就会让他们不信于后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后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如果不是自己坚强组织起来（但这很少），就会聚拢到这个民族无论什么样的统治阶级下，使他们不仅不能组织自己，而且更加地瓦解自己了。所以，无产阶级的分裂和互相冲突，不仅阻碍无产阶级的联合，而且会瓦解无产阶级的已有联合。如果哪部分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想傲慢地、狭隘地推开还未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那么实际情况会与他们的目的背道而驰——它不是瓦解了敌对的统治阶级，反而是加强了他们。

不是民族主义分子，而是一个寻找工作的无产阶级疑惑地问：“我们果真与那些进入我们国家的移民利益统一吗？他们有的太过犬儒，工资要求低还干活多，与我们竞争而不是与我们联合，有时还带来难以接受的文化习惯。”我们回答，当然，本土的无产阶级与移民的无产阶级的利益根本是一致的。本土的无产阶级与移民的无产阶级竞争，并不来自移民有什么特别的文化属性，而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普遍的工人相互竞争的其中一种表现之一。难道本土的无产阶级之间没有竞争吗？完全是有的。如果要用敌人的眼光看来竞争者，那对本土的和移民的无产阶级只会产生同等的仇恨。在移民人口只占总人口 0.1% 的中国，中国的无产者面对的竞争者，完全是他们的同胞。有的中国无产者对他们的同胞产生的仇恨，远过于对移民的仇恨（有时就不存在后者）。在移民人口普遍 10% 以上的西欧、北美，这个问题才变得突出了，这正是欧美右翼政党通过反对立场赖以发展的。

无产阶级越是不能联合，它们之间的竞争也就越是激烈，乃至具有破坏性。部分国家（欧美很突出）的本土无产阶级联合和斗争随着历史时间线，有良好的奠基和巩固，减轻了相互之间的竞争，牵制资产阶级降低他们的工资。移民无产阶级，则正因其外来属性，缺乏融入本土无产阶级联合和斗争的便利条件，包括本身缺乏意识、对无产阶级组织的不熟悉、互相之间文化不亲近等原因。不联合，则竞争，那么移民无产阶级自然与本土无产阶级冲突。资产阶级当然乐于看到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便设立各种麻烦的条条框框，在世界制造贫穷促使移民产生的同时，又把移民当作二等公民般压制他们。这就是通过引入外来无产阶级来分化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不联合，最终降低无产阶级的成本，也就是降低需要付给无产者的工资。

“那么，那些拥有知识和技术，在企业就职，年薪十几万或者几十万，还有各种福利、舒适工作条件的人，如此富足，还是无产阶级吗？”一位工资刚刚维持生活的青年工人愤愤地说。好似声波在传播中会衰减一样，阶级观传播，如果不反复加以正确的解释，就易发生语义的曲解。某人如果拥有超出无产阶级平均工资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工资，那么似乎他无论如何都算不得“无产”者吧。这种理解浮于货币数量的表面现象。阶级，更准确的是从社会生产中衍生出来的概念。无产阶级，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如果论穷、论劳动，历史上一直存在贫穷的劳动阶级，但并不一直存在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指，资本主义下，没有生产资料，只能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某个无产阶级个体的工资多少，不影响他是否为无产阶级，那只是代表他从事行业的劳动力的价格。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价格受到供需关系的市场竞争影响，会发生波动。这个波动不是随意的波动，而是围绕一条水平线上下波动，这条水平线就是这件商品的平均生产成本，也就是创造一个符合条件的工人并维持其继续工作的成本。

这位青年工人同志所说的高薪人员，我们先假定他没有持有股份等等，总之，就是还是完全出卖他的劳动力，也就是让企业支配他接下来的工作时间来换取十几万或者几十万人民币。那么他拥有这样的高薪，并不难以置信，至少，我们应该承认，企业并不总是愚笨，他是能清醒地愿意用这样高的价格购买这位高薪人员。这种高薪是有基础的，根据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我们就能很快追溯得知两点。第一，产生这位高薪人员以及让他保持身心健康来高效工作的成本，要高不少。社会整体培育这位高薪人员投入了教育成本，这方面，一部分是资产阶级整体支付的，那么招聘时便不再支付，而另一部分则是无产阶级自己支付的，这构成雇员向资本家索要工资的一个基础和动机。为了让这位高薪人员拥有这样创造性的、灵活的思维，就提高了他的见识和素质，也使他不甘于一般的生活了，也更善于学习反抗斗争了。他购置价格较高的房屋，生活成本不低，又习惯于更富裕更高消费的生活，这样他才能保持心情愉快、心理健康。第二，资产阶级正在急于扩张这位高薪人员技术所在的行业的生产，而高薪人员还缺乏竞争者，又是价格在较高的水平线上，又向上波动了。于是，资产阶级愿意花这样高的价格购买不无合理了。所以，高薪人员还是没有生产资料，只出卖劳动力，是社会关系中当之无愧的无产阶级。他与资本家老板有工资的斗争，受到来自竞争者的威胁，并且，他下一个小时是否实现高薪，也取决于资本家是否还愿意继续购买他下一个小时。

然而，这位青年工人同志的指责并不完全错误。在我们的推理中，我们还假定了一个前提，即这位受到青年工人同志指责的高薪人员，处在竞争中的舒适区，使其劳动力价格高于其成本。这意味着这位高薪人员存在不少工资剩余，也意味着肯定有另外的无产阶级正在接受低于成本的价格。这决不是说，资产阶级是尊重人才，善意地向技术高薪人员提供馈赠，而高薪人员就没有遭受剥削。正相反，资本家是作为市场竞争、劳资斗争的不利者，被迫接受了这样高的价格。但资本家又没有坚决抵抗这样的价格，是因为他将可以使用高薪人员的劳动，去建造更高级的剥削体系。高薪人员是拿到了不少的工资，但他的劳动，也跟其他工人阶级一样，是在亲手打造更加锁紧自己的枷锁。资本家同时在迫切地寻求社会培养更多同行劳动力进入市场，以及推进企业生产进化，从两方面准备从高薪人员上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高薪人员的工资虽然数量较高，但生活的必要成本也同样较高，与工资收入大致相抵，那么他不处于担心失去工作、紧张地生活的矛盾中吗？

现在这位高薪人员有剩余的工资。如果，这位高薪人员使用他的剩余工资，不是用于生活，而是用于参加股份，是用于攀交上层、在投机倒把中谋利，最终使其收入结构大大转变，让资本利润占据了不可忽视的地位，那么，他便远离无产阶级了。他若没有放弃劳动收入，继续出卖时间、出卖劳动力，那么无产阶级面对的矛盾，他当然也会面对，他当然不会简单放弃掉这份收入，如果这还算可观的话，那么就要如同一个无产阶级一样斗争。可是，他已经开始发展资本利润，并且不可忽视了，那他必然要在无产阶级粉碎资本这一步下站到对面去。如果他有远见，那么就会从一开始就站到资本一方，即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奴仆。这时，这位高薪人员对于无产阶级来说，或者是敌人走狗，或者就是危险的朋友。无产阶级不能当他们当作依靠，而应首先夯实自己的实力和决心，然后再以胜利前途和美好未来的坚定允诺，争取他们在革命中到无产阶级身边来。



### 讽刺漫画“我们工业的守护者们”

所以无产阶级必须培养起一个完整的阶级观。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中，阶级观应当进入它们全部。阶级观不是一种仇恨观，宣扬它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居心回测的阴谋家。正确地说，阶级观是对社会中的人与人的经济和社会关系的科学认识，它只是忠诚地揭示社会贫富分化、相互对抗的本质。但是，阶级观不是纯粹一种研究方法，而是包含主张的战斗性意识。每个阶级都有其利益诉求，一旦它拥有了阶级观，就必然也必需立即在这之上研究联合与斗争的对象和方法。总之，阶级观已然构成一种武器，不拿起它，便不能打击敌人。

阶级观的内涵与应用，前面的段落我们已经从具体角度上进行了一些阐述。它可以概括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两大相互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普遍发展，使这种阶级对立已经在全世界发展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有内部分化和内部竞争，然而，决不可忘记的是，全世界的同一阶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根本的对立。社会上的斗争，根本的历史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应当打破任何试图分裂他们的谎言，团结起来向资产阶级斗争。而且，阶级关系是由生产的关系产生的，不能从其他的什么方面寻找基础或是作为逻辑的起点。

支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观，支持实现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它的根本主张就跟它的名字一样，实现“共产”，也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只能由无产阶级践行，实现无产阶级美好未来，推动人类历史向前进步的唯一途径。所有否定这一点的，或者口头上允诺行动上背弃的势力，都是无可置疑的无产阶级的敌人，是无产阶级必须粉碎的对象。从资本主义的核心北美，到各派政客纷呈的欧洲，再到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和反动派不死心的日本，到处都是资产阶级的家乡、无产阶级的痛苦发生的地方，这些都在反对消灭私有制。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要联合起来，在所有这些地方坚决斗争。

世界是我们的战场，国际是我们的武器。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共产主义队伍内如何处理“懒惰”

作者：杨袭



人类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生性”是趋于懒惰的。从古至今一切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取得的每个进步，都在力图让人们可以“偷懒”不去做那些重复、繁琐的事物。当我们审查自身时，也能看清“偷懒”是每个人脑海中的底层代码。这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件坏事，追求省力为我们留下了更多能量、规避了风险，是人类亿万年进化导致的结果。

但同时，我们不是自然力盲目的奴隶。人类社会的诞生也宣告了我们除了生存与繁衍之外有了更多“非兽性”的追求：我们往往会做出很多自然界中特立独行、“莫名其妙”的事情，比如我们为信仰、为理想可以抛弃一切，可以为食物、水源、性爱之外的执着的追求拼尽全力，事实上，现在我们参与到革命事业中就是最好的例子。人类的思维在不断挑战自然为其预设的自卫逻辑，从这种程度上，人类不仅不“懒惰”，反而将懒惰视为一生之敌。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等等耳熟能详的诗句，就以文化的形式反应着人类社会的“反懒惰”追求。前进的社会不拿“是人都会懒惰”掩盖停滞，反而要将这种停滞钉在耻辱柱上，告诫人们必须要克服自我设下的

障碍。我们在追求懒惰的路上越走越远，而这条路上前进的每一步，都以“不许懒惰”作为前提。

因为我们很清楚，现在没有人能躺“平”，只是向现实投降，躺在针毡上慢性自杀。

一个共产党人也是凡人，所以如前文所说，同志们必须彼此理解、自我谅解这种“懒惰”很多时候是不可避免的心理。对更舒适的生活、更少的繁杂事务的追求，是正当且自然的。但同时我们需要清楚：我们可以追求这样的未来，但不能在现在鼓励懒惰，因为历史仍然有重要的任务交给我等去实现。一场可能的灾难正在逼近，资本主义日复一日地让我们的社会在痛苦中挣扎……我们不能拿当下的舒适牺牲掉自己的未来。

很多共产主义小组因为懒惰成风处于实际上的停摆状态，很多革命者也因为“懒虫上脑”在自疚中沉沦。共产主义队伍内如何克服懒惰的倾向，是一个必须讨论的问题，也是组织建设上必须预防的威胁。

首先，我们要重视组织的力量。各种约束里，“自律”往往是最难的。我们是社会动物，在缺乏外部互动、监督、鼓励的时候，往往会打不起精神干任何事情。很多学生选择去图书馆学习“寻找状态”，差不多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一个革命者在集体中进行学习、讨论、工作、行动，效率远超过其单打独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被动宣发的尝试都起不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它们想要让被教育者以个体的身份进行学习，而不重视将个体组织起来的必要性。一个革命组织内成员间只有有了充分、常态化的交流，才可能将懒惰的习气进行清扫。

其次，我们要少点“钢印”，多些鼓励：很多小组打击懒惰的方法都是用最严厉的态度规定下条条框框，用逼迫式的方法、恐惧和威胁迫使人们前进。的确催促和提醒是必要的，但这里不能滥用纪律。纪律生效的前提是他能得到认可，而得到认可的方式，只有成员发自内心、主观的服从，不然一切规章终究都是废纸。我们需要更侧重于“唤醒”每个革命者内心的热情，用自己的感召力、对现状的科学解释使得其他共产主义者经过自己的思考得出“我必须做出更多行动”的结论。别人强加的，终究不是自己的；自己认可的，就会主动设下目标、进行自我监督和自我反思。

另外，我们必须慎重采用打击懒惰的手段，先进行充分的调查，再耐心地教育。一个人懒惰，是否是近来生活有什么困难、情绪有什么问题？要对同志们的个人情况进行谅解。我们帮助人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不是直接将人从温暖的被窝拖进寒冬腊月的室外，而是先为其穿上棉袄。要循序渐进地一方面批评不足之处，一方面表演做出改变的尝试，号召其将自己培养成主动、积极的共产党人。这里我们要留出充足的时间，并在不损害组织整体效率的前提下给予相当程度的容忍。

最后，在必要的时候，需要灵活地树立正面典型以供同志们学习，树立负面教材让同志们引以为戒。这样，我们能看到积极主动换来的是实际的工作成果、对革命运动正面的影响和其他同志的认可，也清楚如果被动消极，则会得到鄙视、成为自己最讨厌的样子。当看到无意义再进行挽留、已经自暴自弃之人时，也需要大胆地进行正式的警告，甚至是清除。我们需要让同志们清楚，对懒惰容忍的底线是一个人

是否还有想要“改变懒惰现状”的意愿，组织绝不是过分让步的。

人不在多而在精，如果我们能将党内尚“不勤快”的同志们都用这种方法调动起来，那他们将爆发出惊人的潜力。同时，每一位同志都需要时刻进行自我观察，将退回到舒适区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面。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资本主义国家的群众运动：革新与坚持

作者：过涯



### 引言

站在我们新一代共产主义者的角度回头看过去时代、20 世纪、以及我们现在所处的 21 世纪，有件事情是几乎完全无需讨论的：“只要资本主义还在，只要少数人掌握生产资料、多数人只能出卖劳动力，政治抗议就不会消失。”它可以有千种面孔，可以是罢工讨薪，可以是街头的白纸与警察面前的学生，可以是一句“我们是最后一代！”的陈述，还可以是比 20 世纪二战政治讽刺报更加激进、更加灵活的网络迷因。但自始至终，有一颗核心，贯穿了比这更久远的过去，直指着现在与未来——有压迫，就会有反抗；有反抗，才会有革新。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群众运动的基本形态以及其与革命的联系。相比于革命而言，群众运动的定义更加广泛，例如从和平的、非暴力的到包含暴力因素的运动都可以被划分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同时，群众运动和革命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群众运动是革命的一大组成部分，革命也会由群众运动的爆发和普及而走向壮大。列宁曾在 1899 年就以罢工为例阐释了群众运动的两面性：“在所有的

国家里，这些个别的反抗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全面斗争”（弗·列宁《谈谈罢工》）。

## 运动的坚持：政治诉求与反压迫

当国家暴力机关、资本压迫与社会群体矛盾构成治理常态时，政治抗议便不再只是偶发事件，而成为现代社会内部必然出现的反压迫机制。

20世纪中后叶的政治抗议，是在机器轰鸣、资本增值和炮声中的资本主义的所谓心脏地区成长起来的。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发现学校与军工智库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勾连，并计划在哈莱姆修建‘种族隔离体育馆’，于是发动了以占领汉密尔顿大楼、塞斯·劳纪念图书馆等教学行政楼为标志的一系列抗议。



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抗议

越南战争与种族隔离这两大爆点，使得哥伦比亚大学内爆发了一轮轮的群众运动，学生静坐、占领教学楼，从校园走到街头，用自己的身体对抗国家暴力机关。4月30日凌晨，纽约警方突袭校园，逮捕700余名学生，约百余人受伤，但最后，抗议迫使学校取消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体育馆计划，并退出IDA。这次运动透露出了此类政治抗议的一个共性：政治诉求从对个体事件的不满到向国家机器的反抗的必然上升。

以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为例，运动可能是因一场战争而起，但其所反对的从来不只是某一场战争，学生们反抗的是那一双随意摆布人民生命与未来的血腥的双手，是那为了帝国之利益或种族隔离而犯下的暴行。那一代人的抗议方式相当经典，在大学、工厂、广场展开的传单张贴、标语绘制、集会、游行、罢工、静坐、绝食。用自己的肉体与精神作为燃料来燃烧自我。

若哥大抗议揭示了反帝国主义与反种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么五月风暴则展示了反官僚国家与反规训结构的另一种生成路径。同年，法国五月风暴席卷巴黎，这一运动的结构根源来自于1958年所建立的戴高乐主义给予总统过大的政治权利以及荒谬僵化的官僚体制，这一制度造成了大学扩张，造成资源紧张，管制化严重；间接导致前往新建校区的学生们首次直面贫困阶层与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与被压迫的产业工人多年的经历形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共同体。运动起于楠泰尔游泳池剪彩事件，大学学生对教育制度僵化与治理排除的不满，却迅速蔓延至工厂和公共空间，形成一千万工人的大罢工与社会停摆。这场运动有着强烈的反权威主义特征，并对资本主义和父权制度提出尖锐的批判与反对。

自1968年5月3日的索邦大学群众游行起，警方强制镇压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但当时法国共产党及其部分左翼对于这一行动的判断是“左倾冒险主义”，并强调革命的主体应为工人而非学生。



五月风暴中的示威人群

直至5月9日，法国学生全国联盟依然声明学生继续罢课。在5月10日的五月街垒之夜与次日，有一件事发生了，一件促成了被压迫的学生与工人的连结，升级了所有局势的事。于五月街垒之夜次日的来自《星期日日报》的一次报道惹恼了正在罢工的技术工人与停止报道的记者，法国国家广播电视员工通过法新社发表声明抗议审查。法国总工会的罢工号召迅速赢得了当时正在漩涡中心的学生的支持。

这一群众运动持续了整个5月，甚至于影响到了世界，中国人民群众开始为期三天的天安门游行示威以支持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直到6月的中下旬，参与运动的学生与工人才被武装暴力彻底镇压。这60年代工人运动史上最重要的反压迫群众运动之一，虽以挫败收尾，但仍然对社会思想发展与进步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新的价值观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后面进步文学与性解放革命的诞生。

从这两个群众运动事件不难看出，群众运动的“连结”与后续陆续出现的国际声援、进步文学、性解放、女权运动等，就像是一次运动方法进化的前奏。正如引言所言：和平的、非暴力的到包含暴力因素的运动都可以被划分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

## 运动的革新：方法的进化

群众运动的影响力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而被无限扩大化。借着这一媒介，有了许多全新的抗议方式，有了比曾经更加激进、更加新颖的运动方式。在信息发达的互联网时代，每一种抗议都并非局限于个体，而是一种多元化的、多样式的政治抗议，是一个可持续、可发展的抗议。这些抗议将不会再因信息传递的限制而完全独立于群众运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的角色同样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的政治艺术多是“大字报式”的：宣传画、工人歌曲、反战戏剧，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路线。互联网的信息流通高度使得讽刺漫画、恶搞视频、网络迷因接管了过去街头巷尾政治运动海报的位置。任何人都能在手机上做出一张图，用各种技术把政客、资本家的形象揭露为笑柄，于群众中的网络环境中成为小丑。权威形象在一次次嘲讽中被削弱，庄严的官方语言在一轮轮二次创作中显得滑稽。这种持续的文化消解，本身就是对统治秩序象征层面的攻击，在网络上对“正统”与“严肃”最大的反叙事政治抗议。

随着运动的多元化，即使在现代威权国家中，性解放运动、反父权运动与进步文学仍然会相之于五月风暴一样蓬勃发展，无声的政治抗议也开始成为了无法杜绝、无法阻止、却比传统抗议路线更加刻骨铭心的新开始。对现有社会、家庭、传统观念的一次激烈反抗，对生育、婚姻的拒绝的网络运动在各种各样的媒介中传播。在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亚洲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批人以“出生罢工”之名公开宣布：“我们是最后一代！”不婚不育、躺平、牛马、韭菜等词语逐渐成为一代人的口头禅，成为群众运动的新产物。要强调的是，这种新型的群众运动形式绝非对于革命的戏谑化，群众运动和革命绝对不是二元对立的。

## 运动革新的实际运用：政治诉求与反压迫的运动革新

尼泊尔的“Z世代抗议”就是鲜明的例子。2025年9月4日，尼泊尔政府颁布命令，封禁26个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YouTube、WhatsApp、X等），理由是这些平台未按新规在尼泊尔注册。在一个长期被腐败、裙带网络和贫富悬殊折磨的国家，年轻人本就饱受压迫。然而在这样高压迫、高剥削的社会之下，从政府粗暴封禁社交媒体平台的那一刻起，网络上的抗议就在一瞬间成为了现实中的抗议，因为曾经互联网上他们本就有限的表达空间，是他们为数不多可以提出不满的净土。

不满不只是停留在了网络上的控诉，而是涌上了街头。组织动员不再只依靠传统意义上的政党领导人或工会的社区代表，而是通过新闻、社交软件、视频平

台与线上群聊进行。9月8日起，加德满都的迈蒂加尔曼荼罗（Maitighar Mandala）、联邦议会大楼附近的新班什沃尔，以及多座城市的政府大楼前爆发大规模示威，很快蔓延为全国性运动。抗议现场不断被拍下、直播、转发，让更多人亲眼看见武力镇压、子弹和催泪瓦斯。

网络平台 and 现实抗议，就在这信息传播极度发达的情况下，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展现了一套串联式的组合技。整个运动中至少 70+ 人死亡，2000 余人受伤，但抗议最终胜利，迫使政府解除社交媒体封禁，并在巨大压力下出现总理辞职等政治变化，被不少媒体称为“尼泊尔史上前所未有的 Z 世代起义”。

另一个例子则是 2022 年的中国“白纸革命”，这一带有政治诉求的群众运动起初以四通桥抗议、拉萨游行与富士康抗议发酵，并于年底的乌鲁木齐那场造成十死九伤的高层火灾之后迎来爆发，并由乌鲁木齐悼念运动引来一阵高潮。

人民群众看到的是百姓、孩子在救援迟缓、通道被封，惨叫着死在了楼中。悼念与愤怒在两三天内，从新疆一路蔓延到上海、北京、南京、成都等至少二十多座城市。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一带，示威者有人高喊：“不要核酸，要自由！”“不要健康码，要人权！”



被称为“白纸革命”的群众抗议

在乌鲁木齐悼念活动中，迫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之下，正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一样，群众很快在非暴力行为之下进行了非暴力群众运动方式。站在警察面前的人民群众，反抗政权的大学生手捧着鲜花、白纸与烛火以悼念姿态讽刺中国政权。当国家暴力机关对于这一运动行为做出阻拦，甚至污名化为“境外势力干预”，群众就可以以“请问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白纸能有什么攻击力？”“我拿着鲜花我犯法了吗？”进一步拷问暴力机关的执法合理性。

这在群众运动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如我们的另一篇文章所写那样：“其次是执行者本身也是人。国家的强制力最终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执行，因此官僚、警察、特务、士兵并非抽象的机器齿轮，而是有情感、有私利、有道德感、有认知局限的个体。他们可能会因为惰性而敷衍了事，因为私利而选择性执行命令，因为基本的同情心或道德感而在关键时刻犹豫不决，或者在层级传递中曲解、篡改政策，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普遍局面。这种无处不在的“个例”的因素，使得国家意志在从顶层到基层落实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被稀释、扭曲和变形。统治者或许可以颁布最严酷的法令，但无法保证每一位执行者都以同样的狂热与效率去贯彻它。这种“裂隙”是任何制度设计都无法完全弥合的。”（《共产主义者》编辑部《所谓“极权主义”的神话》）这时如果暴力机关的强制执行一旦进行，那么视频与图片则会以相当快的方式传播，进一步扩大运动的影响力，为群众运动制造良好的宣传窗口。

一张白纸，没有任何文字，却承载了对言论对人命轻贱的无声怒吼。全国各地掀起的运动巨浪、现场信息的流传、针对这一信息流传而生产的艺术作品、视频、文学作品与历史史料则会成为进一步辅助未来群众运动的佐料，进一步给出未来运动的流程。即使网络流传的运动产物被政府迅速删掉，也恰恰进一步证明了白纸所指向的现实。这样的运动方式，诞生了自 89 年天安门抗议以及佳士工人运动之后，令全世界震惊的大规模群众运动。

## 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核心与薄弱点

越战时期青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对戴高乐主义积怨已久的法国学生工人团体；对尼泊尔政府高压管控不满的 Z 世代；中国群众的“白纸革命”都反对把生命和自由都牺牲给抽象“稳定”的统治。他们都在各自的语境里、各自的方式中，在相同的困难与处境，在一样的历史问题中，对同一个事物说“不”。在这样的分析下，一代又一代的政治抗议，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断激化，逐渐成为了不同形式的模样，为同一个问题、同一个目的出发。然而，仅仅有这些自发的抗议还远远不够。虽然相当多的反抗具有一定的组织性，但简单地对单一物质事件进行反抗，并仅仅只是对此产生反抗，会很容易被镇压、被消解，让矛盾被几条没有用的妥协消解。

尼泊尔的青年如果仅仅只是在家里发几句牢骚，那他们根本做不到今天的成果；“白纸革命”中的中国百姓如果还是只是在忍耐，就不会有那段时间的抗争，“不生、不婚、不卷”如果永远只是个人层面的自保，就很容易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各人有各人的选择”。

## 资本主义国家群众运动的出路

随着时代的发展，群众运动参与的门槛被压得越来越低。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信息传播，一个群聊就能完成动员，一个艺术作品就能宣传政治诉求。过去要靠组织者、领袖、传单和集会，如今一个匿名账号就能做到。风险没有真的消失，但被分散得足够细，让国家暴力机关无法像上世纪一样简单粗暴地对群众进行压制。这让一些

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群众们也有了参与运动的机会，让有些胆怯的群众们能跨越这个门槛。这样的结构使得每一次群众运动都会实现比以往更加深远的影响并形成持续的社会惯性，每一次浏览、每一次发布都是每一个人的一份力。只有与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联合起来形成持久化、制度化的阶级斗争团体，才能推动真正触及根基的改变，才能有推翻资本主义的能力。列宁已经对此作出了解释：“自发的群众斗争只能停留在经济斗争水平，必须通过政党——即组织化、制度化的先锋力量——才能将斗争提升为政治革命、触及国家根基。”（弗·列宁《怎么办》）

群众运动应被引导向政治性运动，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是在对立统一中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只看单一事件，而是要对这一事件的所有逻辑思考，而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无法被否定的重点：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必然会发展为政治性的运动。正如列宁所言：“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必须组织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必须在这个基础上到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即帮助工人去同厂主进行日常斗争，叫他们注意压迫的种种形式和事实，从而向他们说明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弗·列宁《列宁全集》）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从来不是“多抗议几次就好了”，而是要把这些反抗经验累积起来，转化为对制度整体的反思和实践路线。这并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很具体的判断：“只要生产资料仍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只要经济运行的最终目的仍是利润最大化，只要国家暴力机关依然在运转，那么再多的抗议也会在一次次爆发后被消解，被妥协，然后不了了之，成为某些‘职业革命者’的商机，再一次剥削人民，而矛盾迟早会以新的形式爆发。”正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在其统治的一个世纪里所创造的生产力，超过了一切过去的世代；然而，它也生产出了自己的掘墓人。”（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只要这种坚持还在，只要人们还愿意以各种方式说“不”，只要我们可以坚持让所有的政治抗议，无论程度、无论方式、无论目的，只要群众运动还在继续，转化为阶级斗争的政治抗议，共产主义的问题就永远不会过时。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我们不该以什么心理参与革命？

作者：杨袭



我们不能把参与革命当作逃避现实的替代。

很多青年想，生活是这样的枯燥、学业是这样的无味、就业是这样的惨淡……与其过浑浑噩噩一生，不如去干革命！革命工作让我感到有归属感，也让我感到快乐，难道不是一举两得？

这句话其实没错。对于一个自觉的革命者，从事自己喜爱并认为有意义的事业，远比被异化为资本增殖的螺丝钉更有吸引力。多少革命青年，不是因为社会所灌输的一套“美好愿景”在现实中赤裸裸的破产，才产生了思考和反抗？哪怕是衣食无忧者，不也在精神的匮乏中挣扎？对现实的不满推动人们走向激进化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但我们不能无视的是，革命工作激励人心的同时也是艰苦的。如果仅仅出于逃避不堪现实的目的参与到队伍里，那革命者很快就会发现哪都不存在“一方净土”：事实上，加入一个真正有抱负、有能力的共产主义组织的话，进行政治工作的压力远高于普通人在生活中所承受到的。我们不能潜意识告诉自己革命工作相对于生活是

更加“轻松”的。它更有意义，每一份贡献都事关人类的未来，因此它需要最多的耐心、劳累和牺牲。



### 在革命的持久战中学会管理时间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列宁在下国际象棋）

更不用说，哪怕参与革命，生活也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它是如何逃避都不能躲开的。即使是全职革命家，也不是二十四小时每周七天忙碌于政治工作。为了革命者的身心健康——这进而决定了其工作能力和动力——我们都有责任处理好自己生活的琐事。无论是培养兴趣爱好还是进行社交，找到合适的消遣方式永远都不是疏忽了革命工作，相反是在成就它。

日常生活问题和长篇大论的革命道理同样需要我们考虑。

我们不能把参与革命当作与生活毫无瓜葛的“副业”或“爱好”。

革命从不要求每位革命者都成为全职的革命者，首先这在组织、经济现实上是不可能的，其次在个人层面不同革命者作出的选择是不同的。换言之，革命不说“你必须作出最大程度的牺牲才可以加入我”，它开放地欢迎一切革命者、支持者和同情者去共同改造这世界。

但这不代表我们该保留这样一个幻想：我有双重身份，政治和生活互不干扰，干政治就有空帮帮忙，生活照常继续……我们需要清醒，这是不可能的。人的精力有限，参与政治活动必然影响生活（当然，左圈把政治性讨论当作生活娱乐的人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他们并非“参与革命”）；除非展示出了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人作为一个个体在社会中也不是“多个面目的伪装者”，革命者必然与原先非政治性的自己也将有所不同。

我们作为革命者该追求的稳定的贡献和持之以恒的立场。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习气自然是培养不出人、建立不了队伍的。参与到革命队伍的那一刻，就代表着我们

在其他方面要作出取舍。工作，学业，或是人际关系等等，都要提前意识到可能的影响。

革命工作也必然带来危险。如果幻想着自己聪明绝顶永远不会被警察发现，那只代表对革命没有作出除了加密平台辱骂中国政府之外更多的贡献。革命工作的安全性不是“绝对”的，随着工作的开展，我们必然会承担风险换取更多效益，百分之百的隐蔽就代表着百分之百的隔绝于现实世界。革命者如果只将革命当成爱好、从来没有严肃思考过自己投身于这个事业将会对自己未来造成的影响，那只会不幸发生的那天彻底慌神，成为投降的叛徒。

革命者可以选择作为兼职革命者，也可以选择成为全职。但无论如何，政治活动都是一门“工作”，这代表着责任和义务。我们做出决定的时候，要清晰地规划自己的人生。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我都懂，但没用”：犬儒如何吞噬左翼的行动力

作者：田野



近期笔者采访了一位日本左翼青年。他说得很坦白：“我们这一代日本左翼其实看得到社会的问题，但根本不觉得自己能改变什么。许多认同左翼理念的朋友也只是抱着调侃和无奈的态度谈论政治，觉得参与行动不过是徒劳。”这番话让笔者印象很深。这位日本青年表面上关心政治、口头上批判时弊，却对实际斗争抱以冷嘲与疏离。这就是当今“犬儒化左翼”的一面，这里的“犬儒化”是一种倾向，而不是一个可以一棒子打死的群体标签。现实中，很少有人从头到脚都是“犬儒者”：有的人在宏观政治上冷淡，却在社区互助、反歧视、劳工议题上很投入；有的人嘴上嘲讽，私下仍愿意做一点实事；同一个人也可能在不同人生阶段摇摆、进退、甚至自相矛盾。我们承认这种复杂性，不是为了替犬儒开脱，而是为了避免把批判写成道德宣判——因为那种“你们都不行、只有我清醒”的姿态，本身也是犬儒最熟练的语言。

犬儒主义原本是古典哲学流派之一，强调蔑视名利、以嘲讽反抗权威。但现代语境下，“犬儒”更多指一种玩世不恭的退场姿态：它不一定是彻底无知，相反往往带着“我都懂”的表情；它也不一定完全不关心，反而常常来自关心后的受挫。当前左翼话语空间里，这种犬儒化倾向越来越常见：对资本主义的不公充满不满，却对

组织斗争、反抗资产阶级统治缺乏信心；自称“看透一切”，于是对任何改造现状的努力先行嗤笑。它有历史与阶级的根源，也会在组织与理论上产生真实的消耗。犬儒化左翼最直观的表现，是一种强烈的“非行动主义”。他们可以用激烈的语言批判现实，揭露资本的冷血与制度的不公，也能迅速捕捉时事的荒诞，写出批判资本主义的段子；但一旦谈到行动比如组织罢工、参与群众运动、建设长期组织，他们就会下意识后退。

他们常把这种退场解释为“理性克制”，仿佛只要有所行动就是必然失败的。可许多时候，这种所谓理性其实是缺乏反抗的勇气，害怕付出成本、害怕失败、害怕承担风险。于是最安全的姿势，就是自己躺平原地不动但是随时做一个评论者，既能表达不满，又无需承担后果。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知行脱节：对不公心知肚明，却仍选择袖手旁观。这个矛盾很尖锐：他们不是看不见问题，而是把“看见”本身当成了退出的理由。



## 犬儒主义

与非行动主义相伴随的，是对宏大历史愿景的系统性否定。犬儒化倾向者往往不相信革命、共产主义等宏大的历史愿景，认为那是乌托邦，甚至是骗局。他们热衷于揭露历史运动和英雄人物背后的瑕疵，以此证明“崇高”只不过是幼稚或虚伪。他们会引用失败案例来佐证“人性自私”“历史终结”等论调，把超越个人利益的信

仰讥为笑话，口号式地把价值虚无说成“现实”。但这里需要更严肃地澄清：宏大叙事并不等于欺骗。确实，现代社会里宏大叙事经常被统治阶级滥用，成为遮蔽矛盾的口号；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宏大叙事的出现本身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生产交往与社会关系）不断扩大后的必然结果。《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所说的广义交往，意味着当社会关系从局部走向整体、当个体命运被工厂、资本、国家乃至世界市场深度捆绑，人们就必须用更整体的方式去理解现实。此时拒绝宏大叙事，反而容易陷入“只剩感受、不谈结构”的局限。因此，问题并不在于宏大叙事是否存在，而在于：谁在讲、讲给谁听、叙事是否能被实践检验、是否指向被压迫者的解放。把“宏大叙事被滥用”直接推导为“宏大叙事必然是骗局”，并不是更深刻，很多时候只是更轻率。它看起来像洞察，实则是对历史唯物主义不彻底的理解：把政治缩减成话语，把结构缩减成故事，然后用一句“都是叙事”结束讨论。

犬儒左翼者经常把历史挫折转化为固定的失败主义结构。他们内心预设斗争必然失败，于是在尚未尝试之前就先行放弃。他们会不断罗列历史上的受挫与退潮：六七十年代的运动被镇压、苏东解体、工运低潮……这些事实当然真实，甚至必须正视。但在犬儒话语里，它们被当成一种“铁律”：既然过去都失败，现在努力也只是徒增失望。

于是，“经验教训”成了不行动的凭证：不行动，是因为“我清醒”；行动的人，是因为“你幼稚”。这种逻辑最危险之处在于：它把失望扩大为放弃希望，又把放弃希望包装成成熟姿态。结果就是，在无产阶级尚未充分发动之前，斗志先在内部瓦解。于是为了让退出看起来更合理，犬儒主义者常表现出一种刻意的“政治冷感”。他们声称一切政治皆肮脏，把冷漠包装成清醒与成熟，仿佛参与斗争是幼稚天真的表现，而置身事外才是明智。许多时候，这确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不卷入任何可能失败的集体事业，以免自身受挫。

但如果我们只把犬儒理解为“虚无”，会漏掉它的一个内在机制：犬儒往往并非道德感缺失，反而常带着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很多犬儒化左翼之所以批判得尖，恰恰因为他们对暴行、压迫、不公高度敏感；只是当这种朴素道德意识缺乏理论与组织的承托，它会经历一个转折：从“我无法容忍”变成“我无能为力”。在“无能为力”的位置上，人最常做的不是承认脆弱，而是制造防御。用嘲讽替代行动，用冷笑抵御道义召唤，从而免除良知的不安。于是就出现那种熟悉的语气：“我不在乎，我只是早就知道没用。”这句话表面上是冷静，实际上常是被现实反复教育后的止痛药。它让个体心理保持自治，却以集体政治的瘫痪作为代价。犬儒主义的核心矛盾也在此：理性上承认资本主义的罪恶，意志上却选择与现状合作；批判得越猛，行动越轻，最后批判反而变得无害。

犬儒化倾向并非凭空产生，它有特定的社会历史土壤。过去几十年革命运动的挫折、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工人运动的长期低潮、苏联解体。确实在客观上造成左翼力量衰退，也在主观上留下了失败感。当集体政治行动退出舞台，大众注意力转向个人生存与消费，宏大理想黯淡，犬儒就乘虚而入，填补了政治退场后的文化空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认为“除了照顾好自己，没有更高的追求”，而放弃抵抗反而被误认成成熟。阶级结构的变化进一步加深这种倾向。与此同时，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擅长话语表达却缺乏革命实践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左翼话语空间占

据显著位置。他们既不处于最沉重的压迫之下，又缺乏改变现实的权力，于是容易陷入一种内在矛盾：批判欲望强烈，但行动意愿薄弱。犬儒，便成为他们平衡矛盾的一种方式，既能保持“批判者”身份，又无需承担“斗争者”的代价。更重要的是，小资产阶级式的虚无与超脱会向下渗透：当工人群众在缺乏组织和方向时接触到“革命没戏”“先顾自己”的犬儒论调，就不再相信集体力量，这样一来，资产阶级统治反而更稳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容纳大量犬儒情绪，正因为它具有高度可兼容性：你可以抱怨、吐槽、批判，甚至可以在语言上非常激进；但只要这一切停留在情绪宣泄与姿态表达，不转化为组织化的持续行动，现存秩序就不会真正受威胁。批判被中和，革命性被消解，犬儒便在客观上起到麻痹与分散的作用。但如果只把犬儒当作纯消极因素，也未必完整。犬儒情绪深处往往潜藏着一种渴望：他们并非不想胜利，而是不相信能胜利；并非不想集体，而是不相信集体可靠。也就是说，犬儒并非要一条路走到黑，它具有可转化性：如果出现一种真正声势浩大、能够自我保护、能够积累胜利经验的运动形式，这种犬儒情绪反而可能迅速松动，转化为革命的推动力。正因为犬儒常源于失望，它在遇到现实的希望时，也可能产生更猛烈的反弹。

犬儒主义的危害不仅在思想层面，它更直接侵蚀革命组织建设与理论发展。它首先瓦解组织纪律与团结。真正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依赖成员对共同事业的信念与奉献，而犬儒主义者天生怀疑集体行动的价值，往往以“独立思考”为由拒绝执行组织决定，对组织倡议冷嘲热讽，散布“干这个也没用”的情绪。久而久之，纪律被视为权力欲，团结被视为幼稚；组织内部充斥挑剔与揭短而非建设性解决问题。犬儒像腐蚀剂一样，让队伍失去向心力和战斗意志。在组织层面，犬儒倾向还会否定先锋队的必要性。犬儒者常用历史上一些组织蜕变的教训，以偏概全地断言任何自称先锋的团体最终都会追求自身利益、背叛群众。于是“先锋队”被污名为精英主义或权力野心，组织化被当成必然堕落的开端。其后果是：真正愿意承担责任的人得不到信任，运动失去明确路线和领导核心，沦为散沙。理论层面上，犬儒倾向也会扭曲革命理论的发展。革命理论需要总结经验与时代发展相结合，但犬儒化知识分子往往热衷碎片化解构：缺乏对经典理论与现实的深入思考和实践，却急于宣判“过时”；到最后，犬儒姿态在客观上与改良主义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形成某种默契：它不需要正面反对革命，只要不断制造“不可能”的氛围，就能营造一种革命必定失败的论调。更危险的是，犬儒具有传染性，尤其伤害新生力量。年轻人进入左翼圈子，若首先听到的是“革命没戏”“先顾自己”的冷嘲热讽，很可能在尚未投入斗争前就心灰意懒。犬儒前辈以过来人姿态教育新人“不要幼稚”，实际上是在把失败主义当作成熟标准。一个运动若把希望当作笑话，它就很难更新壮大，只会自我封闭在聪明的自嘲里。

因此，批判和克服犬儒主义倾向，对重建左翼战斗能力至关重要。但必须承认：犬儒不是靠口头训斥就能消失的。犬儒之所以顽强，是因为它回应了真实的挫败经验与生存压力。要克服它，需要思想战线与实践战线同时推进。第一，要在理论上揭露犬儒的实质，动摇其“合理性”根基：犬儒并非清醒智慧，很多时候是被打败后的精神自保与认命哲学。它假装超脱，其实是对现状的变形服从。尤其要指出：犬儒常把历史失败当作“铁律”，却忽略历史从来不是直线的。转机不会在退场中出现，只会在坚持斗争、总结经验、重新组织的过程中孕育。把失败当结局，是犬儒最擅长的偷换；把失败当过程，才是革命者的基本训练。第二，要把“宏大叙事”

从空洞口号里夺回来，重新同现实斗争连接起来。社会主义不是靠热血维持的幻想，而是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现实回答与批评。我们当然要批判历史经验中的错误与蜕变，但不能把批判变成否定一切的借口。关键在于把理想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可见的战略与路径：提出过渡纲领、建设组织网络、在现实矛盾中找到可落脚的抓手，让人看到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而不是制造“要么乌托邦、要么投降”的假两难。第三，克服犬儒最有效的方式，是发动实际斗争，让群众在行动中见证改变的可能。政治主体性不是靠空谈建立的，而是在斗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从工作场所维权、社区互助，到更广泛的工人罢工与社会运动，每一次哪怕局部的胜利——争取权益改善、阻止不公政策——都能成为反犬儒的生动教材：它让人亲眼看到“联合起来确实能改变点什么”。即使斗争受挫，也要总结经验、保存力量，通过持续的小胜积累信心，动摇“斗争必败”的预设前提。

最后克服犬儒并非朝夕之功，但方向很明确：要思想批判揭露犬儒的虚假和软弱，要组织建设可靠的集体，要从实践中获得胜利。先锋队要发挥作用，带领无产阶级建立真正的斗争意识、革命意识。用真正的无产阶级斗争力量战胜犬儒主义。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我们的建党路线与“左圈”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



中国互联网“左圈”早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旱厕，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关“网左”的笑话和丑闻层出不穷，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承认，开展工作前先要克服的不是统治阶级传播的偏见，而是打着革命旗号“玩网”的左圈分子塑造的刻板印象。很多人并不是不支持共产主义思想，只是他们所能见到的“共产主义者”们，并不给予任何人信心或好感。正如我们曾说，它“散发出一股难闻的尸臭”，不容分辩地窜进每个人的鼻子。

《共产主义者》这一段时间从“左圈”的对外表现——包括但不限于小团体、抽象恶俗、中二幼稚等等——揭露了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浅尝辄止和恶趣味文化本质。我们需要补充对“左圈”的恰当定义范围：互联网上的左派社群不代表左圈（尽管如果他们不及时找到方向组织起来，就会被融入左圈，这正是现有左圈的前身），左圈特指已经形成闭环思想体系、被偏执和疯癫统治的那些人和组织所代表的现象。

共革阵此前没有对这种互联网现象的成因深入解释。如果只是笼统地将矛盾源头错误归咎到左圈恶俗者的“恶劣品质”、“低龄”或“人格缺陷”上（当然他们的确

也有这些问题)，那就无法理解左圈的深层成因，更找不到打破左圈的出路。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左圈的成因和发展，以及共产主义者对左圈的处理方法和这为我们建党路线提供的新思路。

## “左圈”的成因和威胁

左圈如同与之“对立”的极右翼互联网群体一样，不是个人恶劣品行汇总起来的“圈子”，而是深受后现代主义潜移默化影响的社会现象。后现代主义通过统治阶级的学校、媒体、公共集会、文化场所等精神生产资料在人们心中塑造了对任何“宏大叙事”的不信任感，10年代后电子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它在中国的传播。它在日常生活里隐形地侵蚀着人类的思想，被后现代主义裹挟的普通人，往往都没有听说过“后现代主义”这个词。

资产阶级十分清楚“有压迫就有反抗”，于是便鼓励、发展后现代主义为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它能在吸收反抗的同时，又不至于对阶级结构造成太大的挑战。后现代主义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现实，因为群众在实践中感受到的就是现有制度的荒谬，它能够提供一个解释世界的框架；但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可以让这些反抗原子化、变成单纯的情绪宣泄，而不让其升华为集体行动。我们看到的那些让人厌恶的烂梗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它们的核心还是在于对宏大叙事的解构，从而追求一种“个人的生活意义”，但是由于缺乏系统化的认识，使得他们就只能用这些梗来填补空虚。

与其说这是一种“娱乐化的政治”，不如说是一种围绕政治展开的娱乐亚文化。一个确凿的事实可以被用来证明这点，那就是各种“左群”的生命周期、左群混迹者的诞生和随后的发展轨迹。

活跃在各互联网平台的左群，如果不围绕某种具体工作展开（比如制作视频、出刊），只是单纯的“交流”性质，那都是创立之初非常活跃，但在三月到两年之内就会逐渐变成死群。这是因为，这些成员往往都是因为学业、生活压力和社会舆论开始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但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基础都受到中国共产党官方叙事的影响，对历史人物有个人崇拜，有根深蒂固的慕强心理和中二、自恋的人格缺陷，伴随着对历史一知半解，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英雄史观、“地摊文学”深度捆绑，使得左群内的群聊在这种群友之中只能是以“串”或者淫秽的“暗语”冲塔的方式进行情绪宣泄，而不是真正的思想交流，那聊天聊不长久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哪怕办出来了报刊或者搞什么“融工”，也会因为错误的理论基础只能导致错误的行动，缺乏建党路线的领导，最终因为干不出成果就在士气的持续跌落中变成死群。

混迹左群的人，之后绝大多数不是离开了左圈成为真正的革命者，而都是对这个娱乐方式失去兴趣，回到了自己加入左圈前的状态。如果左圈属于一个“革命的不成熟状态”，属于一个“娱乐化的政治”，那按照自然发展，其成员应该是在脱离左圈之后进入“成熟”的状态，用严肃的政治替代娱乐化的政治。然而事实与此相反，左圈混迹者之后大多是找到了新的娱乐方式，或者因为生活的压力无暇再在互联网上浪费时间。

事实就是：左圈从来不“引导”共产主义思想同情者成为真正的革命者。左圈让同情者对共产主义思想彻底失去兴趣。

左圈的发展作为一个社会悲剧，反映的是资本主义末路的癫狂。正如我们经常说：资本主义的晚年，人人都是“精神病”，无非是程度不同。疫情后新催化出的左翼青年们，在思维发育形成的年代很多时候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引导，反而是在互联网嘈杂混沌的冲击下走向了“宏大叙事”的另一个相反面：没有世界观、没有原则、没有思想，只剩情绪。

我们承认左圈“原子化的反抗”在作为控诉不公的启发点时的先进性，但同时我们指出，左圈的发展和泛滥是被资产阶级一手鼓励和培养的，它的延续也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利而非有威胁的。它像是一个阶级秩序的“泄气阀”，一方面允许不满者吐槽，另一方面阻碍人们形成有组织的力量和系统化的思维体系，限制人们作出真正的改变。

无数聊天吹水讨论不出真正的思想，千万争吵骂战分不出真假革命。左圈每日都谈“革命”，却同时尽一切可能让人们不把精力放在真正有关革命的事情上。它把左翼青年吸引到互联网社群里原地踏步，而不是作为一个“过渡平台”将对共产主义感兴趣的人引导着组织起来。

我们因此说，左圈是一个切实的威胁。左圈不是革命发展不成熟阶段的产物，它的存在就在阻碍革命走向成熟。一个革命者，从来不是必须先接触左圈才能进一步发展，之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它是青年的“入门砖”，这不代表是一个好事，而意味着左圈正在进行误导。俄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人们在民粹主义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后，无需先成为一个民粹派才能走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将青年从民粹主义中解救出来，不是靠着迎合和奉承，而是在民粹派的绝望抵抗下对其进行彻底的揭露，而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它现在严重败坏共产主义思想的形象，让激进青年自绝于社会的广大群众，并误导革命者浪费时间、多走弯路，为其提供了一个温馨但致命的舒适区，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必须反对，而不是回避左圈。

## 共产主义者针对左圈的处理方法

同样厌恶左圈的诸多革命者，实在不想和这类群体有任何纠缠，看到任何人对左圈提出批评，便站在一旁说：

“你们真是闲的，理他们干什么，观感多不好。”

我们理解这种考虑，没有人想要每天和恶臭、讨人嫌的事情打交道，但事实是到底需不需要处理，它不取决于我们的感受。“绕开”左圈是不现实的，这只是在回避问题而不是想解决问题，就像取消主义者干等革命爆发，不去做实际的组织工作推进革命发展一样。我们问这样想的同志：左圈的存在对于革命推进没有阻碍吗？保持观战的态度，那左圈如何“自然瓦解”呢？

觉得左圈幼稚可笑就埋头干自己的事情，是不可取的轻敌。共产主义革命阵线此前就没有及时意识到这点，采取过相当被动的战术。现在，我们提出要用主动替代被动。正如我们所说的：

“谁用消极的方法沉默着干等，期待‘小孩子自己无聊走开’，谁就是对客观威胁视而不见，幻想着成熟、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因此，这个工作很痛苦，但也很必要。”

必须承认“左圈”仍然是大部分革命者了解共产主义思想时第一时间接触的，也要承认他们一手培养出的刻板印象是广泛的。左圈借革命的口号行互联网奶头乐之事，我们如不干涉，它将一直将青年拽进自己无底的深渊。的确，他们像小屁孩一样烦人，试图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你不理他，他就会得寸进尺，这时候需要一个巴掌打回去。

“主动干涉”也要把握谨慎的分寸感。同志们首先要考虑自己发声的目的和交流的对象而不是急着发布观点。如果抱有着苛求左圈反思、认错，或者说有半点理解的想法，那就属于对牛弹琴。互联网给予了左圈放肆撒泼的底气。他们的脸皮的厚度，隔着网线我们根本无法揣测。想要对这样的社群进行“教育”，简直是没事找气受：小团体不只抱团骂人，更是抱团在受到打击的时候彼此安慰、塑造“精神胜利”结局。在我们眼中，这十分荒唐，但有些人往往就那么可悲。

再重复一遍：荒诞是资本主义末年的常态，而左圈就是这个土壤中生长出的恶俗亚文化。

左圈大王从不“服输”，这也是我们用“作茧自缚”对其进行形容的原因。他们不像我们通过纠正错误变得更好，而只会在犯错后偶尔出于压力心不甘情不愿地“道歉”挽回自己的声誉，下次再犯。当遇到无法反驳的批判时，他们有千万种方法“自救”，要不顾左右而言他、回避尖锐点，要不不谈自己反咬一口，紧跟着发起新一轮的污蔑，将过去的傻话埋到地下……我们需要生气吗？完全没有必要。共产主义者不担心他们这样，恰好需要他们保持这种态度，亲手将自己的恶臭以再清楚不过的面目展示在世人眼前。

还是引用一遍我们在“中国工农信息”频道看到的讽刺：

“你必须保持绝对不反思。反思意味着你可能做错了，而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你是不可能做错的。别人不断退出群，是他们觉悟低；组织分崩离析，是他们路线错误；你说什么没人听，是时代不配你。你要坚定地认为自己站在真理巅峰，哪怕这座巅峰只剩你一个人……”

共产主义者和他们不进行“辩论”，除非我们拉低自己到其水平。当然，那时候也不叫辩论，而是感叹号、语气词、骇人听闻的专有名词结合起来的“气场大战”了。一定要避免陷入和左圈的“口水战”中，我们不追求让他们闭嘴，我们追求通过对其本质的揭露而不是对他们永远不停的攻击挨个回复，来将其推到一个加速自我毁

灭的状态：彻底的偏执、彻底的疯癫和彻底的恶俗。

这样左圈“革命性”的幌子就不攻自破了，我们只需欣赏他们在“破碎的认同感和一段段的吵架记录”中，推举严肃的革命力量替代左圈成为革命者的第一选择。什么时候进行揭露呢？当一个左圈中的小团体十分典型并且知名度足够广泛，向我们跳脚之时；当一个左圈小团体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对革命事业构成极大的威胁并造成了严重的误导之时。什么时候行动算达成目标呢？当他们后续的行为已经完全可以预判，用尽常规手段并自证了我们的观点之后；当他们用尽了反驳的手段，只剩下反串和拙劣模仿我们的词汇后。这里我们举一个中美关税战不太恰当的例子，希望可以帮助理解：特朗普一被反制就跟着加，我们可跟中共一样，在明知问题已经明白（就像关税战中125%关税下贸易实际停止）的情况下，就不跟他们玩了。

当然，别幻想文字揭露后，左圈就会结束它的统治地位。大部分青年青睐左圈、进入左圈，不只是对他们的反动性质和幼稚习气不了解（哪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根本上是除了他们之外无路可寻。我们需要在革命运动中通过决定性的领导将对革命青年来说“无人可寻”的荒漠变为“有党可信”的绿洲。我们曾指出：

“重要的是，只有最有深度的理论和实际工作成果能给予想要前进的革命者以希望，一同组织起来；而有了这个组织，我们才能有效推进劳动群众的解放。这个结果不是用争吵赢得的，而是找饶舌者无力的地方：实际的行动。”

揭露为辅、实干为主，这样的配合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不能埋头苦干无视对左圈的揭露，也不可将所有精力放在用文字对他们进行批判上。很多时候，可见的成果和突破远比理性的逻辑更能戳穿左圈。让他们继续攻击我等为“唯影响力”吧，他们所反映的，不过是畏惧真正的革命趋势的影响力正在压过自己。

## 共革阵对建党路线的细化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在官网发布的第一篇文章《必须成立党》中这样形容中国的“左圈”：

“大部分现在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之间的内斗，在这种山头主义的环境下，并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很多时候，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无意义的过家家，在唾沫星子中浪费时间，在群众眼中留下一群小屁孩的形象。现在很多所谓的政治路线还是理论，在这种活在过去的环境下，完全失去了现实性变为空谈，在群众眼中宛如一帮疯子。”

今日，我们将“人身攻击”和“无意义的过家家”细化为，打着共产主义革命幌子的互联网亚文化的对外表现。我们不是在一片任由革命者勾勒的白板上统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而是在被左圈严重毒害的乌烟瘴气中，集结严肃的革命者成立组织。因此，真正“统一”的前提是消灭现在的分裂者们，而不是“团结”他们。

我们不是纯粹理论性地提出这个路线，而是在无数的尝试、一次次的经验总结中，

才了解到最真实的情况。共革阵曾有过失败的尝试，犯下过错误吗？那一定是有的，我们最大的失误就在于自己曾经对左圈抱有不切实际的“救病治人”的想法。

我们说，“最开放的讨论、辩论、交流与合作”是达成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统一的前提。这个论断本无错误，但它不能滥用在所有“对象”身上，需要进行细化：对于同样抱有此态度、往前进步的共产主义小组，它无疑是正确的，是对过去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坚决否定。但对于“左圈”，交流与合作无法争取他们，“争取”来他们更无济于事。左圈必须滚开。

对于如何取缔左圈对当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力，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计划，它将通过同志们的共同努力得到检验：

一、扩充组织的规模。在量上无论是党的支部还是外围组织。让我们的同志们能亲身接触到更广泛的左派青年，向他们提供不同的替代方案。人数的扩张现在对我们十分重要。不要求同志们急躁、囫囵吞枣，但是为了达成我们的建党目标，要明白现有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左圈的规模，仍然保持着相当强大的惯性。

让我们主动进行启蒙性的教育和鼓动。左圈曾经扮演的“入门”角色需要被我们用更系统、更容易理解和更高效的教育、宣传工作替代。让我们在左圈统治的各种场所和平台以崭新的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也积极地协助、培养新生共产主义小组往进步的方向发展。同时，注意如何鼓动我们的同情者和旁观者们大胆加入到队伍里，放下旧日的迟疑。

共革阵第二次全体会议提出的“搞线下的党支部，建立全国网络”必须作为一项义务和使命存在而不只是建议。也只有这样，革命党规模的扩张才有可能。我们将《共产主义者》作为辅助招募的工具，而不是招募的平台，才是一种健康的发展方式。

二、加强组织内部的建设、干部培训，不然根基不稳一切白谈。这点上，我们将在未来更深入地讨论。

三、做好参与到、领导起现实中的阶级斗争的准备。哪怕现在的能力力不从心，也要在无论是社会运动还是工人罢工这样的各种事件中，争取得到锻炼，无数的声援和文字都不如这样的提升效果。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主义革命党，那就必须往这个方向发展。

佳士运动的震动现在还在中国“融工”趋势里造成持续性的影响，它之所以能余音不绝，就是得益于在现实中的阶级斗争里做出了实事，哪怕路线是错误的、结局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推测，在科学社会主义正确领导下打出的胜仗，会多有力地将左圈排挤为无人问津的小团体。

工人工作不可轻浮地学习部分左圈小团体的作秀，更不能急于求成。正如我们在第二次大会的讨论，它将“以年作为单位”，将在蹒跚前进中吸取教训，破除以前的迷信。必须反复教育这点：工人工作不是什么“工人工作者”的私职，而是全体工人同志们争取身边工友、为自己和同志们夺取正当的权利的本职。

学生工作因为学生作为“社会的晴雨表”的缘故，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已经作出重大突破，这点上我们需要总结现有经验和方法并开展培训，如同这篇文章一样，不将其作为共革阵的“机密”封存，而是分享给所有想要开展实际工作的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我们追求的“实干”，通过进行这些工作取得的成果，将与我们的揭露、左圈的自证一同改变共产主义思想在当今中国的面貌。不要再说些什么这样“为时过早”！我们不希望在伟大的历史时刻来临之时，共产主义革命者毫无准备，如同隐形一样默默无闻。

共产主义革命阵线一向鄙夷被动的逃避，追求主动的改变。让泥潭派享受自己的清净去吧！

*“没有人能够知道时间和期限，在决定性的一天到来之前，我们必须利用剩下的每一小时、每一分钟进行自我批评，为参与关键事件做好政治准备，这样才能无愧于这个与我们的革命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伟大阶级……反动也好，革命也好，都不能让我们偏离自己的历史任务。”*

当然，当伟大的事件到来时——哪怕明天就来——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先驱，将能够履行我们作为革命者的职责，为击碎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展开行动。我们将在它的街垒上战斗，我们将为它赢得那份没有我们的行动就没办法获得的自由。

但是，即使在这一时刻即将到来之际，我们共产党人也不想、也不可能忘记或抛开我们的无产阶级任务。我们必须使我们的革命策略服从于这些任务，不仅是在平淡的日常政治生活中，在革命爆发的前夕，以及在革命中狂风暴雨的日子里也是如此。我们不仅要越过沙皇专制罪恶的头颅，还要越过革命街垒的顶端，越过届时已化作瓦砾的彼得保罗要塞，展望我们未来的道路——那就是，毫不妥协地与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进行无产阶级斗争的道路！”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新知识运动指南纲要：资本主义 上层建筑（美国篇）

作者：齐项德



**新知识运动指南纲要：**资本主义治下的哲学、人文、社科等“文科系”知识分子如何为社会主义革命贡献力量，兼论资本主义上层建筑知识生产体系中的碎片化自我分裂趋势

### 第一部分：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集大成者的案例

国家的形成是基于分裂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这种政治形势最为巩固的阶段更是强化了其固有的分裂主义趋势——这里以及本文各处所指的分裂主义并非民族分裂或地区独立这样的政治学术语，而是指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将一群拥有相同阶级身份、朴素的民族团结意识——能够催发更加革命的政治行动——的人民强制地、人为地割裂开来，其含义与更为广义的“宗派主义”没有太多区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提到：

“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

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我们还必须重申另一个经典结论，这个结论通过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得到确认，即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当其进入一个地区性帝国主义乃至全球帝国主义的、对内对外完成最为显著剥削压迫行径的阶段，它们几乎永远通过纵向而非横向要素，不断切割全社会的一切人口，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甚至是资产阶级自己——这是因为被一个稳固的帝国主义国家机器有效整合的、同一个国家边界内的统治阶级的一致阶级利益、一致剥削行为、一致镇压工具、一致压迫理念可以让它们跨越任何“个人身份式”的不同而达成根本的政治共同，而工人阶级则会被这样那样人为强加、放大的“不同之处”轻而易举地分割，导向内斗（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经济较为繁荣，统治阶级和国家机器力量更为强大的时候最为突出体现）。上述论点已经被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证明，就算是最为右倾、最倾向于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也完完全全认同上述观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之间因为统治阶级人为创造的分裂而产生的间隙、争斗乃至互相攻击、屠杀的案例有许多，对于这些案例的研究也已经非常透彻。然而，目前还鲜有我们革命的同道者分析过资本主义国家内这一天然存在的宗派主义倾向对于其自身所掌控、支持、拥有的上层建筑，尤其是知识生产集团（或知识分子、“知识阶层”）的影响。在资产阶级人为地创造纵向分割人民群众的种种身份认同和标签时，资本主义治下的哲学、人文、社科等“文科系”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出版社编辑、“独立撰稿学者”、在读研究生与各类资本主义国家国有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中国的社科院院士等等都属于这个广义的文科系统知识分子的一部分）同时作为主动与被动两种因素发挥着关键作用。本文的目的，即是剖析资本主义治下“文科”知识系统碎片化、残缺化、宗派化的诸多问题，并着力于从社会主义革命的角度提出将资本主义文科知识纳入革命乃至革命后新世界的道路和方法论的展望。本文将着力于分析资本主义时期文科知识体系的几个组成要素，这些要素对于不同国家资产阶级统治（包括美国、法国、俄国、中国等由于国情不同，其碎片的、宗派主义的特征也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内上层建筑演化过程的探讨）的意义，以及如何通过社会主义改造的办法将这些要素全面、辩证地纳入科学社会主义与辩证法的革命世界观中。

在讨论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上层建筑以前，首先需要被探讨的是资本主义治下一个事实上的伪命题：资产阶级学术自由。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已经探讨的很清楚了，那就是所谓的“学术自由”在资本主义语境中从来不是一个历史的、阶级的、物质条件所限定的概念，而被刻意包装为一种超阶级、超政治、超意识形态的抽象权利。资产阶级通过这一概念成功地将知识生产从其现实社会功能中抽离出来，使之看似成为一种仅与“理性”“真理”“个人兴趣”相关的活动，而不再被理解为国家统治机器、统治阶级意识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充分、必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这一抽象化、去历史化的过程中，“学术自由”由一种有限的、条件性的特权被转化为掩盖不自由现实的意识形态外衣。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从未、也不可能在原则上承认真正的学术自由，事实上资本主义维护自身稳固的方法就是通过国家机器的力量不断介入、劫持知识再生产的所谓“自由空间”——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允许对资本主义运行逻辑、对私有制、对国家暴力机器、对阶级剥削进行系统性、总体

性、实践导向批判的知识生产都会直接动摇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根基。因此，资本主义所能容许的“自由”，只能是被严格限定在安全边界之内的自由，也就是在不指向推翻资本主义革命实践的情况下批判一切现象。与自然科学不同，文科的研究对象正是社会关系本身，是人类在历史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和定居形态以及产生意识的诸多形式与范式。也正因为如此，“文科”不可能像资产阶级神话所宣称的那样成为“价值中立”且“互不干涉”的研究领域。它要么被纳入资本主义统治秩序的一环，成为对现实的解释、修补和合理化工具；要么走向革命，成为揭示社会总体矛盾、推动阶级意识形成的武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前者被系统性地鼓励、资助、制度化、核心化，而后者则被边缘化、污名化，或在必要时被直接镇压。这里，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自由的第一个现实限制就体现在研究议题的两种性质上，也就是它们的可见性与不可见性，这两种性质通过复杂的上层建筑辐射到每一个知识分子身上。这种分野之所以能够稳定存在，正是因为资本主义文科体系并不允许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持续运动的整体被把握，而是通过对知识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系统性割裂，使某些问题天然地“显得可见”，而另一些问题尚未被提出之前就已经变得不可理解。所谓资产阶级学术自由的第一个现实限制，并不首先体现为某些议题被“禁止”，而是体现在整个文科知识建制对世界的理解方式被预先切割、分区和封闭这一根本事实上。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压制个别危险思想来维系统治，而是通过在制度层面制造一种无法形成总体世界观的知识生产办法，使革命思想在尚未成型之前就被消解、稀释并失去其指向。在资本主义文科体系中，社会并不被允许作为一个相互联系、持续运动、充满内在矛盾的整体来加以理解，而是被拆解为彼此隔离的研究对象，并分别安置进不同的学科、科系与研究范式之中。在美国和欧洲的大学教育中，哲学被限制在认识论与语言分析的内部争论中，历史被压缩为经验叙述与档案技术，社会学被分割为对“群体”“网络”“身份”的静态描述，人类学则被塑造成对“他者文化”的无限凝视。这种分工毫无办法促进整体认识的深化，而恰恰是为了防范年轻学者树立系统性的世界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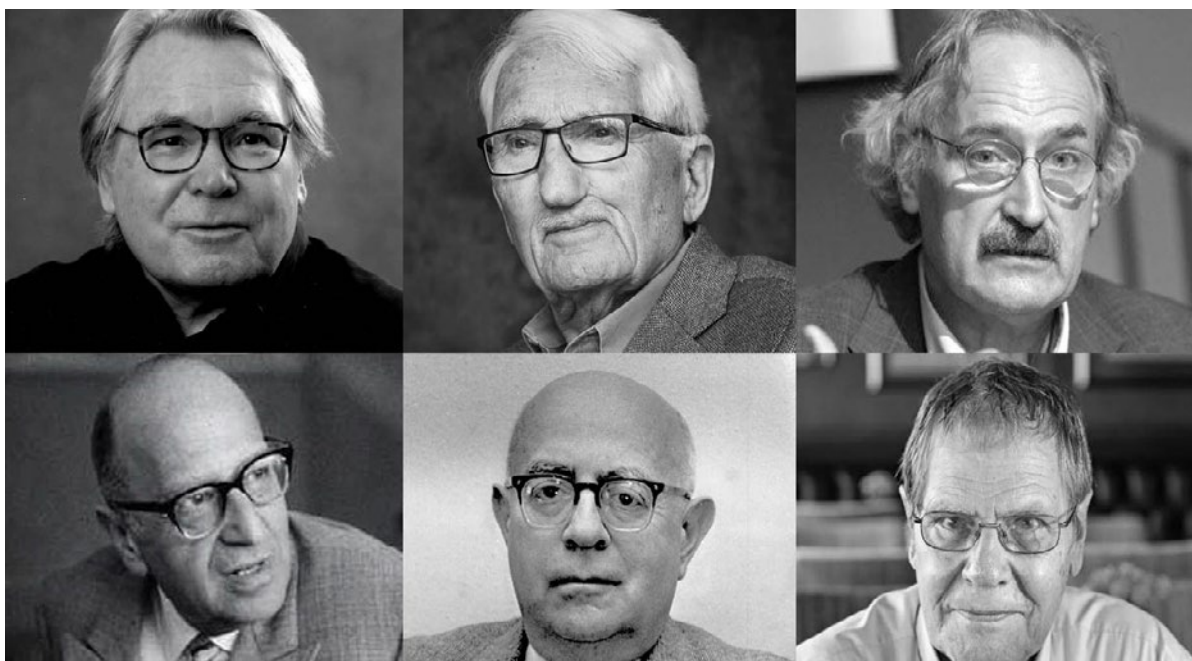
### 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学术自由”

正是在这种学科科系的高度割裂中，辩证法（无论其是否明确以唯物主义形式出现，

马克思也曾经解释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其他的一些并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能够相较于其他的二元论哲学等世界观理论工具更好地解释世界，事实上大多数辩证的哲学都会导向某种革命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意识形态又总是会天然地向同科学社会主义所需的辩证法所类似的道路靠拢）被排斥为一种“过于宏大”“不够严谨”甚至“带有政治色彩”的“负面、不恰当方法”。原因并不复杂：辩证法之所以“危险”，其原因并不在于它直接导向某一具体的、现实政治范畴内的意识形态，而在于它是唯一一种能够将社会现象重新联结为一个运动着的整体、并揭示其内在矛盾与历史方向的思维工具和逻辑理念，而一旦有了这样的逻辑理念，产生一种革命的思想倾向也就是必然发生的下一阶段。只要这种思维方式被排除，那么资本主义治下的知识生产就只能在碎片之间徘徊——这是一种从认知论层面出发的、以资产阶级统治为最大推动力的、造成人文精神与思维持久碎片化的政策。显然，资本主义文科体系并不是简单地“允许研究某些问题、禁止研究另一些问题”，而是通过建制化的学科划分，使任何试图跨越这些边界、重建总体视野的努力从一开始就被视为“不专业”“越界”或“混淆范畴”。在西方的一些所谓“结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是“新左派”学术团体中，阶级问题、帝国主义问题、国家暴力问题之所以能够在形式上被讨论，恰恰是因为它们被迫以非辩证、非总体的方式出现。法兰克福学派之流毒至今仍然让资本主义趋之若鹜、饮之似甘露：他们鼓励进步的学者被“交叉性”的个人化、碎片化陷阱所捕获，将鲜活的历史事实拆解为片段、文化现象、“话语”和仅仅属于个体的经验，而不被允许任何此种历史事实作为一个统一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矛盾被诠释。这也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也好、唯心主义的黑格尔派辩证法也好，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最强力发展的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再没有出现过像列宁那个时代一样的伟大思想家，因为资产阶级通过卑鄙的、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叛徒更加系统性地破坏了我们革命者在前人的基础上完善一个新体系的能力。这种对世界观的系统性割裂并非美国或当代资本主义的偶然发明，而是有着明确的历史来源。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倾向直接继承自天主教经院哲学及其所塑造的传统教育模式：也就是知识被理解为对既定范畴的注释与分类，最终将一切事物的本质归类到自然理性、德性等无法被纳入任何辩证体系的概念中（注意：这里所强调的几个形而上的本体概念有别于马克思主义或者其他一些辩证法流派所强调的形而上概念，天主教经院哲学所主张的是静止、恒常、不变、割裂的，所谓自洽于各个物体与人“本我”之中的某种“本性”，而这种静态趋势是天然无法被纳入任何辩证逻辑中的）；在这个哲学基础上，万事万物的真理被拆分为彼此并列的学科领域，而不被允许在总体性中得到理解。经院哲学在形式上强调逻辑与精细区分，在政治上却以冻结世界观、阻断历史意识而著称，其精神在现代资本主义大学体系中得到了世俗化的延续。

而在中国及更广泛的东亚社会，这种世界观割裂则更多继承自以科举制度为早期形式的应试教育传统。（本文的例证暂时不会涉及欧洲的其他地区以及阿拉伯地区的知识生产传统，不过就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所提到的那样，这些地区的一些知识传统保留了更多远古时期朴素辩证法的要素，体现在希腊哲学、伊斯兰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概念中，但是由于近代西欧殖民主义力量的干涉，这些地区的本土知识体系在独立地现代化以前就在不同程度上被破坏了，不应将他们视作积极构建了现代帝国主义对人文知识碎片化的工具手段的主要因子）在亚洲，世界观割裂的核心并非宗教神学，而是对知识的高度工具化、标准化与去整体化。这一特征最早起源于中国的科举制度，

在科举中，四书五经和各种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被不断拆解，分门别类为可考核、可重复、可脱离现实问题的问题单元，而思维本身则被训练为对既有范式的熟练运用而非对现实矛盾的批判性综合，比如明清八股文。这一点同上述的天主教经院哲学（尤其是解经学）在政治功能上却高度一致——它们都通过制造世界观的碎片化，阻断了任何通过辩证理解现实、进而形成革命意识形态的可能性。



### 从“革命的失败”中诞生的法兰克福学派

因此，必须强调资本主义文科体系的自我封闭性并不是学术发展的副产品，而是其能够长期服务于统治阶级秩序的根本条件。一个被制度性地剥夺了辩证思维能力的知识体系即便在表面上极度繁荣、多元和“自由”，也只能不断生产对现实的局部描述，而无法再像革命家那样改变它。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体系又长期鼓励文科知识生产与国家及资本的高度融合。在西欧的大多数大学能够通过一些自我资助，成为相对独立于国家机器力量的象牙塔时，我们看到了布鲁诺、哥白尼、伽利略这样的思想家（上述三人不仅仅是科学家，比如布鲁诺提出了对于天主教会的二元论反抗，而后两者也根据他们的科学思想批判了天主教会的传统神学理念；这是很鲜明的一些个人学者在一个相对远离国家机器的环境中运用科学知识促进人文知识发展的案例）。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学术体系复杂化，大学越来越没有能力自给自足，进而不得不同国家机器合作，最终成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生产基地之一。其经费来源、评估体系、国际合作、研究伦理审查，无一不与国家利益和资本需求紧密相连——尤其是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区域研究、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长期以来都直接服务于殖民治理、军事干预和意识形态输出，这一点会在下文对美国的具体分析中进一步论述。冷战时期形成的“学术、基金会、情报机构”复合体并未随着冷战结束而解体，而是以更加隐蔽、更具“进步”的形式延续至今——许多人耳熟能详的 USAID，各种各样的联合国机构，甚至是 UNRWA（联合国巴勒斯坦近东救济处）都隶属于这个帝国主义情治体系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学术自由并非一种被滥用的美好原则，而是一个从根本上服务于资本主义宗派政治的伪命题。它在表面上承诺多元、包容与开放，在实质上却以

制度化方式排除了任何指向更加革命之实践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条件下，资本主义文科体系得以持续生产大量看似批判、实则去政治化的理论成果，并在全球范围内为宗派主义力量提供源源不断的“合法”思想资源。总而言之，如果说资产阶级学术自由是资本主义文科体系赖以自我辩护的意识形态外壳，那么学科分化本身则是宗派主义在知识生产领域中的系统性体现。资本主义并不是简单地限制文科知识的内容，而是通过对知识对象、研究方法和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切割，使任何可能通向总体性理解的理论努力消弭得无影无踪。就像上文中布鲁诺等人的例子那样：在前资本主义乃至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哲学、人文与社会思考尚未被严格区分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诸多学科门类。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道德理论之间存在着高度的交叉与统一，其根本原因并非学术尚不成熟，而是社会矛盾还没有演化到资本主义“繁荣期”最为极端的程度，因此相应地国家机器也还没有那么剧烈的自我加强倾向。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和国家机器的完善，对社会总体的理解本身开始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知识生产的组织形式也随之发生转变。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分化呈现出尤为鲜明的宗派主义特征。社会不再被理解为一个由生产关系、阶级斗争和历史运动所构成的整体，而被人为地拆分为无数彼此并列、相互隔绝的“研究对象”：性别、族裔、文化、宗教等等，在资本主义文科体系中，这些非常具体的特征被刻意从其产生的物质条件中抽离出来，成为自足的分析单位，从而遮蔽了它们之间的任何内在、充要联系。在这一过程中，学科分化不仅反映了社会的分裂，更主动地再生产并加固了这种分裂。正如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身份政治将工人阶级划分为彼此竞争的群体，文科体系也通过学科壁垒将对社会的认识划分为彼此隔绝的知识碎片。研究者被训练成只对自己狭小的对象负责，而不再对社会整体承担解释责任；学术伦理被简化为对“同行经验”的尊重，却刻意回避任何负责任的文科学者所应该具有的、解释世界运行方式的激情。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学科化宗派主义往往以“反对宏大叙事”“拒绝语言暴力”的所谓进步主义宣传出现——显然，这又是法兰克福学派流毒：在这种框架中，任何试图将零散经验统一到以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其他的能够被整合入辩证整体的历史运动之中的理论努力，都会被指控为“压迫性的”、“过度简化的”、甚至是“不道德的”。这种指控看似是在为被压迫群体发声，实际上却剥夺了他们融入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在知识乃至基础认知上与其他被压迫者建立多边认同关系的理论工具。资本主义文科体系中的宗派主义就这样成为了其最根本的驱动力。它使得文科知识在形式上高度繁荣，在内容上却愈发碎片化；在各种各样的修辞话语上极端激进，在政治上却彻底失去触及任何象牙塔以外的活生生的人的能力。不同学科、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隔离使得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始终无法作为一个整体问题被提出，它进而导致了当下的辩证法与革命世界观的诠释几乎仍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哲学水准上。在这一背景下，所谓“跨学科研究”完全无法构成对资本主义文科宗派主义的批判。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跨学科往往只是不同知识宗派之间的暂时协作，而不是对宗派主义本身的彻底扬弃。任何研究的出发点仍然是去政治化的割裂单位，所谓的跨学科协作办法最终只会生产出更加复杂、更加难以被群众理解的理论拼贴。这种以学科分化为核心的知识宗派主义，并不是在抽象意义上“资本主义一般”的结果，而是在帝国主义阶段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被最系统、最成熟地制度化的。美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为一个将文科知识最彻底地整合进了全球帝国主义干涉方法的国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文科体系的典型范本，

显然，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还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其本身都绝无动机也无能力支持真正的“意见自由”，以及建立在意见自由之上的属于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这一点在先前的内容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完善的讨论。资本主义延续自身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受剥削压迫之上的统治的基础恰恰依靠其对于历史事实的罔顾——罔顾人民之间追求最为淳朴之团结的美好愿望（这种愿望可以追溯到原始共产主义时期大同社会梦想在普罗大众思想中最后的残余）的资本主义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创造这样那样的所谓“国民公敌”（这里使用国民的意义在于，一个所谓超阶级、超民族在一个或多个国家内存在的“人口整体”成为另一个这样的人口整体的“一致敌人”的概念本就是彻底虚假的，也不可能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国民”以外的历史阶段，此种宣传常见于各种各样的殖民扩张与战争时期，伴随着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所敌对的其他国家人民进行非人化、抽离其作为人的历史价值并将其呈现为一个纯粹的“政治敌对概念”，比如欧洲人在非洲进行殖民扩张时将当地人全部归类为野蛮人、落后的次等人、不开化的非文明人，德国纳粹党在执政时期对犹太人的孤立、迫害和屠杀等），人为制造了宗派主义式的分裂，这其中又以美国作为当代帝国主义国家中宗派主义身份大发明的巅峰。许多中国人非常疑惑为什么似乎只有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出了资产阶级身份政治之最——无论是所谓的“几百种性别”还是美国那数以百计的“民族身份”人口普查数据列表，亦或是美国社会中近乎禁忌的“种族身份”（在美国语境中种族这个词并不代表真实的民族身份，而是肤色之分，这个概念也是由英国人发展、纯粹人工定义的，例如直到1950、1960年代法国人除外的南欧人与拉丁人都不被视作“白种人”的一部分，而阿拉伯人和诸多其他闪米特族群也是在近十年内才开始被列为“白种人”的一份子；除此以外，上述的“民族身份”定义也是由美国政府独断，并几乎每年都更新一个版本的民族划分方式）——这是因为美国与其他欧亚旧大陆上的资本主义国度不同，美国本就是一个以早期白人殖民者剥削集团之后代为核心、整合剥削其领土上的各民族移民劳动者为基础存在的国家，这也是对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误解的来源之一。美式资本主义变体并不是一种真正带来民族团结与融合的所谓多元化政治状态，而是一种高度种族化、高度阶层化、高度集团化的殖民主义经济模式之发展所结出的恶果。在这一基础上，“美国国土”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疆域的存在，并不依靠欧式民族主义那样，以主要通过一致语言形成的民族国家之模糊边境、在得到封建国家内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发展的统一政治认同加强后，在一个个国家内得到确认。它本身就是，依赖其统治阶级所宣称的“相对自由的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提到过这个概念，也就是所谓美国的“包容性”——不过这是一个幌子，它事实上就像上述提到的，只不过是最早的白人殖民集团所建立的、种族化的资本主义剥削）为媒介建立的、社会的各部分（尤其是劳动者）全部是各国移民所组成的，一个“移民集团”（注意：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整体，被剥削压迫的劳工的的确确几乎全部是外来移民，目前残存的几百万原住民美国人全部被限制在“保留地”内，且无法组成政党、不能全面地参政议政，他们的经济生活也大多发生在相对闭塞的“保留地”中），这样的社会状态通过以下几种基础目标的保障而被维持（它们在后文将被称为美国资本主义所带来的敌对全世界广大劳动群众的五个重点问题）：

其一是“美国承诺”的持久延续，也就是所谓的“美国梦”。它在美国殖民扩张阶段为前来美国的殖民者、“牛仔”、矿工等不同阶级提供旧大陆所不能提供的“一夜暴富”的物质机会，而在之后的门罗主义时期是保障一个远离旧大陆战争和争端，相对和平稳定社会的承诺；一战、二战结束以后则是通过美式资本主义将对全球先

后进行工业输出与金融操纵所获取的部分利润再分配予被剥削阶级、提升其物质利益而保障美国的社会稳定。



### 所谓“美国梦”

其二是美国领土上各个民族之间的持久分裂，也就是旧大陆不同社会劳动者移民在新大陆的后代绝不能产生超越民族或是某种超验身份的阶级意识（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力求防止被剥削阶级间产生统一阶级意识，但是在美国这更加容易，只需要维护种族主义的分裂就可以让工人们转向内斗），进而威胁美国统治阶级种族化的资本主义剥削行径——美国政府对于各种民族聚居区“特殊性”、“例外性”建设与宣传就反映了这点，比如全美各地本是因为局部种族隔离和歧视而产生的唐人街、东欧和南欧民族城市聚集区等等反而被美国资产阶级宣传为其所谓多元化的标志。

其三是对于旧大陆和美洲以外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国家觉醒民族意识的高度排斥和镇压——与来到美国的许多欧洲人不同，这些国家人民及其后代往往并不是为了追求巨大经济利益的机会来到美国，而是因为奴隶贸易、故乡的战乱与饥荒等原因被迫逃亡美国，而美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作为一个比较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往往也对这些人祸灾难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比较显著的例子有美国南方的非洲人群众（他们曾经主张建立一个新非洲国）、美国西海岸的华人（同东海岸华人的历史情况不同，整个太平洋东岸地区包括加拿大温哥华的华人来到美国的原因都更加被动而非主动）等群体，这些人民在家乡的民族解放运动与反帝国主义运动兴起后由于他们因被迫迁徙而得以维持的同故乡更为紧密的政治认同往往会在美国也组建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和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运动。比如1960年代黎凡特阿拉伯移民学生群体中的亲共产主义和亲社会主义左派运动，此等政治动员必然极大撼动美国统治阶级所力求建立的稳固、宗派化的民族秩序，并将革命性的政治热情传导到大量具有相似政治境遇的民族群众间。

其四是对原住民的严格管控，将其排斥在政治建制之外，这一点上文已经有所提及，

具体政策办法就是通过限制原住民人民的自由结社、结党使其无法广泛地产生一个基于“原住民家乡”也就是全美国乃至美洲领土范围、远远超出美国殖民政权划分的联邦保留地概念的自决意识——美国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相当明白民族自决是通往更加深远的阶级意识与革命团结的道路，就像所有最早的社会主义者运动那样。

其五则是美国情志体系、军队与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调查机构和相关产业在全世界范围内煽动群众对立与建立在虚假的民族发明基础上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这里的此种势力并不包含进步的、革命的、符合历史事实的同资本主义宗派主义完全相反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而是代指美国政府通过经济剥削、间谍破坏与政治操纵蓄意攻击本来非常和谐、团结的群众，无论他们是生活在社会主义还是同美国并未结盟的资本主义国家，并利用帝国主义干涉的手段在群众间挑拨离间。非常著名的例子包括美国政府所资助的阿富汗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南北也门内战期间复杂的政治关系、美军在两次入侵伊拉克前后对两河流域极端什叶派屠杀行为的资助、以及中央情报局长期以来支持各种在美国存在的外国邪教组织破坏其来源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稳定，借此扩大美帝国主义的政治力量，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有法轮功等，这些组织共同构成了美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国的上层建筑中提倡、扩大宗派主义的枝干。长期以来，美国国会通过批准其各个大学机构在生产较为落后的欠发达国家开展各类民族志和历史研究，并力求通过极度加剧不同民族、宗教等身份间原本较小的矛盾等最为反动无耻的方式挑拨工人群众之间的对立——如阿尔及利亚内战、黎巴嫩内战。当然，本文在这里绝不是要支持“第三世界主义观念”，提倡捍卫被更强大帝国主义势力压迫的、所谓“相对弱小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说明军阀混战与宗派主义势力割据的国家仅仅会加强国家暴力机器的镇压力量，进而导致无产阶级的群众斗争和革命几乎无法实现，如叙利亚内战开始后几乎一夜之间街头的、工厂的工人运动就迅速瓦解消失、黎巴嫩内战彻底破坏阿拉伯地区最后的一些共产主义革命组织并催生了真主党这样的极端宗教团体取代原本左派革命力量的“政治生态位。”

尽管本文阐述这些资本主义政治政策以美国为案例，但是事实上这五个政治目标都并不是仅限于美国的——它们属于旧大陆与新大陆资本主义政权中都经常出现的镇压手段，如英殖印度时期大量扶持的王公豪族、土邦，法国在军事占领黎凡特时期所主持的叙利亚邦联主义分裂所造成的广大受压迫劳动人民群众间的对立都是这种政策的一部分，并不存在所谓的“美国例外论”，只不过由于美国作为二十和二十一世纪生产力最为发达、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掌控力最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分析美帝国主义在这一过程中的诸多行径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本文所要探讨剖析的问题来说，上述美国资本主义维护其统治稳定的五个主要“身份政策”中最为重要的是第三个以及最后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代表的是同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第三个是在民族解放运动涌现后美帝国主义的被动反应，而第五个则是在经历了上世纪的全球民族自决革命浪潮后美国帝国主义政府在当代主动采取的积极措施。这两个问题从根本上代表了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宗派主义力量所依赖的各类机构的一种集体趋势。另外三个政策都基本可以通过任何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国家所拥有的暴力机器和镇压工具实现，惟第三和第五等政策是必须通过一个繁荣（复杂、高度发达）的全球帝国主义（至少也是区域性帝国主义）国家掌控的各类信息机关共同协作，才能完成如此缜密的压制被压迫劳动群众的行

为。当然，上述第三与第五两个问题并非彼此孤立的政策选项，而是美帝国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条件下应对同一历史威胁的两种运行形态：前者是针对民族解放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后的被动压制，后者则是在这一浪潮尚未成型或已经被暂时击退之后，对宗派主义进行系统化、前置化、可复制化输出的主动进攻。二者共同指向的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民族、宗教或地区，而是一种始终令帝国主义统治阶级高度警惕的可能性——民族自决在反帝实践中向阶级意识的跃迁，最终将动摇美帝国主义作为种族宗派主义之巅峰的帝国主义统治。在二十世纪的多次实践中，这种令帝国主义者闻之丧胆的可能性已经得到了多次验证。无论是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反法殖斗争中逐步完成的社会主义化自我改造，还是越南、古巴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最终与社会主义革命相结合的历史进程都充分表明：一旦民族问题，尤其是反殖民主义斗争被置于同帝国主义的综合斗争中时，它就会迅速演变为跨民族、跨地区的革命浪潮。也正是因此，通过资助资本主义状态下碎片化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情治机构积极在潜在的冲突区域制造或强化伪造的、去阶级化的民族认同，将历史矛盾归因于“不可调和的文化差异”或“古老的宗教仇恨”，从而抹除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剥削在冲突中的根本作用。

不过，宗派主义的传播并非美国独有，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为维持其统治和全球剥削体系所采取的一种普遍性策略。因此，如果说美帝国主义作为全球霸权集大成者，其知识生产体系是通过“积极煽动、主动发明、系统化分裂”来传播宗派主义，那么，一个“崛起中的”、在其对外宣传中强调自己与西方意识形态体系“有区别”的资本主义大国——中国——又将如何在其帝国主义化过程中，运用其上层建筑知识体系，来消解意识形态热情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本系列的下一篇将会论述的，也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崛起后如何使用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工具在亚洲、非洲乃至全世界传播宗派主义力量、稳固资本主义秩序，并最终通过对资本主义全球制度的添砖加瓦巩固其在中国国内的统治。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中国农村问题

作者：红铮



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国这个国家可谓十分矛盾：一边是强大的工业，产业链之齐全、产量之庞大，冠绝全球，无愧世界工厂之名；另一边，却仍有上亿人口居住在田野乡间，过着几近小农的生活。一系列历史进程，使得农村的生活水准远不及城市。于是，为了解决这种不平衡的现象，“共同富裕”来了，“脱贫攻坚”来了，“乡村振兴”来了。“一个也不能少”，现代性十足的话语来了。可是，在这种道德作秀的背后，隐藏的是深刻的经济矛盾。

## 一、现代化的神话

但是，在中共相关的重要文件当中，似乎很少见到农村经济与整个国民经济之间的合理联系，就算有也不过是一句模糊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共是以一种现代性的执行人的面目出现的。比如《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第一句就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为进一步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力争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目前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

问题”。在这里，消除贫困就成为了一种道德目标，好像在整个计划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起根本性的推动作用的只是某种“善良的”意志，而这恰恰掩盖了手段的重要性。在这里，好像手段完全服从于目的，而其本身有何性质不重要，只要说这是“依据国情制定”即可。其实，目的与手段之间不存在如此明显的统率与被统率的关系。目的与手段的分离是不可能的。没有目的，手段就是盲动；没有手段，目的就是空谈。目的会预设手段的内容，而手段的偏离也可能使目的相应地变化。因此，我们不妨看看中共的手段，好了解它的真正目的。

当然，在那之前，得先看看，农村为何而贫困，为何而沦为必须依靠中共“救济”才能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地区。

## 1. 改开前的中国农村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生产力极为低下，工业基础极为薄弱，农村人口一度占了总人口的89%。面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为了巩固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权，中国选择在高度集中的体制下优先保障国防与重工业建设，而这必须要农村提供足够的剩余产品与剩余劳动力。这是土地改革在经济上的动因。此外，土地改革以前，中国农村仍维持着租佃制。这种落后的土地制度一方面深深地压迫着农民，阻碍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其生产仅仅基于地主的个人消费，产品分散地积压在各地主手中，使得大量农产品无法投入工业领域，妨碍工业化的推进。于是，通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摧毁了租佃制，代之以农民的土地所有制。

但是，土地改革后，农民土地所有制只是改变了土地制度的剥削性质，却没有改变它的小农性质。农民的生产方式和过去差别并不明显，仅仅是没有地主的盘剥而已。农民之间进行协作的生产劳动的可能性、运用农业机械的可能性，也由于农民生产的小农性质仍然趋向于零。农业的生产力还无法获得质的提升。此外，尽快向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过渡，这也是中国全面向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政治性实践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又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通过集体劳作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并且抑制了分散农民可能会产生的贫富差距；农产品被禁止随意买卖，而是以统购统销的方式由国家管控；农业土地的集中利用也为农业机械的运用铺平了道路。

随着包括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内的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确立了以国有制为基础的全面计划经济体制。为了以最快的速度提高农村与城市的生产力水平，并处理农村过剩的劳动力，中共提出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方针（也有说法将其叫做“乌托邦运动”）。1958年3月，各地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到10月底，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经济方面的一个十分大胆的、被寄以重望的设想便是“农村工业化”。这个设想认为，通过生产决策权的下放，可以在没有显著增加计划经济体制下扩大生产所需的行政资源的同时，充分地利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源，从而使得生产力（主要是钢产量等生产指标）快速提高。毛泽东甚至认为它是消除城乡差距的途径。



### 人民公社与农业集体化方针

这个时期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当时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化还仅仅在起步阶段。工业反哺农业虽然写在日程上，但是短时间内，大量农村仍然无法机械化，生产力水平较为落后，农业生产主要依赖人力和畜力。在缺乏相关物质基础的前提下，强行从合作社过渡到人民公社往往导致效率下降、管理混乱和农民的反抗。农村工业化也因为没有经过统一计划而可以被基层官僚肆意扩大规模，结果反而导致了生产的衰退。在官僚主义浮夸风导致高征收、加上自然灾害、物质匮乏的情况下进行的集体化运动，使得农村劳动力突然由过剩走向紧缺。官僚强令农村劳动力投入工业生产中，导致农业“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出现。饥荒又反过来使得国民经济循环受到极大阻碍。中国经济在1959-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迫于现实的压力，中共不得不放弃最激进的集体化、政治化路线，重新用物质激励的手段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61年6月，生产队恢复“三包一奖”，对社员实行基本口粮、基本投工、基本投肥的口粮与工、肥挂钩办法，实施取消供给制和工资制、解散集体食堂、撤销居民点、恢复自留地和家庭副业、集市合法化等政策，使1965年单产恢复至1957年的107%。这实际上反映了，在生产力还不足以支撑农业的大规模经营时，随意扩大农村的集体组织，反而是有害的。集体化的进程必须与机械化的进程相适应，但是又必须想办法将农民的自由支配权压在一定的限度，不至于让商品生产的范围过于扩大。这是当时中国农村政策的特殊困境。此外，这个过程也充分反映了官僚化会对生产力发展的进程造成多大的阻碍。这个时期对农业集体化政策的松口，为国内经济改革提供了“借口”和“先例”。

在1966-1978年间，国家粮食征购率被压20%左右。农村集体通过社队企业和自留地第一次拿到部分剩余产品支配权。技术投入（化肥、农机、良种）进入加速阶段，完成了化肥、杂交种、社队企业三大原始积累，这为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爆发奠定物质基础。

## 2. 改开后的中国农村

文革后，由于长期工农业剪刀差对农村价值的提取，再加上集体化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虽然生产力有所提高，但是农村并没有欣欣向荣，生活水平长期徘徊不进，经济与政治接近瘫痪。为了缩减在农村的公共支出，并维持自己的统治，中共官僚集团在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正式开启了重建资本主义的道路。

小岗村神话的构建自不必多说。1978-1982年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农户以家庭为单位与集体签订承包合同，确立了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由集体劳动退回了家家一小块地的小农局面。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总产值大幅增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然而必须注意这远非经济体制改革单个因素的结果，而是改开前水利建设、化肥引进、新型品种研制与推广多重因素影响的综合结果。许多地区的改革还导致农机被拆卸“平分”，大大延缓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包产到户后生产积极性的提高也在较短的几年内造成了对劳动力的疯狂需求，以致于许多学龄儿童也去参加农业生产，阻碍了农村教育事业的推进。虽然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对当时的农村生产力而言过于先进，但是正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要求它必须以这种先进的形式出现在农村，否则，如果失去了这种干预，农村的自然经济便会向其自然的下一个阶段——商品经济继而资本主义去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农户在缴纳定额农产品后可自主决定农产品种类和销售价格等，把原来以公社为单位的总产品直接分配，转化为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商品生产。同时中国施行价格双轨制，国家先通过合同订购重新占有剩余，以行政指令规定产量，低价统购统配，保证城市低价原材料和消费品供应。超计划部分允许按议价、自由价上市交易，商品经济悄然形成。历史兜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不远处。但是这里并没有对未来实质上的应允，而只是无穷无尽的当下考量与实用主义。1993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承包期延长至30年。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和2007年的《物权法》逐步明确并保护了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流转和私人财产权，这使得土地能够作为抵押品进行融资。虽然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名义上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但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从而使得土地这一原本的公共资源也可以深度嵌入资本主义积累的过程。

在此背景中，农村迅速分化。人民公社在1982年至1984年间被废除，机井、拖拉机、加工房、运输汽车、粮库要“作价到户”，但官僚及与官僚有关系的农户能率先获取信息，低价购入，由此将公共积累的生产资料转为私人资本，成为农村中的“经营大户”。中间等级的农户，虽然能够自给自足，但无法扩大生产，必须“农忙种地、农闲打工”，成为半无产者。地少或差、劳动力老弱的贫弱户只能把承包地倒包给大户，收取远不足以生存的少量租金，成为了事实上的无产阶级、“自由的劳动力”，只能外出做工。



### “包产到户”后的中国农村

同过去的政府指导型的发展不一样，改革开放后的农村经历了“政府撤乡，企业下乡”的风波，过去人民公社“工农学兵”一体的政府单位落下了帷幕，党政机关的作用和权力也逐步被削弱，最终彻底沦为了官僚和资本家在农村牟利的工具。人民政府对乡村的控制力非常弱，这可以理解为农村系统性衰落的一个结果。在改开前的中国，人民公社充当了话事人的角色，因为人民公社进行了集体的生产，自然也需要集体的管理。集体生产本身也为集体管理提供了可用的资源。但是在改开后，青壮年劳动力很大一部分去往了城市，留下了几乎没有生产力的老年人，为了他们而投入大规模的管理资源，对政府来说绝对是一本吃亏帐。因此乡镇政府的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某种程度上讲，这类农村在气质上十分符合一些文艺作品里描绘的“末日”——整个社会在逐渐腐烂、死亡，而新生的力量却几乎永远不会出现。整个中国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乡村就此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看，这恰恰证明了市场的弊端：过度追求利润的社会并不能达到所谓“最高效率”，反倒会引起资源的浪费。

这一期间，随着公社的逐渐解体，乡镇企业正式取代社队企业，并在双轨制下迅速崛起，形成了地方政府像控股公司一样经营辖区企业的现象。它吸纳了大量农村过剩劳动力，同时承包地将劳动再生产费用留在村庄，工资仅相当于国企的58%，以极低成本推进了农村的原始积累。乡镇企业是毛泽东时代农村工业化的余晖，它是农村经济百年来首次顽强的自我崛起，一度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充当了极大的推动力，也为农村创造了极大量的就业岗位，使得农村的生活水平一度超越城市。当然，乡镇企业不是中国所宣传的“集体经济”，而是执行资本家职能的官僚所直接掌握的企业，在这当中乡村与企业的冲突也不断加剧。当时，乡镇企业的工人的工作时间与强度要远远超过城市工人。

但是，官僚阶层似乎并不乐见乡镇企业发展得太好，因为它会和一大批低效的国企抢饭吃，阻碍官僚们低价出售国有资产赚钱的敛财方式。1989-1991年，经济紧

缩，银行收贷，利率飙升，乡镇企业出现了倒闭潮。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标志着中国政府决定把经济制度从“计划为主”彻底改变为“市场为主”。之后，国家放松信贷、土地审批，乡镇企业大规模负债扩张，平均负债率65%，造成了乡镇企业的完全溃退。期间，“股份合作制”的推广，把农民土地、劳动力、现金折股，用“红股”形式合法化剩余价值的私人占有。

1994年，为了扭转中央的财政赤字，中国开始了分税制改革，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主体税种的大部分归中央。乡镇企业逐渐走向了末路。本地就业骤降，大部分乡镇企业转私营或破产。企业内的本地农民要么退回承包地，维持小生产生活，要么涌向城市成为工人。这也使得地方收入锐减，但支出责任（义务教育、社保、支农）不减。政府开始通过土地出让来解决财政问题。一方面通过招商引资引来了房地产商，一方面通过发展基建和工业拉高对住房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限购无限拉高房价。在这几个方面的收入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收入。1998年7月全国停止福利分房，住房变成居民用未来收入流做抵押的商品。土地的市场出价能力被金融杠杆瞬间放大，中国开始进入土地财政的时代。

既然土地财政有利可图，那么另一种意义上的圈地运动开始了：既然土地的所有权是集体的，那么地方政府便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随意剥夺农民的土地，然后将其交给城投公司卖地扩建城市。由于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农民一方面无法反抗，另一方面又远没有办法拿到足够的补偿，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到城市成为一名农民工。这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发展思维被价值规律支配。即使新扩建的城市用地中大量被用作面子工程，致使城市土地利用率低，地方政府还是愿意大量卖地，而农村由于收入低下，在财政上意义不大，被完全忽视了。除了怎么剥夺农村的土地外，地方政府对农村最上心的大概就是如何继续削减花在农村的公共支出。

改开后到千禧年的曙光以前，几乎可以称为中国农村的黑暗期，其中乱象数不胜数，但官僚集团却想尽办法让人们的眼光不去关注它。它是上演在中华大地上的一出悲剧，显示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如何一点点榨干农民的，显示出社会主义的尸骸是如何滋养了寄生虫的肥硕，显示了物的力量是如何重新凌驾于人的身上。

### 3.21 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村现状

这一时期开始，中共逐渐重视农村的基建。这是为了加强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但实际上不过是加强与城市的联系。水泥道路的修缮更加方便了农民工进城，继续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失的现状；古街的翻新促进了旅游业的发展；通水通电增加了农村的消费项目，为家电下乡打下了基础，从而继续让农村的购买力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这些措施本身也是基建产能过剩的表现，也让地方政府继续通过这样的基建揽财。资本家们发现农村尚有市场（尽管这个市场已经事先被他们糟蹋过了），于是如何将农村纳入整个社会的交换体系（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体系）被提上了经济学界的议程。

08年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催生出过剩资本进入农村的需要。这一时期的农村在资本血腥的道路上发展了起来，农村电商与农产品加工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道路、供水、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也迅速完善升级，08年家电下乡则是撬动近万亿消费。但

多数的底层农民仍然没有富裕起来。他们陷入普遍的赤贫，成为农民工，构成庞大的产业后备军，而少数经营者则蜕变为新的压迫者，吸吮着中国广大农村的财富。毋宁说生活方式的改变与消费水平的提高，本身就只是所谓“现代生活”的扩张而已，更多地不过是资本家想要卖出积压的商品而已，但不是使底层农民真正富裕起来的方式。农民购买了电视机，现在他们有相对更丰富一点的娱乐方式了——可是，购买电视机的钱最终还是他自己出的，是他用劳动创造出的价值交换了这样一个商品，获得了它的使用价值而已。这顶多证明农民能够买到的商品种类更多了而已。

中共还喜欢称道的是 2006 年农业税的废除，将其称为延续两千年的田赋制度的终结，“有利于广大农民更多的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但是一方面，这不过是多起农村集体性事件的直接后果，在中共的宣传里这些内容往往只字不提，另一方面这也不过是说明，中国终于摆脱了农业国的现状，进入了工业国的行列，农业能够提供的税赋已经不值一提了。农村的情况实际上确实难以继续承担农业税的负担了，否则农村的贫困只会继续增加。至今农民为了工业化而付出的代价，在这里则是照例不提的（可笑的是，前三十年间农民为了工业化也同样付出了一定代价，而资产阶级的喉舌一方面对改开后的农业政策歌功颂德，却一口咬定前三十年间就是侵犯了农民的“劳动成果”！即使这个指控成立，改开后官僚们对农民劳动成果的掠夺只会更多、更频繁、更明目张胆）。

由于长期以来对三农问题的忽视，农业已经身处危险之中。1996 年，我国耕地面积约为 19.51 亿亩，但是有灌溉设施的保收田仅占耕地总量的 39.8%，约三分之二为中低产田，更别谈大量水利设施还是毛泽东时代修建的。到了 2010 年。我国耕地面积仅为 18.26 亿亩，十四年来降低了 1.25 亿亩。一方面土地财政疯狂地侵占耕地以盲目扩大城市面积，另一方面农民被迫背井离乡成为农民工导致土地抛荒，再加上许多农民为逐利大量将粮食作物用地改为经济作物用地，使得农业生产能力实际上是脆弱的。1998 年特大洪灾造成了第二年粮食产量从 51229.53 万吨下降至 50838.58 万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接下来连续七年粮食产量都低于 5 亿吨，直到 2008 年才恢复到 1998 年的产量水平，这正反映了当时农村抗灾能力欠缺以及灾后重建的困难。中共必须要吞下长期忽视三农问题的苦果。

农业的孱弱导致中共对农业农村问题的重视不得不提高，2004 年以来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专注于三农问题便是一个证明。所谓乡村振兴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正是在乡村已经被全面破坏的背景下诞生的。关于乡村振兴政策的具体情况，我们下文还会继续详细分析。

## 4. 中国农村经济脉络总结

总体上来说，虽然有曲折，但是改开前农村是沿着集体化的道路前进的。问题在于：一方面机械化的缺乏限制了集体化真正有效的区间，使得让农村返回小农状态的呼声与做法总是存在且无法消除，另一方面官僚队伍对集体化的命令主义倾向也使得集体化总是存在一种国家强迫的色彩。结果就是，集体化虽然存在并不断扩大，但某种程度上来说，家庭劳作仍是农村经济隐形的背影。当时集体劳动的形式不过是相当于家庭劳作扩大了的形式。与家庭劳动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它的核算被纳入到整个国家的粮食分配体系当中。即使考虑到工业的反哺，事实上这也是相当于农村给

城市以信贷，在一定时间内仍然是抽调走了农村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由于农村中各种劳动力的同质性与分工的非必要性，再加上家庭仍是水面下的核算单位，农村中农户之间依据劳动力的多少仍会产生自然分层，而其中劳动力较多的家庭天然会支持分田。这样做的意义不仅是控制更多土地，也可以摆脱更多上缴粮食的义务。家庭核算与集体核算的矛盾是城市中很少遇到的问题，一方面城市中家庭作为经济单位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另一方面大工业的特性使得工人必然作为一个集体被组织起来，从而城市中矛盾更加集中在工人与官僚的冲突上。农村中这一矛盾则相对不是很尖锐，从文革中农村的反应平平就可以看出。农村相对地更受这个问题困扰：既然家庭形式与集体形式当中，劳动力要干的活都差不多，那为什么一定要集体化？

此外，中国作为工人国家的制度设计，至少说其初衷，是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或许是出于“统一战线”，或许是考虑到农村较高的人口占比，中国当时的政治口径仍存在一定模糊性。关于国家的主人是谁这个问题，相较于无产阶级这种说法，中共更喜欢使用“人民”的提法，于是农民可以较为自然地包含进去。同工人阶级一样，农民既然是参与国家建设的劳动者，便同样被预设为一个“天生具有先进性”的阶级，从上山下乡运动中许多知识分子被送往农村改造就可以看出来。这或许能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集体化的思路——集体化既是对这种预设的补救，也是遵从这种预设的表现。如果没有集体化，农村贫富差距的重新出现就会损害中共政权的合法性。实行了集体化，除了经济方面的考量以外，也是假定了农民天然就会认同这种制度。然而从上文可以看出，这种预设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农村仍然处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上，从而无法完全摆脱小农阴影的农村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即使通过国家半强制下的集体化一只脚踏进了社会主义，也必然总是有半只脚留在中世纪，半只脚留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工农联盟中，农民可以是被团结的力量，但不是作为主力。农民，以及农村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必须处在不断的改造中，必须以工人阶级为主体对其进行改造，而不能处在与工人完全同等的位置。



“东方红” 拖拉机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集体化的政策确实压制了农村经济的商品经济化趋势，并且部分地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这使得集体化政策成为当时中国整个工人国家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后来对工人国家的所谓“改革”，也就是往资本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对这种集体化政策的突破就是其第一步。因此，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们尚可以承认，因为这毕竟是史实（但要注意这仅仅是被片面引述的史实）；但是如果因此而歌颂这场改革是改善农民生活的“伟大成就”，那就是极其错误的了。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集体化相对来说确实是进步的政策，而所谓家庭联产承包制，则更多地是退步。但是集体化要真正作为历史的进步而不是昙花一现，农村农业要真正摆脱小生产从而是家庭劳动形式的阴影，没有机械化，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集体化应当与机械化同步进行。

农村的改革是成为城市改革的先导与范本出现的，而改革完全没有改变农村向城市输送利益的格局。这种格局反倒随着农村的衰落与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了、深化了。不仅是数量上工农业剪刀差的扩大进一步降低了城市工业化进程的成本，农村向城市输送的价值的内涵也扩大了。由于土地财政的模式，农村的土地以极低的价格被城市占领，从而一方面为地方政府一度濒临崩溃的财政续命，另一方面助长了有关房地产行业的各种投机，让修房的开发商、炒房的食利者赚得盆满钵满。更重要的是种地种不下去而被迫到城里打工的农民工，有关他们的命运何如我们也会好好探讨。总之，改开后中国农村远非“逃离了城市的制度性压迫”，相反地，是城市对它的压迫更深重了。资本、土地、劳动的神圣三位一体都大量地从农村输向城市，农村衰落下去才是正常的现象。在这里，资本主义在城市中的发展，正是以它对农村的破坏为前提的。

农村被破坏的后果远远不止农民陷入贫穷。集体化的政策被打破之后，对农村来说，所失去的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将农民的力量组织起来的能力。自从农村的状况重新回归分散的小农之后，农村就再也不能大规模地调集劳动力去自主地完成一定规模的工程了，就再也不能自主地管理自身的命运了，就再也不能将自己的力量完全地用于改进农业的条件了。毛时代通过调集农民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的事，在1978年后就成为了绝响。对乡镇企业的破坏，从而农村工业的完全没落，也使得农村在生产资料和除粮食外的生活资料的制造等方面完全依附于城市。更别谈农民完全无法通过民主的方式决定自己村落的政策——这种权力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连可能性与法理都消失了，农民现在只能被政府指派的干部管理。赤脚医生回归城市，农村学校被裁撤，农村自己的教育与医疗也消逝了。人口老化严重，青年劳动力锐减，政府债务居高不下，义务教育、医保、养老等财政支出平均占比60%，加上乡村振兴项目配套，部分县可支配财力不足5%，无力再投入产业培育。县域电商利润被垄断平台挤压，农民增产增收的通道掌握在平台手里。总之，改开后，特别是乡镇企业全线溃退后，农村几乎处在完全的没落之中。因此，正是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进程，正是城市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必然对农村产生的剥削与压迫，才使得农民陷入普遍贫困的境地。现代化所要解决的问题，全都是现代化本身带来的。而现在中共却说，要来帮助农村“脱贫致富”，不过是在掩盖自己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不过是想把自己对农村陷入贫穷的责任甩得一干二净，还要把自己说成所谓“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真是恬不知耻！而在下文中，我们还将看到，其所谓现代化的途径，最终也远没有达到其宣称的效果。

## 二、现代化的手段

当然，要了解中共为什么要“乡村振兴”，仅仅了解农村的现状还是不够的，必须要把中国整体的经济情况，然后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一系列政策背后的经济动因，否则，我们对“乡村振兴”的理解就还不能脱离“中共出手改善农民生活”的叙事模式。

### 1. 过剩的危机

中国的过剩大致分为三种，这三种过剩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彼此加深对方的程度，将中国资本主义推入深渊，也是整个农业问题的背景之一。

第一种过剩是劳动力过剩。直观地看，这似乎是中国人“太多”的结果，毕竟数亿的劳动力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数字。更细一点探究，这还和新中国初期的人口爆发与1982年起严厉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使得中国拥有的不仅是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还有极低的抚养比——这被称作“人口红利”。当然，所谓人口红利不过是工人之间相互竞争，而资本家能够无限压低工资的红利。除此之外，劳动力过剩还是由资本主义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的。从改开初期“造不如买，买不如租”，到后来自主研发，中国的科技水平在四十多年间突飞猛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与生产工具的更新换代虽然使得物质相对丰富，同样甚至更多的商品如今只需要使用更少的劳动来制造出来，却也使得资本家们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工人人数相对于生产资料的量减少，甚至有时演变为绝对量的减少，从而不断使工人失业，不断将他们抛向街头，形成“产业后备军”。因此，劳动力过剩是资本主义的必然，是资本主义化的中国无法避免的现实。

劳动力过剩的问题反映到农业农村上，就是即使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即使农村的生活远不如城市，农村仍旧有大量的人口。它一定程度上充当着人力资源的后备池，一方面为生产需求供给后备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使得失业数据稍微好看一些，让中国不至于形成“贫民窟”。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农业就业人数从1997的3.484亿人增加至2002年的3.687亿人，便是农村这种功能的写照。大量人口未城市化，再加上“集体土地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时代残留的制度限制，使得农村土地的规模化利用举步维艰。

第二种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多会造成严重的弊病，这算是资本主义特有的一种矛盾。因为生产过剩会导致大量商品积压，没有人购买，从而阻碍资本循环的进程，甚至将部分资本直接消灭。自从市场机制被引入中国经济，价值规律支配全国大多数企业，员工本来享有的工资收入与福利被大幅削减时，这种相对的生产过剩就必然已经存在了。在改开初期，中国生产过剩的问题尚未特别明显，因为这些远超国内需求的商品很多都被国际市场消化了。但是，随着金融危机和全球化浪潮的退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生产过剩的问题摆到了中国面前。中国需要更大的市场，在国外这便表现为所谓的“一带一路”政策，在国内则提出所谓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因此，必须要在国内找到更大的市场，必须要有更多的人能够消费掉这些过剩的产品。

生产过剩的问题表现在农村上，就是对于多数农民，让他们富裕起来并不是为了要让他们形成自己能够积累的资本，而只是让他们能有一定的收入来源，用于消费这些过剩产品。

第三种是资本过剩。这可以说是前两个过剩带来的结果。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资本主义迎来了它的黄金年代。中国国内同时出现了工业产品价格的飞升与劳动力价值和劳工收入的暴跌，这正是大规模国企改革和私有化过程中，产业工人大量失业导致劳动力供过于求，初步私有化的前国企为了弥补产能降低而推高产品价格这一过程的直接反映。这一物质基础直接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劳动力成本极其低廉、工业品价格相对高昂的市场，为全球过剩资本的涌入创造了极佳的条件。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价值，过剩的劳动力压低了价格，极大地提高了剩余价值所占的比例，使得更多的价值可以被资本化。生产过剩使得商品资本价值的实现更加不顺利，压低了利润率，从而货币资本找不到适合的投资行业。于是许多货币资本直接转型成为了金融资本，股市、房产的暴涨就是它的结果。但是，一方面这种模式的盈利难以持续，如房价在年轻人低迷的购买力面前直线下滑，股市本身也严重依赖于实体经济的繁荣与否，另一方面金融领域不可能真正消化这些资本，否则金融资本就会吸干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造成可怕的产业倒退。因此，这些过剩的资本必须要找到新的可投资的行业，必须要成为能够直接从劳动力身上吮吸剩余价值的资本。

资本过剩的问题表现在农村上，就是有关农村改革的方向是必须要市场化、商品化，农村必须要“盘活”各种“闲置资源”，好拥有更多可交易的资产与过剩的商品交换。

这三种过剩，直接看来，似乎与农村的关系不大，毕竟它主要与城市中的工业经济相关，但是一方面通过工业间接地影响着农村地区，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共的政策，从而对农村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 2. 方法何在？

如何让农民富起来呢？一个最直接的思路就是发钱，给予各种补贴。然而，无条件的补贴，也就是低保，理论上只会给予那些十分贫困的人（实际上有些远非贫困的人反而能够享受到补贴），数额也会很低，并且必须低到只要有一点力气去劳动的人看了都会摇头的地步。这是因为，中共必须要确保大多数人口能够去工作，而不是白白地吃低保。而且，给大量农民足够“正常生活”的补贴，这本身就是一笔为数不少的钱，这需要资本家们分出大量的剩余价值，对他们来说是“不必要的负担”。另外一种更为广泛的补贴便是以生产为条件的补贴，比如种粮补贴。但是，很明显，一方面这种补贴也不可能太高，另一方面，这种补贴本质上只是在降低农民种粮的成本，却不能直接提高农民的收益，农民的收入实际上还是依赖于生产的结果——对他们来说则表现为粮价。

那么，提高粮价是否可以呢？粮价的提高，对于资本家本身来说，因此造成生活成本上升并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但对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来说，这就是一笔新的加在他们头上的负担，这只会让他们本就贫困的生活愈发雪上加霜，加剧他们反叛的

可能。对这种负担的提高造成的社会动荡的后果的担忧，也是中国一直禁止粮食大幅涨价的原因。城市无产阶级生活成本的上涨也会进一步挤压其它消费品的消费空间，从而使得中国的生产过剩更加严重。如果不想承担生产过剩进一步恶化的后果，这部分多消耗的货币就需要资本家提高工资来补偿。结果，兜兜转转，资本家仍要出钱。或者，资本家将这部分需要投入的可变资本的成本加到产品的价格上，那么最终整个社会生产就会回到经典的“所有人都给产品加价10%”的思维实验：结果便是什么也没变，只不过需要的流通手段数量增多了而已。

有没有不需要资本家忍痛分割出自己好不容易攫取的剩余价值，又可以帮助农民“增收”的法子呢？如果这种办法能让资本家同时还能攫取更多剩余价值，那就更好了。

一种自然的办法是：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如果农民能够卖出更多农产品，就可以增收了。但是这个思路只能适用于个别农民。我们都知道农民的劳苦，因此在精耕细作的模式下，他们能够继续追加的活劳动就很少，通过追加劳动能够提高的产量有限。提高产量比较普遍适用的方法是提高农业科技水平，包括培育良种、大棚的应用、改善灌溉系统、更新农机等，而这些方法主要是通过增加农业的固定资本投入与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来增加产量。当这些提高的技术为个别农民所应用时，确实能够提高他们的收入，可是如果普及开，整个社会范围的粮食供给大幅提升，就势必会造成粮价的降低，从而农民的收入仍然难以增长。此外，种子、化肥、农机的改进伴随着其成本的提高，结果产量的提高需要以种植成本的增加为前提，增加了普通农户的负担，更加阻碍农民对更先进生产方式的采用。



**农村人口流失与土地抛荒**

一些农业改良的方法本身也挺有活力，比如改种经济作物或者多种经营。可是，一方面在永久基本农田上，农民只能耕种指定的粮食，另一方面引入新的种植方式，比如轮作之类，就需要更多的投入，结果种地的成本又增加了，对于分散的农民来说，这是比较重的负担。多种经营涉及的经济作物受到市场波动影响很大，而这种

模式的推广则势必会造成相关作物价格下降，从而很难实际上增加农民收入。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由于上一年某种作物（往往是经济作物）价格暴涨，农民便跟风耕种，结果第二年价格猛跌，低到宁可让作物烂在地里农民也不愿采摘。如果真的想让农民致富，那么仅仅用从经验中能够得出的结论来回答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经验往往只是个别农民增收致富的方法，而它并不能适用于农民全体。要让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改善其生活，必须把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在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上思考问题。

于是还有一种思路，也是与多数发达国家经验相匹配的方法：减少农民的数量。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奋斗目标中就有“户均向乡镇企业或发达地区转移一个劳动力”以及“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等。在一定时期内，整个社会的人口以及饮食结构，继而对农产品的需求，总体上说不会波动太大，特别是在中国农业产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相对过剩的粮食也会被国家的粮仓收购，因此从事农业生产所能获得的总收入会接近某个一定的量。如果农民的数量减少了，农民的平均收入也会提高。总体来说，中国确实有农民不断减少的趋势，2005年乡村人口约为7.45亿人，到2024年这一数字已经降到4.65亿人，20年来乡村人口降低了将近3亿人。但是对很多地区来说，这似乎并没有带来农村居民收入的显著提升。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减少农民数量带来的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是和农业的机械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农民数量的减少，并不是因为有意识的调控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而只是因为各种历史因素对他们产生的强制力，使得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这种强制的因素我们可以与圈地运动相类比。一方面主要是由于部分农民不再种地，进城做了农民工，2024年农民工总数已经接近3亿人，另一方面则是年轻人大量地流失。这些“逃离”农村的人，直接地说来，并不会给那些还留在乡下的“老乡”们什么直接的益处，因为农村人口的流失直接带来的只是土地的抛荒。据估计，中国撂荒的耕地大约有3000万亩，相当于三个上海市的大小。相应降低的产量则被一些生产力日益提高的大农场弥补了，维持了较低的粮价。但是留在农田之间的“老乡”们则因为少有农机，无法扩大生产，更无法与那些大农场相抗衡。结果，虽然农业的生产力有所提高，但是这并不表现为农民数量减少的原因，而只是表现对农民减少的补偿——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力提高而产生的红利主要都是被大农场主吃走了，而它起到的作用也只是维持着粮食产量不至于崩溃，不让农村的崩溃带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崩溃。农民的人数确实减少了，但是由此造成的农业收入的集中，却与分散的农民无关，而主要是被大农场的资本家们收入囊中。

要通过减少农民人口而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要基于农业的机械化的普及，也就是说必须要基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而这又基于土地的大规模利用，否则农业机械化反而会亏损，也派不上用场。但是，土地的大规模运用与改开后“包产到户”造成的大量农民独立生产的情况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农民独立生产造成土地的分散化，另一方面独立的农民也没有财力购置相关的中型或大型农具。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分散的小农状态对农业生产力扩大在各方面的阻碍。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几个结论：首先，农民的贫困正是来自其分散的小农状态，并且两者互相都会再生产出对方，尽管这种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下是越来越缩小的再生产；其次，无论从什么角度分析农村经济问题，都无法绕开分散的小农状态，这种状态甚至可以理解为当下农村的现状甚至是本质。因此，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只要是追求农村的彻底改变，都必须扭转农村的分散小农状态，而这正通向农村的现代

化，正是农村中的人们摆脱原始的状态，走向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必然途径，尽管这种途径往往是漫长而痛苦的。改开后中国也发生过“圈地运动”，但是这里被圈的地更多是被用于城市建设去了。再搞一次圈地运动显然不现实，否则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就要直接对上亿新劳动力的冲击，另一方面中国所谓的“社会主义”面纱就要被自己戳破，会引发大规模的反抗，引发社会的急剧动荡。土地公有的制度一度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提供了便利，如今却成了阻碍。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方法，在不触及产权大范围改革的同时，能够将土地集中到有能力的机械化耕作的大公司手中。

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中共发明了“土地流转”。简单来说就是：农村的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承包权归农民。经营权依附于承包权，农民可以将经营权流转出去，或者说“租”出去。到2021年，全国家庭承包地流转面积已达5.5亿亩，超过确权承包地的30%。这使得土地能够集中起来运用了，为生产力的提高开辟了道路。在中共的宣传下，这似乎将是一个多赢的局面：农业相关的公司有办法直接参与到了社会生产中，能够赚取利润；中共政府能够防止失业问题进一步加剧；农机制造与维护、农业服务、农产品批发等等相关行业的资本家也与有荣焉。那农民呢？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有的拿着极低的流转费作为极低的退休金的补偿，有的则受雇于农业公司，成为了农业工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工人阶级，由吃农业的苦变成了吃工业的苦。没有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农民，则受到大公司所产农产品的竞争的压力，更觉艰难，有的甚至还要在农闲时节打工补贴家用。结果，土地流转表面上被称作“善政”，但实际上不过是对于资本的善政。它或许开辟了一条改造农村的道路，但开辟者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资本的增值，并且是扭扭捏捏地、不情不愿地、迫于现实情况才实行的开辟。



### 在“土地流转”的政策下经营权被流转给了企业与资本家

还有一种经常被提起的思路：要让农民有新的收入渠道。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中就说：“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开发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因地制宜地发展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增

加农民收入”。新的收入形式，第一种是工业的，发展农村加工业或相关的制造业，以此增加农民的收入。可是，建设在农村的制造业，凭什么比城市中的更有竞争力，能够与城市中的同行争一杯羹呢？无论在劳动力数量、人口质量、基础设施还是市场匹配、科技水平，农村都无法与城市竞争。即使建立了农村的工业，也无非是做一些小作坊式的生产，从业者只会成为小资产阶级中最底层的、生活水平与工人几乎没有太大区别的部分。再说，即使真有办法使得农村工业崛起，农民也不过是就地变成工人，也不过是从吃种地的苦变成了吃工作的苦。这种方式有明显的限度，农民因此获得的工资很难超过城市中同行的平均工资，并且以农村相对较低的消费水平与更少的消费场所为借口，工资往往只会更低。

另一种模式腾空而出：发展乡村旅游，以及与此相关的第三产业。此举确实起到过成效，但也只是对极个别乡村而言。旅游业的商品交换模式具有特殊性。它所提供的使用价值——旅游体验，依附于资方对景区的带有垄断性质的占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旅游业收入有一定的地租性质。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某种依赖消费作为中介的财富再分配。旅游业市场的繁荣本身依赖于一个庞大的、具有较高收入的“中产阶级”。2024年中国旅游总花费达到了5.75万亿元，这个数字总额看起来很大，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还要被城市旅游和一些著名景点旅游分走，这个旅游业收入总额能分给乡村的本就不多。而随着中产阶级收入水平的逐渐萎缩，旅游业市场能够再吸引多少货币还未可知也。更何况这还很依赖相关的自然资源禀赋。绝大部分农村，所有的“旅游景观”不过是乏味而单调的农田。想要发展旅游业，也必须要有相关投资，比如打造“农家乐”之类。这本身也需要资金，于是资本又可以找机会介入了。但是，前些年涌入农村旅游行业的资本很多都是抱着投机的想法，在建设景点时的人工布景往往又千篇一律，没有新意。过了一段时间，新鲜感过去了，资本赚够了门票，又很快撤离。结果，农民什么也没获得，还要收拾“旅游景点”的烂摊子。根本上来说，挖空心思去找什么“新模式”都是徒劳的。从最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如果真的要乡村振兴，最根本的途径只有一个：提高农村生产力，最终达到消除城乡区别。这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一定会达到其预期的结果。

### 3. 农村资本主义化

上述的一系列方法，包括在农村发展制造业、公司+农户模式等，本质都是将农业农村资本主义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中就强调“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生产，增强本地区经济的内部活力。”“山区……建立合理的生产结构，密切同城市和平原地区经济的联系，变单一经营为综合经营，变自然经济为商品经济，纠正依赖思想。”“搞活商品流通，促进商品生产”等。诚然，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推广后，农村成为了改革的“突破口”，但实际上，那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倒退的修辞，不过是政府通过退出农村省下了农村公共支出的开销。在统购统销还存在时，我们尚可以勉强认为农村经济仍受到整体上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商品生产的性质显露地还没有那么明显。当农民完全“自由”了之后，农村的经济就更加倒退回了一种类似于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之间的中间态的模式：多数农民生产粮食首先满足自身需求，多出来的才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换回货币。但是这些货币的大部分还要投入到购买化肥、维护农机等等生产性的花费上，能留下来的积蓄少之又少，根本谈不

上资本主义积累，甚至还有“种地亏钱”的现象。部分地区的农村工业（或者说乡镇企业）崛起，在一定时期给农村或者说镇域经济带来了活力。虽说乡镇企业多为“集体所有制”，甚至担负起农村一些医疗、教育的公共支出，但是不能忽视这些企业整体上还是遵从商品生产的规律，从而遵从价值规律。因此我们说乡镇企业一定程度上给农村带来了资本主义化的可能。但是国家向农村转嫁危机的行为又击垮了乡镇企业。结果，农村的很大一部分至今还没有完全资本主义化。

另一面，中国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欣欣向荣，这背后少不了农村的支持，包括农民忍受着长期难以改善的生活水平数十年如一日耕种，为城市提供基本的粮食支撑；工农业剪刀差的继续存在乃至扩大；强征或以低价收购耕地用于城市建设，省下了大量购地成本；“家电下乡”，家电等消费品在农村寻找市场；农村一定范围内收容了潜在的失业者，节省了城市建设与管理的成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就是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了：大量分散的农民还在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就是证明。尽管法权意义上讲农民并不掌握土地的所有权，但是中共三轮土地承包都尽量延长土地的承包期，本意就是在营造较为稳定的以市场逻辑为基础的土地使用环境，因此在这里一些法律上细枝末节的区别并不会影响我们的分析。资本主义的企业已经将触手伸了进来，通过农业生产资料的高价出售与粮食的低价收购扼住农民的脖子。但农村还不是这只利维坦的领土，它只是中国资本主义的附属或边缘领域。某种程度上说，也正是城市对农村的过度压榨限制了农村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进程。正是因为农村尚未完全资本主义化，农村少有能够与政府以及城市中的大资本集团分庭抗礼的资本主义势力，从而农村能够几近无偿地为城市的发展提供过量的价值。长期低廉的粮价也导致农业资本的利润率注定会较低。但是，既然资本主义已经席卷了中国的城市，农村就注定被价值规律控制，农民就不得不在不断萎缩的情况下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从而这块区域沦为资本直接控制而不是仅仅通过市场间接控制，也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中共从20世纪最后几年以来的农村政策，就是试图将农村也资本主义化，让这块虽然被侵蚀，但依旧广阔与肥沃的土地成为资本直接吸食剩余价值的场所。

既然在附属阶段的农村也能够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大量资金，那为何还要将农村资本主义化呢？首先，我们要知道，现代国家（准确地说是资本主义现代国家）的合法性，主要地来自于“经济发展”。这在中共内部有明显的表现：中共要证明自己统治的正确性，往往会拿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说事。中共内部的考核中，GDP也是一条重要的指标。在《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中提到“改进贫困县考核机制……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也说明了这种机制的广泛存在。虽然对于“经济正在发展”的论证有各种眼花缭乱的数据，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下，所有的经济发展，最后都归结为剩余价值的不断榨取。中国实行将近30年土地财政也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卖地并进行基建、发展房地产是来钱最快的方式，于是地方政府便对此趋之若鹜，全然不顾其后果。农民失地从而失去生活保障、工人住不起自己建造的房子、大量土地被面子工程浪费……结果房地产泡沫一破，地方的财政问题就显露出来，甚至到了地方财政收入连利息都还不起的严峻境地。在这个例子中，地方追求GDP数字的高涨只是表象，核心仍是在于剩余价值的榨取。其中耕地收购价格的低下与房价不合理的高昂，实际上都是一种畸形的榨取剩余价值的特殊方式。它的特点是利用政府权威使得土地与房屋价格系统性偏离其价值，

方便政府与相关投机企业在贱买贵卖的价值量分配中获得剩余价值。

农村的资本主义化也是如此。对于农业本身来说，我们不否认这个过程会带来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包括先进农业机械、高产作物品种、更科学的培育方式、土地的集中化利用等等。在这里，虽然带来了苦难，但是资本主义对农民分散状态的打破，确实对中国的农业发展能够起到“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一方面，这个过程会带来大量农民的失业，从而拉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另一方面，在过程之后仍然被雇佣的农民也无法从这个生产力提高的过程中获得什么，相反，由于粮食生产成本的降低，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也相应降低了，他们被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的量反而更多了。另外，即使在中共还没有明显的农村资本主义化政策的时期，农村也处在自发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上世纪末的乡镇企业便是一个例子。此外还有一村一乡中由于人口流失与地方性的“种粮大户”的出现而自然产生的土地集中。没有这些碎片式的资本主义化的进程，农村的萧条程度还会比现在大得多、严重得多。既然前三十年的农村对于着急退出的政府来说只是“烂摊子”，既然前三十年的模式在改开的进程中已经不得被宣布“全面破产”，既然中共不可能再回头像前三十年一样把农村如此多的“自由”劳动力再“束缚”在土地上，那么，极为讽刺的是，现在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拯救农村。只有绞尽脑汁让资本相信，现在把钱投资到农业上也能榨取剩余价值，才能让整个农村不至于继续陷入持续的崩溃。

上一段还是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的。此外，农村资本主义化对缓解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具体问题也有一定的影响，至少在中共的愿景中会是美好的影响。首先是前文提到的三重过剩。第一，劳动力过剩。中共其实有很大的愿望通过在农村发展相关产业以增加就业。但是我们前文也指出，资本主义公司在农业机械化的条件下，增加的就业绝对少于农村的数亿人口。在生产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在农村投资建设新的工厂是难以有什么收益的。旅游业这条路，大部分农村也不可能走得通。新增加的就业远不会多于目前的人口，还会破坏农村户口者最后一条退路。资本主义范围的扩大只会造成劳动力过剩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生产过剩。虽然中共在城市实行各种措施以“提振消费”，但是明显效果不佳。对他们来说，农村似乎能够成为下一个消费过剩产品的地方。在21世纪初，就有家电下乡以解决相关行业生产过剩的先例。后来如文明农村建设、汽车下乡等等农村社会生活现代化的措施也会提高农民相关的消费需求。让农民增收，也不是说让他们成为资本家，获得能够增值的资本，而只是希望他们增加的收入能够重新投入消费领域。分散的农民收入不稳定，种地的成本还需要自行承担，因此他们的消费往往极低。但是，如果农民无产阶级化了，首先其收入相对会稳定一些，其次农业种植成本也无需自行承担。这样，他们能够用于消费的货币似乎更多，能够缓解生产过剩的问题。对农业机械等等相关生产资料的需求提升也可以消耗一部分产能。但是，一方面农业的生产本身就可能造成过剩，农机等等农业生产资料相关的生产也相应地会出现生产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工人创造出来的却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财富也是增加了。粮食生产成本的降低，同样更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与劳动力的过剩一样，资本主义的扩大只会造成生产过剩的进一步扩大。

第三，资本过剩。中国在21世纪初的大量出口伴随着货币超发，大量的资本没有

合适的投资领域，于是大量地涌入房地产与股市。但是，这个领域有明显的投机性质，泡沫一旦戳破将会导致危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资本输出的路径，但是在全世界都资本过剩的情况下，激烈的竞争降低了利润率，从而使得资本输出也有一个无形的限制。农村是另一个被寄望的投资场所。在过去，农村之所以没有被资本垂青，一方面是因为农村的生产周期过长，周转过慢使得资本并不愿在农村投资，另一方面，大量的农村资产都没有商品化，也使得投资有着层层阻碍。因此，有人提出，将农业金融化，将产权交易、期权、股票等等金融的运作方式投入农村。但这也不过是通过金融的方式让经营农业的资本家更容易融资，同时让那些投机家新找到一个发财的机会。对农民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被分享的实际的利益。农村的金融化说到底只是增加了农村资本的流动性，只是增加了农村经济的杠杆与不确定性，只是增加了虚无缥缈的“未来可能会有”的收益。相较于农业机械化，金融化甚至连生产的性质都没有，反倒是给资本家更多的敛财空间。

我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分散的农民，由于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建立，由于贫困而艰难的生活，已经难以再生产自身了。除了所谓“新农人”（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把新农人看作资本下乡的先导，他们的实践经验将会成为农业资本宝贵的资料），乡村的年轻人已经成了珍稀物种。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那么，在可预见的20年或者30年后，农村的空心化将达到一个非常骇人的程度，中国将出现大面积的土地抛荒与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届时接管农村的，必然是大量的农用机械。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这些机械的主人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的大公司。因此，农业机械化也是中国数十年来愈来愈大的城乡差距导致的必然结局。与其让这个结局以一场严重的饥荒为先导，那还不如在现在就尽力扩大农业公司的统治范围。这就是农业资本主义化背后的因素。将来，它也必然会引起各种作物（至少是经济作物）价格的剧烈波动，让资本主义的威胁深入这个东方大国的每一个角落。

### 三、现代化的“角力”

前文中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说农村社会在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中处于衰败的进程中，并不是指所有人在这个进程中都会吃苦吃亏。有些人能够利用这个契机赚得盆满钵满，比如强拆卖地的政府官员、承包大量土地的种田大户等。不平衡的生产状况使得农村必然会产生自然分层，形成不同的势力。为了对抗现代化进程中带来的成本，争夺现代化带来的利益，这些势力之间又会存在激烈的冲突。日本学者田原史起提出过“公”“共”“私”三重资源治理理论。“公”代表着政府的再分配原则，“共”代表着社区的互惠原则，“私”代表着市场的交换原则。这些原则背后的实质，就是农村内部不同势力的角逐。我们发现，在扶贫工作中，不仅有内部的贫困村村民内部的矛盾，还有来自外界“公”“共”“私”带来的矛盾。这些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矛盾都易让已经脱贫的人们重又返贫。

#### 1. 农村内部的矛盾

内部的矛盾主要是由于贫困村村民的自身的局限性造成的。显著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让贫困村村民们倾向于在主观上将自己与他人获得的利益相比较。他们认为只要自己获得的利益能与他人、政策利益相均衡时，就能接受政策。否则，他们便会对政策产生抵触的情绪。同样，在他们眼中，眼前利益往往大于长远利

益。多年来的贫困生活，已经将他们的目光渐渐锁在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这种目光的短浅与他们信息的封闭是十分相关的，而这又是与他们所处的小农式的生产方式相关。直接地将政策加于这些贫困村民头上，事实上显示了政府作为所谓“现代化引路人”的傲慢——政府擅自将来自外界的贫困标准与扶贫政策嫁接到贫困村中，却往往忘记了事先改造贫困村的长远意识。政府将自己看作“救世主”，却在实际上并没有充当救世主的能力——他们在用二十世纪的思维管理十九世纪的人。而调动贫困农民本身的力量，则是实际上难以做到的。

## 2. “公” - 官僚的傲慢

至于外部对扶贫工作的冲击，我们从公共私三方面来看。提及“公”，贫困户们甚至我们的第一反应便是有没有官员干部在吸取政府输给村民们的“血”。毕竟贪污这种事情在中国可太常见了。在腐败烂臭的官僚体制下，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就这样，这种“腐败传说”便深深地印在贫困户的脑海中。这反映了官僚长期在农村的资源分配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在实际上分配得了最实惠的利益。因此，不管贫困户们获得的补贴是多是少，是否获得地方政府下发的全部补贴，在他们心中都会无意间产生对政府政策抵触的意见。而且，在贫困标准以上的非贫困户同样对贫困户和政府政策也有意见。明明是自己也就比贫困户活得稍微好一点，可是却拿不到政府下发的补贴。这样在贫困标准左右的非贫困户也会与拿到补贴的贫困户们产生或多或少的矛盾。昔日有苦一起吃的邻里们却不能做到有甜一起享，甚至反目成仇，何其痛哉。这正反映了官僚在处理贫困问题中的一刀切现象：他们的全部任务就在于“脱帽”，在于作出“政绩”，至于民众对此的意见以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则关心甚少。这正是现代化的推动者是来自外在的强迫而不是内在的动力的直接后果。

地方政府给贫困户们直接输血，使其收入超过贫困县，这到底算不算彻底脱贫呢？当然不算，这种脱贫也只是在短期内有成效，从长期来看是算不上彻底脱贫的。输血是向贫困户直接提供钱物，贫困户往往会快速消耗被输送的物资，出现返贫现象及“输一点用一点，不输不用”的挨日子现象。如果仅仅依靠输血，那么只有对贫困户进行持续的、输血量不断增加的输血，才能提升贫困户的主观幸福。若输血中止或输血量的增加低于生活成本的增加，贫困户的主观幸福感还会下降。输血是另一种形式的不劳而获，易激发懒惰。懒惰一旦形成，会造成“扶了贫，贫了扶”的恶性循环。输血也对地方政府财政造成了巨大负担。只靠输血不能真正扶贫，造血是必需的扶贫方式。对注重眼前利益的村民们来说，直接输血绝不是上策。

可造血就一定有成效么？举个例子来说吧：为了帮助一位贫困户脱贫，地方政府拨给了他上百只鸡，让他开养殖场养鸡致富。一开始，他能凭借着鸡生蛋、蛋生鸡来慢慢脱贫。但是没过多久鸡群生病了，他只能束手无策，眼看着鸡慢慢死去。可不是由于这位贫困户懒，而是他从来没搞过养殖鸡的工作，在养殖鸡的技术方面都欠缺些要点。输血不输技术方法，他的脱贫梦也就这样破碎了。有的地方政府给贫困户们输的血也是暂时的，贫困户们还需要在脱贫后慢慢还清政府因为“有情有义”输来的血。如此，暂时脱贫的贫困户们为了还清政府输的血又重背上厚重的债务返贫了。脱离集体化逻辑的农村官僚只能以市场逻辑来扶持贫困户了，但市场逻辑恰恰是贫困户越来越贫困的原因。在市场的的环境下，贫困的农民只会越来越接近工人

的状态。从一定角度来说，官僚的存在正是与市场逻辑互为补充：官僚的行为表面来看是“政府补助”，但正是在承认了每个农民是私有的小生产者的基础上才进行补助，正是在遵守市场最基本的规则的基础上进行补助。市场表面看似并不一定需要官僚的介入，可是，正是官僚的存在维持市场的基本秩序，市场的逻辑才能得到保卫。尽管官僚曾经做出过各种骇人听闻的“事迹”，如强拆强占等，好像是在破坏市场的逻辑，可这往往也建立在官僚政府本身经济困难的基础上——正是它们把自己视为一个市场主体（尽管是在法律的监督下——但是这恰恰证明了法律的阶级属性），而财政的窘迫又把他们推到一个不得不使用最下三滥手段的地步，它们才不得不利用那一点权力以暂时破坏市场逻辑为代价，去维持自己作为一个市场主体的地位。如果乡镇的行政机关能够忽视价值规律，直接接受更高一级行政机关的资源调动，这类事情又怎么会出现呢？官僚制与市场的互相补充，正是一对矛盾，证明了市场有着不断“自毁”的倾向。

最近我们经常能听说政府又派大学生村官下乡来治理农村了。可是，一方面村官再多，中国的乡村却更多，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村子已经是青壮年劳动力几乎流失殆尽，那么派遣村官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而且村官是由地方政府下派的，是听从地方政府的命令的。根本上，与其说这些村官的利益在于带领贫困村贫困县脱贫，不如说在于完成政府的命令。至于贫困户们是不是致富了，他们大多数人可不管这么多，除了一小部分真真切切地为贫困户们服务的村官们。他们往往会被搬上荧幕，作为政府自己脱贫政绩的宣传需要。但是，只要这些所谓“大学生村官”不愿意一辈子待在乡村，只要他们下乡的愿望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完成政绩，那么他们的实际作为最终就不会是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

### 3. “共” - 来自过去的力量

接下来从“共”的角度分析。从区域上看，中国农村可以依经济发达程度，分为沿海的东部发达地区和广大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农业比重比较低，村庄有一定的工商业基础，农民主要从事第二、三产业，往往因为办有工商业而有大量外地农民来此务工经商。村庄办有工商业就能够享受到土地非农使用所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村集体也因此有一定资源。而中西部地区大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农村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留在村庄的大多为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老人、妇女。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空巢老人这个词便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很多老人在儿女的提议下，甚至在地方政府的强制下，纷纷搬离了世代居住的农村，以至于很多村都成了无人村。

而从南、中、北的差异来看，华南农村因为聚族而居，村庄大多数为团结村庄，村民比较有能力解决公共事务，举办公益事业。若有自上而下的资源进到村庄，南方农村就可能调动起村庄力量来有效接应资源和有效使用资源。华北农村因为村庄内存在多个分裂集团，不同村民集团之间容易爆发激烈的冲突。如果有自上而下的资源进村，村庄如何或能否分好资源，得看村民集团的实力如何了。以长江流域为主的中国中部农村地区，因为村庄中几乎不存在影响村庄政治的公共性的血缘集团，而使村庄治理处在散漫状态。在这种村庄政治中，很少有强有力的反对者，同时也很少有强有力的支持者。村干部本身的能力以及对外来资源的使用成为了村庄是否能脱贫而不会再返贫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公”“共”“私”格局的最大特点在于“共”历来所承担的角色比较明显。这一特点并不完全因为中国农村的互惠关系格外得强固，而是因为属于公、私的资源流入公共治理的渠道有限。由此看出，“共”是中国基层治理的最大资源。而“共”的主要承担者历来都是农村精英，他们有与“公”紧密联合的村干部，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长老，还有经济能手等等。他们将贫困户们自下而上的需求和政府的自上而下的转移资源联系起来，在二者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但是他们有可能继承着国家意志，有可能代表着村镇利益。在2006年取消农业税之前，农民们不仅要交农业税，还要承担集体的“三提五统”税费，而这些税费一并由村干部收取。因为缴纳农业税是法定义务，地方政府可以采用强制措施来向农民收取，所以，一方面，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向农民强制收税的情况，另一方面，因为可以强制收税，地方政府可以乘机搭车收取“三提五统”，收取共同生产费。

在团结的南方农村，村干部一般要站在农民一边，对上级的强制持消极态度。地方政府因为缺少村干部的协助，而较难向农民收取过多过重的赋税。在华北农村，村庄内存在多个派系：一派上台协助地方政府收税时，另外一派或多派的（非正式）精英就会上访。这样，多派精英们通过上访同样能减轻华北农民们的负担。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时代依赖的宗族组织都由于外界的刺激不得不得到了强化。面对同时拥有合法性与权力的乡镇官僚，农民如果单打独斗，就肯定会失败。可是，更先进的组织方式一方面由于经济组织方式的落后而无法自发建成，毕竟小农之间只是像“装在袋子里面的马铃薯”一般，本身并不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从而只能向后退，寻找古老的、未经资本主义影响与破坏的组织方式，也就是宗族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结合起来的理由，官僚的存在，在“改革开放”以前反倒是更先进的组织方式的代表者与实际组织者。官僚本身抛弃了集体主义，绝不代表农民会在同等或者更高的层次再将集体主义捡起来。即使是宗族层面的组织，也恰恰建立在各家各户互相分离的基础上，只是一种原始的、基于“亲情”“道义”“规则”的协调机制，远没有超出古代的组织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青壮年的流失、农村的空心化，只会让这种宗族越来越衰落。因此，以宗族为单位对抗官僚的方式，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表示农村的现代化程度还不够，资本主义已经在侵入，但还没有将整个农村改造为它自己的模样。

与中西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集体资源丰富的沿海发达地区，或者说，资本主义已经生根发芽的农村，“同族亲情”已经逐渐瓦解了，因为村庄精英可能凭借其掌握优势资源，脱离村民，造成农民新的政治无力感。随着市场化的“春风”席卷农村，这股力量也在不断地侵蚀农村中的共同体。经济的结算单位被最小化，被缩减到家庭一级，农村精英就越来越难以成为农民的保护伞，而更有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放任其它小农沉沦下去。前现代的共同体在资本主义的浪潮下有多么无力，到此也就可以很明晰地看出来。不过，或许是辩证法开的历史玩笑，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历经各种运动都只是暂时压制、都没能完全突破的前现代堡垒，在资本主义时期，就如风卷残云一般，好像是拖拽着把几亿人拉入现代经济的行列。这不是说，社会主义时期的改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但是它至少能让我们看清，到底哪个阶级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益强大，而哪个阶级又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日益萎缩。

在取消农业税之后，合作社成为了国家农业政策的主流。合作社一方面起到了统一购买原材料、统一卖出农产品的作用，另一方面起到了团结贫困户的作用。可是合作社本身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同样会面临市场竞争失败、投资失误等经营风险。一旦合作社经营不善甚至破产，所有社员都会受到牵连。而且合作社的要职往往由农村精英担任，容易出现“大农吃小农”的现象。同时，有的企业也会采取帮扶贫困户脱贫的行动。企业通过雇佣贫困户们，让他们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让他们换得在贫困标准之上的工资。但在这个过程中，公司可以利用信息差，欺负贫困户的无知和无能，用低价来收买产品，用低工资来雇佣贫困户们。在经济不景气、受到过疫情冲击的当下，贫困户们通过给企业打工得到的回报越来越少。结果刚脱贫的贫困户们又回到了贫困生活。这种贫困就不再是小农式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低下导致的绝对贫困，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导致的结构性贫困。在这里，现代化的神话完全破产了。所有的所谓“现代化”，最终都必须归于资本主义化。

#### 4. “私” - 价值规律的强迫

贫困户们想要脱贫还离不开市场的交换调节作用。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私”。贫困户们要想把自己拥有的资源转化市场的生产要素，就必须得经过与市场间的交易来换得，但是由于信息差的普遍存在，这种交易有时是完全不平等的。另外，市场将贫困户们与市场交换，从而是消费绑定在一起。为了帮助产品找到销路，大量主播通过网络直播的形式来推销农产品，来使贫困户们脱贫。而在经济下滑的当今，消费者无力也不敢消费贫困户们产出的商品，依赖于市场的贫困户们自然便容易返贫了。此外，这还会使得贫困户的致富路径更加依赖于平台推流、依赖于懂得相关技巧的“专业人士”。这会造成一种颠倒：仿佛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而是消费决定生产；不是商品的制造决定商品的卖出，而是商品的卖出决定了商品的继续制造。平台可以脱离某个贫困户，但贫困户却无法脱离平台。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使得平台有实力与借口进行抽成，从而在几乎什么也不用做的前提下就吸干了贫困户好不容易造出的血。

此外，公司的介入还会使得原本的农村精英被迫以市场逻辑与公司竞争，而结果可想而知：往往是农村精英的落败，土地的使用权、生产的指挥权都会落到公司手中，从而打破了农村原本的权力结构，破坏了原有的团结的宗族，而使得农民越来越原子化。通过对农村组织结构的瓦解，农民们便更容易被市场的经济力量所控制。这再一次显露了，资本主义的力量远远超出经济本身，而对整个社会的形态会造成深远的影响。与农村精英的落败相比，公司，或者说资本家的经济力量会越来越强势：比如某地将集体建设用地入市，3年累计9.7万亩，但大多数只能做仓储、民宿。随着房地产的降温，租金回报将会继续下滑。农户很难退出集体与工商资本的“合作”。2024年涉农股权纠纷案同比增长26%。2024年工商资本租赁农地面积1.15亿亩，其中23%存在拖欠租金、改变用途、提前退租等现象，风险更多地转嫁给了农民。并且集体资产抵押贷款的真正放贷的不足30%，平均利率又较高，金融进入困难。

此外，还有“旅游脱贫—环境恶化—返贫”“脱贫—多生子—返贫”等返贫情况。总之，这些脱贫尝试的部分失败，正好表明：资本主义远远无法解决贫困问题。它只是把绝对性的贫困转化为结构性、体系化的贫困。

既然将农村资本主义化不仅是国家意志，也是经济决定的不可避免的趋势，那么公司将会是这场牌桌上笑到最后的赢家。尽管目前确权承包地的土地流转也才占到基本农田的30%左右，但是它已经表明了一种大趋势：小农将逐步消亡。无论是贫困户，还是农村精英，甚至是官僚，都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公司。农业公司将会把中国最后一批没有直接接触现代化的人群驱赶着被迫“融入”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家庭，将会继续增加失业的人群数量，并消灭失业者最后一块净土，将会使得最后一批前现代的人群转化为无产阶级，并且还是生活水平较低的那一部分。这正是同资本主义发展一同发展起来的否定的因素：它创造出了将会毁灭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

## 四、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

在中共农村问题当中，农民工可谓是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在中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中，农村充当了一个“失业蓄水池”的角色，没法打工就只好回家种地。但总体上，农村人口一直在大量地流失，因为随着乡镇企业的彻底消亡，农村彻底失去了真正消化过剩劳动力的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

### 1. 农民工的特征

当代中国的农民工群体无论在空间的意义上抑或是社会的意义上都呈现出边缘性的特点。他们大多进入城市的次级劳动市场，在工业与服务行业中从事着高强度、低工资、低保障的非技术性劳动，工资收入多半只能维持他们自身的劳动力再生产。赡养老人、抚养后代、居住、教育甚至医疗等费用，大多并未计算在他们的工资收入之内。背井离乡的他们只能聚居于控制严密的工厂宿舍或者城中村中的拥挤狭窄的出租屋。他们的子女进入当地学校必须交付昂贵的学费。并且由于积分政策，他们大多只能上私立学校。大部分的农民工不能享受社会保障，他们工作的绝大部分工厂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设施，造成大量的工业伤害和职业病。而每当意外出现时，没有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他们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赔偿，而依靠他们养活的家长会马上陷入崩溃的境地。城市不是他们可以长久居留的地方，农村才是他们最后的归宿。除了出卖劳动力换取工资，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同，从文化上无从知晓现代社会的运作，无法以公民的身份参与政治与社会生活。

### 2. 农民工作为劳动力的特殊困境

伴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央政府将发展经济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于是各地政府将发展经济设定为首要的社会目标，尝试城市规划和发展成为世界工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地方政府纷纷投资兴建大量工业区和经济开发区，而这恰好为全球资本利用中国廉价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提供了基础。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将城市中的人口分为常住人口和暂住人口。对于在城市中打工的暂住人口，即农民工，城市无须承担其住房、教育、工作保障以及其他环境基础设施及福利等集体性消费资料以维持其长期的劳动力再

生产。而且，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带来的产业结构不再需要他们的非技术性劳动，一旦他们与某个具体企业之间的合约期满，这些农民工就不得不返回农村老家或者去别的地方寻找另一份临时工作。



### 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农民工

农民工这一劳动主体的职业和身份转化都受到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正是城乡二元体制规定着这一主体的劳动力再生产形式、内容以及本质。农民工劳动力的出现和使用与其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空间和社会的意义上被割裂和拆分开来，前者发生在城市，其身份是工人，后者却只有回到农村社会才能进行，其身份是农民。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缺乏长期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他们的再生产必须以农村为补充。本来应该完整统一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被肢解开来，其中的一个部分（劳动者个人体力和脑力的再生产过程）是在工厂-城镇中实现的，而另外一个部分（抚养子嗣、老弱等）则是在这些移民工人的来源即乡土-村社中实现的。这种割裂一方面是有意识降低劳动力价值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农村资本主义化尚未完全推广的副产品。

对于劳动力再生产，国家不主动地对其进行具有决定性和前瞻性的干预，而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的话语力量推动下，主动让位给缺乏管制和规范资本与社会非正式部门，由它们替代国家并借助市场使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简单日常再生产得以勉强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中国城市中只有劳动身份而没有公民身份的农民工，他们所面临的是双重的压迫：一重压迫来自控制其生产过程的资本，另一重则来自缺位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国家。正是由此而导致的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不仅使得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安排在市场转型期得到延续，也延缓了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的进程。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就无法无产阶级化，二代甚至三代农民工的出现就是证明。既然农村只能在越来越缩小的规模下再生产自身，那么农民工的最终归宿就将是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说失业的劳动后备军。

中国的产业劳动者大多来自跨地区之间流动的农民工。国家通过控制人口的僵化的

户籍制度以及安排二元劳动力市场使得农民工在制度层面上就被设置了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保持农民工身份的模糊性，使中国和全球资本在其劳动身份上获益的同时，可以名正言顺地逃避任何有利于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福利支出和成本。针对工业化过程中存在的大量流动人口劳动的不合理再生产模式，国家权力的有意识的运作和安排不仅没有对其削弱或改变，反而将其加固，从而有效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减少城市化的压力。这是除开极低的工资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之外又一层隐形的剥削。

一方面，由于户口与城市福利之间的联系，没有当地户口的农民工不可能获得政府公房或者单位公房的使用权或所有权，同时更不可能承受城市商品房的市场价格。另一方面，由于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都限制这个新兴的打工阶级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区，于是，维持这一无法在城市中生根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力日常再生产的责任便落在了资本以及社会非正式部门的头上。农民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空间分布状况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城市中以地缘为纽带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如北京的「浙江村」；二是在城市扩张时期外来人口聚集的「城中村」；三是在城市工业区或经济开发区中常见的工厂宿舍，通常与当地社区形成分割的二元社区。农民工劳动力再生产的空间形态几乎全部是由资本和社会非正式部门主导和组织的。

改革开放，使农民工可以自由流动，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进厂打工，这是一种离开家乡的自由，释放着他们渴望改变的欲望。而伴随着这种自由的，则是向城市资本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一旦他们获得这种自由，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只能从一间厂跳向另一间厂。除此之外，一方面，他们失去了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或者工人的自由，因为他们的正式社会身份是农民，无论是在法理意义还是事实上，他们都不可能合法而永久性地迁入城市。另一方面，他们也同时失去了回头的自由。尽管种种结构性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在城市中生根，但是他们与其农村社区之间的实质性的分离却已经开始发生，对于第二代的农民工们来说尤其如此。农村劳作方式的贬值、农业生产技能的缺失，使土地实际上已经不能再在物质与精神的层面上继续支持他们的长期劳动力再生产。除了步入资本主义设下的死局，他们已经不再有桃花源。

### 3. 割裂的乡村与城市

如果我们走进一些小县城的农村，就会发现其惨状：很多土地不再种粮食，而是被荒废，被占用。在乡村里，绝大部分人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年人，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被抛弃了，似乎一切进步都没有到他们身上，他们的面前还剩下什么呢？一片菜地、一盏相隔几公里的路灯、不再清澈的河水和不断逝去的兄弟姐妹。中国一直在宣传的“助农”“带动乡村发展”在这一切面前都成了笑话。事实上，这些留在乡村的老人走过最远的距离可能是离着乡村几公里的小镇。他们平常还靠什么为生呢？或许只有那断断续续的几百块钱的养老金，或许是那一省再省的、已经泛黄的钞票。当他们年轻时，那些利用乡村剪刀差的官僚、资产阶级享乐时，他们耕种着一亩三分地；当他们年老时本该享受天伦之乐，但也只能坐在小板凳上看着已经待了几十年的乡村。

乡村与城市在中国不断高速发展的时候被不断地割裂，直到如今已经散发不出一丝活力。事实上，从农民工开始涌入城市后，乡村就开始被遗忘了。资本主义急速飞驰的经济割断了以前乡村的亲戚纽带，也将这片土地上已经受苦几千年的农民甩在

了身后。所谓“城乡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也只不过是掩盖割裂的乡村与城市的谎话罢了。

## 五、总结

正如 19 世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埋下了资本主义生根发芽的种子，如今中国农村的资本主义化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资本主义的扩张为农村人口结构的改造、使其逐步脱离自然经济的深远影响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为解决中国前三十年没有解决的问题提供了契机，即使这种解决方案是在非常痛苦的条件下去进行的。农村的资本主义化，既是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促进的一个大的趋势，也是在各种偶然性中显露出的必然。我们又回到了那个结论：资本主义必须、必然不断扩大自身，必须不断占领、吞并、同化那些“处女地”。可是，一旦那些“处女地”被同化殆尽，就再也不存在一个通过向外扩张来缓解自身内在矛盾的方案。内在的矛盾必须以内在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内在的方式不能是局部的改良，因为那是对根本上的弊病与矛盾的忽视。内在的矛盾必须通过彻底的改变，也就是彻底的革命来解决，必须从整个社会的运行方式本身上去除掉那些弊病的源泉。

我们不清楚，当无产阶级的革命胜利，无产阶级建立的临时性政权的权力伸及农村时，农业资本主义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受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影响的小农还剩多少。但是，我们要清楚，一方面，农民阶级作为同样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群众的一份子，是值得与无产阶级建立同盟关系的力量，但是绝不能因为百年前迫于当时特殊的局势与国情而采取的道路去扭曲当下的现实。当下中国的条件显然更适宜于城市无产阶级革命为主。另一方面，绝不能因为农业资本主义化的弊端而去否认它的一切积极的作用，也绝不能因为它带来的苦难而号召农民回到那个自然经济的阶段。农业，就像其它一切生产部门一样，必须置于统一的计划经济调配之下，让农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成为供给整个社会前进的养料，而不是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手段。这对于农业工人来说，是相对容易接受的，而对于尚且和自然经济有所关联的农民来说，则可以在稍微保留一些过去的因素（如物质激励等）的前提下，对其进行集体化的改造，让他们不再是原子化的个体，而是被社会看作同一个劳动力被共同地为了整体的福祉使用。

目前，中国资本发展陷入疲惫，乡村全面振兴还在进行中，但农村贫穷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中国为经济增长投入了大量财力，但收效甚微。未来的农村，必定不是光明的。为中国输血几十年的农村不再像以前那样充满“希望”，已经被贪婪的资本家竭尽榨干。未来的农村或将持续动荡不安，贫穷的农民工必将再次举起他们的镰刀锤子。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XVIII

## 战争不是意外：帝国主义危机下的全球冲突与反战觉醒

作者：田野



### 燃烧的世界

当前世界各地冲突频发，具体体现为大国和地区强权之间矛盾的升级。这些冲突包括中美博弈、中日关系紧张、俄乌战争、中东局势以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长期冲突等。这一系列冲突并非为一个个孤立的事件，而是全球资本集团、权力体系之间矛盾的集中表现。

首先，中美两国博弈的日益加深深刻的影响了世界局势。目前中美在经济、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进行全方位竞争。例如，自贸易战以来双方互征高额关税的行为就是一场无声的较量：从数据上看，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平均关税达 47.5%，覆盖所有中国商品。而中国对美平均关税也在 31.9% 左右；在科技上，美国对中国实施芯片出口管制以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比如说美国在 2022 年 10 月限制向中国出口高级芯片及设备，且随着科技竞争的加剧，美中双方的政策也在不断调整；在地缘上，美国加强了印太军事存在，这一行为引发了中方警惕。在西太平洋，中美军机对峙频繁 - 2021 年以来中国军机对美军机进行近 200 次危险拦截，若包括美国

盟国飞机，则达 300 次，这些对抗都在显示中美矛盾的日益尖锐。

其次，中日两国随着高市早苗的上台摩擦不断。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历史认知和领土，如钓鱼岛问题上的举措引发中方不满，还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言论被重提更加程度上加剧两国的矛盾；另一方面，日本大幅提升军事能力：2023 财年日本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 6.82 万亿日元，约 514 亿美元，比上年暴涨 26.3%，约占 GDP 的 1.19%，并计划到 2027 年提高到 GDP 的 2%。日本还追随美国限制对华高科技出口，比如自 2023 年 7 月起限制 23 种半导体设备对华出口，在安全上日本融入美“印太战略”。中国则加强在东海和台海的军事存在。双方在安全领域日趋警惕，历史与现实交织令矛盾升级。

俄乌战争及其外溢影响也是目前国际冲突的主要事件之一，从 2022 年 2 月爆发的俄乌冲突至今持续，对地区和全球造成深远影响。这场战争造成的惨重伤亡截至 2025 年中，乌克兰至少 13,580 名平民丧生、34,115 人受伤，其中 716 名儿童遇难。战争还引发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全球登记乌克兰难民约 690 万人。冲突外溢冲击全球经济：乌克兰和俄罗斯是粮食和能源出口大国，战争导致粮食和燃料供应中断。2022 年初战争爆发时，小麦价格一度骤涨 50%，推高全球食品价格；欧洲则面临能源危机。地缘上，俄乌战争加重了俄罗斯、白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国家的对峙态势，北约东扩与俄罗斯安全关切矛盾凸显，这次战争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全球通胀上行、地缘格局对抗加剧等。

同样，伊朗问题与中东格局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伊朗核问题及地区影响力使中东局势长期紧张。2018 年美方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对伊制裁后，美伊对抗升级。伊朗则在制裁下加速核计划：截至 2025 年初，伊朗已累积约 274.8 公斤浓缩至 60% 的铀（比 2024 年底增加近 50%，且距核武器所要求的 90% 仅“一步之遥”）。这一发展引发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强烈关切。此外，伊朗通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政府等扩大地区影响，与以色列、沙特等形成博弈。中东整体格局因此受到伊朗因素牵动：2023 年虽然在中国斡旋下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缓和矛盾，但 2025 间，以色列通过暗杀、间谍活动、恐怖袭击、军事占领等手段逐渐摧毁了伊朗扶持的抵抗之弧，并随着美国下场直接轰炸伊朗核设施后，中东格局越发复杂。

此外必须要提及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长久以来一直有大大小小不断的冲突。2023 年 10 月 Hamas 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正面开启战争冲突。截至 2023 年 12 月中旬，加沙已有超过 20,000 名巴勒斯坦人遇难，其中约 8,000 名儿童、6,200 名女性这一数字到冲突后期更大。加沙城市成片废墟，医疗系统崩溃，被联合国称为“人道主义危机”。以色列还在约旦河西岸打击巴勒斯坦示威者，地区局势高度紧张。同时阿克萨洪水行动中也造成 1200 名以色列人的死亡以及双方的人质事件。巴以冲突的加剧不仅是民族宗教矛盾，更牵动了大国博弈。美国等西方国家力挺以色列、伊斯兰世界的各政府群情激愤。这场冲突凸显了殖民遗留问题与冷战以来帝国主义介入交织的复杂性。

这些冲突表面上发生于不同地区、涉及不同主体，但本质上都源于当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下的霸权竞争和利益争夺。各国统治阶级为争夺市场、资源和地缘优势，不

惜挑起战争对抗。这直接反映在全球军备竞赛上：2023 年全球军费开支飙升至创纪录的 2.44 万亿美元，同比实增 6.8%，为冷战后最大年度涨幅。美中俄等大国军费连创新高（例如美国 9160 亿美元、占全球 37%；中国 2960 亿美元、同比增 6%；俄罗斯 1090 亿美元、激增 24%），地区强国也竞相扩军（日本 2023 年军费增长 11%，以色列增长 24%）。全球资本和帝国主义秩序的矛盾正在通过这些冲突集中爆发，战争已经成为体系危机的常态性产物。



战火中的加沙地带

## 全球抗议浪潮

需要关注的是，在这种复杂的国际冲突升级下，反战与反帝运动越来越声势浩大。自 2023 年 10 月以来，全球已有近 4.8 万场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占同期全球示威总数约 15%。抗议浪潮横跨欧美、中东、亚非等地，体现出反战反侵略情绪的跨国扩散。随着战争影响的扩大，世界各地普通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表达反战、反帝立场。从欧洲、美洲到中东、亚洲，跨国界的反战示威此起彼伏，形成了 21 世纪以来少见的全球和平运动高潮。反战抗议并非局限于某一国，而是在全球范围多点爆发。在西方，有伦敦、巴黎、纽约等大城市的游行集会；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群众更是纷纷上街响应。从 2023 年 10 月加沙冲突爆发到年末，据冲突数据库统计，短短三周内全球就发生约 4,200 起与巴以冲突相关的示威，遍及近 100 个国家，占同期全球全部示威事件的 38%。此后几个月里，示威继续扩大，到 2025 年初累计接近 4.8 万起。例如，2023 年 10 月 28 日英国伦敦出现数十万人的游行，人们高举标语要求本国政府呼吁加沙停火；同一天，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也有数十万民众集会，土耳其总统亲自出席声援巴勒斯坦。此外，从马来西亚吉隆坡到南非约翰内斯堡，从加拿大多伦多到澳大利亚悉尼，各大洲主要城市皆可见反战示威的身影。可以说，此轮反战抗议是真正全球性的群众运动。

此次反战运动的参与者以普通民众为主体，涵盖学生、劳工、移民社群和各界进步人士。许多游行并非政党政府发动，而是由草根组织、自发联盟发起。例如，在欧美一些游行中，大学生、教师工会、反战 NGO 等共同组织游行；中东地区则有宗教团体和职业工会号召大众上街。在 2023 年 2 月德国柏林的一场示威中，就有约 1 万人聚集布兰登堡门，由左翼政治家和和平活动家组织，呼吁停止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尽快和谈。“不要我们的战争”“谈判而非升级”等横幅反映了普通劳动者不愿充当大国博弈炮灰的心声。各地抗议者主要是关心和平与正义的平民百姓，他们并非任何西装革履、在议会或政府机关穿行的政治精英，却用实际的政治行动表达了对战争的愤慨。



## 全球的反战运动热潮

尽管背景各异，但各地反战示威的诉求高度相似，集中在以下方面：其一，呼吁立即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如“Ceasefire Now！”成为了欧美反战游行中的主流口号）；其二，反对军事扩张和武力介入，要求停止向战争输出武器、反对建立新的军事同盟；其三，反对外来强权干涉别国内政，强调各国人民自决权利。例如，美国的反战人士既要求停火也反思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传统。在中东国家，游行则把矛头指向以色列的侵略和西方的偏袒干预。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巴勒斯坦”成为近期全球反战抗议的重要象征性口号。在伊斯兰国家，大众挥舞巴勒斯坦旗帜，高喊口号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反帝斗争的焦点。但同时，反战运动并不止步于巴勒斯坦：许多示威者也反对其他冲突（如也有欧洲民众举牌反对俄乌双方的持续战争、谴责北约东扩导致紧张）。这些抗议的共同呼声是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无论冲突打着何种旗号。

值得强调的是，此波反战运动首先建立在朴素而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感之上。对于绝大多数走上街头的普通人来说，反战并不是高深的理论，而是一种直观真切的情感冲动：亲眼目睹儿童在爆炸中丧生，怎能不义愤填膺？听闻无辜家庭妻离子散，怎

能不感同身受？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战争阴云笼罩，怎能不对无休止的冲突感到厌倦和恐惧？正是这种对生命的同情、对暴力的本能厌恶，促使来自不同文化、信仰、国籍的人们团结起来，高喊“停止杀戮”“我们要和平”。例如，在伦敦的游行队伍中，抗议者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在这里不是为了哈马斯或别的什么，这是为了保护巴勒斯坦人的生命、捍卫基本的人权”。美国的民调也显示出民众内心的道义抉择：在加沙战火最猛烈的11月，有68%的美国受访者赞成立即停火并通过谈判解决——这与其政府拒绝停火的立场形成鲜明反差，反映出公众对平民苦难的关切已经超越政治阵营。可以说，这种对弱小者的同情、对战争浩劫的厌憎是超越国界的普遍人性，是各国反战运动最广泛、最深厚的群众基础。

## 共产主义者的目标和任务

冲突升级激发了当今世界规模空前的反战浪潮。从西方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人民以游行、罢工、请愿等方式发出共同的呼声：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干预，要求和平与正义。这股全球民意汹涌澎湃，给好战的统治者以强烈震撼。然而，仅有情感和呼喊还不足以真正阻止战争机器的运转。面对群众运动的新高潮，我们作为共产主义者，应当如何看待和引导这种反战热情？

当前席卷全球的反战情绪，体现了人民反对侵略、向往和平的正义立场。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首先充分肯定和尊重群众这种朴素的反战情感。它表明广大劳苦大众并不愿意为帝国主义利益送命，并对滥杀无辜有天然的道德反感。可以说，这种人道主义立场是宝贵的群众基础。即便长久以来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史告诉我们统治阶级从不会真正回答群众的呼吁，我们也坚决应当与群众站在同一边、高举反战旗帜、与人民并肩斗争，而绝非站在居高临下的位置加以嘲讽或否定。

然而，共产主义者也必须指出：单纯的情感和道义呼吁本身并不能终结战争的循环。如果缺乏对战争背后结构性原因的科学分析，反战运动就容易停留在表面的“祈求和平”或道德谴责上、难以触动发动战争的深层机制。历史表明，仅靠群众的善意或请愿是无法阻止帝国主义发动新战争，资本主义体系使得战争具有周期性和必然性。正如列宁所揭示的：“‘帝国主义时代’使目前这场战争成了帝国主义战争，它必然引社会主义到来以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弗·列宁《论尤尔乌斯的小册子》）也就是说，在私人资本主宰的现行秩序下，帝国主义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又一个战争，任何一次停火或和约都只是暂时的喘息。对此残酷规律，反战群众或许感受未深，但马克思主义者有责任揭示其真相。

因此，当务之急是在反战运动中注入对帝国主义结构的认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首先要将反战情感提升为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要向群众说明，现代战争频发并非偶然，也不简单是某些国家领导人的“好战成性”所导致，而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本身。在这个体系下，大国为了争夺市场、资源和地缘优势不可避免地诉诸武力。“弱肉强食”的资本争霸是战争真正推手。例如，不论是美国在中东发动的海湾战争与“反恐战争”，还是俄罗斯与北约在乌克兰的角力，说到底都是垄断资本和霸权国家在争夺势力范围。帝国主义列强视别国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为石油、领土、军售等利益反覆发动侵略。这一点可从客观数据看出：战争已成为资本牟利的巨大来源。2023年，由于乌克兰和中东战争，全球百强军火公司武器销

售总额达到 6,320 亿美元，较前一年增长 4.2%；其中中东和俄罗斯的军工企业军火收入分别猛增 18% 和 40%。美欧军工巨头也利润丰厚，虽因长期合同增速略慢，但仍占据榜单前列。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资本主义体系下，战争有利可图，是垄断资本维持增长的“生意”。再看国家层面，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头号强国，穷兵黩武耗资惊人：自俄乌冲突起至 2024 年底，美国国会已批准约 1742 亿美元援乌资金，含军援和经济援助，相当于用于国内医疗、教育等民生开支的巨额资源被引向了战争泥潭。这些事实帮助群众认识到，资本逐利和霸权野心才是战争不止的深层原因，反战就必须反对这种以牺牲人民为代价换取利益的帝国主义制度。

共产主义者同时还必须反对将战争原因简单化为民族或宗教仇恨。帝国主义常用民族主义、宗教对立来掩盖自身责任，挑动人民彼此仇杀。共产主义者要揭露这种谎言，把斗争焦点从“民族教派对民族教派”转变为“统治阶级对被压迫阶级”。例如，在巴以问题上，既反对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也指出普通犹太人与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本无不可调和矛盾，真正使巴以对立长期化的是帝国主义对中东的瓜分和以色列统治集团的沙文主义政策。同样，俄乌战争被宣传为俄乌民族仇恨或民主对威权之战，但抛开表面，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皆为大国博弈牺牲品，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寡头争霸才是冲突动因，而两国工农大众在战争中流血、寡头精英却坐收地缘利益。我们要帮助群众透过现象看本质：各国劳动人民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本国和他国的剥削阶级。正如列宁所强调的“我们懂得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懂得不消灭阶级，不建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消灭战争，再就是我们完全承认国内战争即社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弗·列宁《社会主义与战争》）。只有认清这一点，反战运动才能避免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陷阱，不会被某些统治者利用来服务另一种沙文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国士兵

我们还需要将反战运动引向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从呼吁停火走向反对帝国主义体系。当前许多示威的直接诉求是停火止战，这是正确而迫切的。但共产主义者应当引导运动更进一步，思考如何杜绝战争周期性爆发的根本之道。我们要向群众阐明：只反对一次具体战争还不够，必须反对引发战争的一切帝国主义秩序。例如，在要

求加沙停火的同时，要质疑美英等大国对以色列长期的军事援助和双重标准；声援乌克兰和平的同时，也要反对北约军事扩张和新冷战思维。只有把反战和反帝有机地结合起来，运动才不会被某些资产阶级政客收编为一场道德秀，而是会形成对现存战争体系的真正挑战。这方面已有积极苗头：一些西方左翼团体在游行中同时高喊“不给以色列一分钱”“也停止北约战争策动”等口号，把反战提升到质疑本国帝国主义政策的高度。这是可喜的变化，我们应推动更多群众认识到“在当今的世界，没有帝国主义就没有战争”，反战就要反帝的道理。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一个革命党要将零散的反战力量积累为反帝革命的长期力量。共产主义者不会满足于一次次自发的街头抗议，而是着眼于培育持久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力量。当前的反战浪潮提供了团结先进工人、青年学生的绝佳契机，大家因反对同一场战争走到一起，更应继续组织起来，反对导致战争的一切不公制度。需要运动中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把反战的正义愤怒转化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意识，并把同路人吸收到群众组织、工人协会乃至革命政党中来。正如列宁所言，“这就向我们表明：“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甚至原始的骚乱本身就已表现了自觉性在某种程度上的觉醒，因“工人已经不像历来那样相信压迫他们的那些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而开始……感觉到（我不说是理解到）必须进行集体的反抗坚决抛弃了奴隶般的顺从长官的态度”（弗·列宁《怎么办？》）。没有革命组织的建立和壮大，反战诉求就缺乏实现的抓手。最终，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帝国主义战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全球建立社会主义联盟。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灭产生战争的利益驱动和霸权竞赛，为各民族带来真正的和平可能。历史上，一战期间俄国十月革命使俄国退出帝国主义大战，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的口号；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帝国主义的肆意动武。展望未来，只有在全球范围内结束帝国主义统治，才能从源头上消弭战争祸根。这是反战运动最终需要达成的目标。我们应当向最先进的群众阐明这一远景，并为之努力：在反战斗争中锤炼出革命先锋队，积蓄力量，争取有朝一日埋葬滋生战争的帝国主义制度。

我们拥护当下高涨的反战运动，并致力于将其引向更高层次的反帝、社会主义方向。我们不会试图去替代群众发声，而是要与群众一同学习和进步，把自发的反战情感升华为对帝国主义的深刻觉悟，并指导实践行动。眼前争取停火、制止屠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且艰巨的任务是在长期内实现政治觉醒和组织积累，以便最终能发动革命彻底终结战争机器。正如列宁警告的，在社会主义胜利前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将“不可避免”，这一预言在当今频仍的冲突中再次得到印证。要打破这宿命，就必须以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来开创持久和平的新纪元。让我们把眼前的每一次反战呐喊，都化作迈向这一目标脚步。只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帝国主义，战争的梦魇才能从地球上消散，人类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与解放。正如反战游行中的一句标语所言：“No war but class war（除了阶级战争，再无他战）。”这正是我们共产主义者反战运动的期望：让反对帝国主义统治的阶级斗争之火熊熊燃烧，直到战争温床彻底被清除的那一天！

**（责编《共产主义者》编辑部）**

# 共革阵安全手册（节选）

**注：先前推荐使用的 mojie 因协议问题已不再安全**

## 关于 VPN

如果要进行安全的通讯，在内网是不可能的，内网也就是在中国长城防火墙（GFW）之内的网络，GFW的作用就是将中国的网络限制在防火墙内，让讯息和数据都在国内被审查机制所审查，至于中共网络审查机制，我们将会在小节（5）中讲到。VPN 为我们提供了能够“翻”出去的功能，也就是将我们的流量传输到 VPN 服务器中，经过加密手段和隧道技术将我们的真实 IP 隐藏，并建立一条“管道”使得我们的流量能与墙外的服务器进行交互，因此，安全的 VPN 至关重要，网络上一些自称“免费”“可靠”的 VPN 很有可能是非常不安全，这些 VPN 服务商，很可能是属于国安和网警的，或是用着过时的不安全的加密协议（我们合理的怀疑，有些加密协议根本没有其加密效果），事实上，很多网警会冒充“建议者”去引导一些人去购买这些不安全或是属于网警的 VPN 服务商，也自然的，我们的上网数据就会被一览无疑了。但是也有一些 VPN 加密技术，在过去很安全，但现在已经能够被最新的审查机制所识别或是封禁的了。比如大名鼎鼎的 Tor，也就是所谓“洋葱”（因为他的图表就是一个洋葱），其流量已经能被如今的 GFW 所主动侦测到并封禁识别，实际上，早在 2011 年（没错，是在 14 年前），Tor 官方就发出了一个工单，报告了在中国大陆使用 Tor 流量被切断的事件。而在 2020 年左右，仍然可以在内网看到有人建议使用 Tor 来翻墙上网，他们的身份是好是坏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够确定的是，我们不应该使用 Tor。那还有没有已经被侦查出特征并能封禁的流量呢？Shadowsocks 协议是个很好的例子，在 2019 年就有论文指出，GFW 已经可以识别它并封禁相关服务器。如果我们单看 Shadowsocks 它本身的设计，似乎是非常精密且完美的，但它依旧在几年前就被破获。同样的，如 VMess，也被报告出会被破获的风险，而自从 Vmess 被破获后，很多人转向了 Trojan 流量，但很明显的是，中共也积累了足够的样本去侦测 / 破获 Trojan 流量，因此，在选择 VPN 服务商时，要避免购买那些加密协议已经不安全的 VPN。现在可供我们选择的，如 Vless 流量，或者经过修改的其他流量都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也希望同志们可以多去关注这一方面的帖子和论文。我们能猜测的是，在当前的一段时间。审查机制对于加密协议的侦测会越来越紧。但我们也能够相信，有同样多的技术人员在第一线与 GFW 对抗，所谓“哪里有压迫，哪里有反抗”。对于 VPN 的选择，我们不能倒在了第一关，但即使我们穿过了这个无时无刻在进行的没有硝烟的网络战场，之后也有无数的东西在等着我们。

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缺乏一个的全国统一的组织，一盘散沙、各自为政。革命运动被悲观主义与冒进主义笼罩着：当前中国的左派们要么充斥着“理论家知识分子”，读着几百年前的老书怀古伤今，为死人而战，判断过去人物、批斗过去事件，活在过去；要么则是一群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和冒进派，在建成坚实的政治基础前把自己暴露在广大敌对运动与国家机器的监视前。

当下大多数中国工人运动之组织之间的内斗，由于种种山头主义氛围的影响，绝非进步趋势和落后趋势的斗争，也并非真正严肃的政治讨论——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左派间的所谓斗争几乎全部变成了人身攻击和毫无实际政治意义的过家家，不仅在群众眼中留下一一种极为幼稚的政治形象，更是离间广大工人阶级的热心支持。在这样陷入恶性循环的背景下，许多本应有机会投著实践的理论纲领因为背离了工人阶级运动的现实支持，而不得不蜕化为纯粹的空谈。

什么是属于全体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革命左派的政治纲领？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在中国、东亚和整个寰宇建立起劳动者的政权，实现彻底的劳动者之民主，公有化重要的生产部门、将其产出还于全民，用理性、公平、按需分配的方法有计划地规划协调生产力，让人类得以掌握自然，结束阶级社会的存在以开启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我们追求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和彻底的解放，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摆脱山头主义和过去革命者间一切阻挠我们前进的阴霾，建立起一个以民主对抗宗派，以党的统一和集中领导真正对抗国家机器的、属于工人阶级的先锋之政党！

我们的党必须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党——民主集中制是“自由讨论，一致行动”，即革命党党员通过民主方法决定党的政治路线，并有义务绝对遵循业已通过的决议。革命党的建制不允许任何个人主义存在——任何党员皆不得违背集体的意志，任何革命者都不得在党的民主程序以外违背党的决策。

我们的党必须是摆脱一切惰性的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有活力的党员团体，再严密的党纪和党章都是一纸空谈，从基层到干部的一切党员都必须充分组织起来，在党的建设中共同承担政治任务，以强大的基层和健全的干部实现持续的扩张与发展。

我们的党必须是面向群众的党——共产主义革命者支持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自发反对剥削阶级与资本主义统治集团的动员，并积极谋求将其引导至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道路上。革命左派以政治理论为纲，推动建立涵盖全体劳动者的工会和工人团体，并希冀通过广泛的革命组织动员一切无产阶级参与建党和促成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理论武器剥除盲动和个人主义倾向的党——只有通过回归最彻底、最现实的分析，方可实现对于革命的世界观、政治纲领、方法论等必要理论武器的辩证统一；革命党人必须以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纲，消除各革命团体间的狭隘分歧和意识形态对立，促进以革命的方法论为基础的政治统一，并以此铲除任何借“革命”之名行宗派割裂、分化革命力量的行为。

我们的党必须是以全体中华无产阶级为基础，追求寰宇各国革命的党——革命党人绝不能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下统治集团机械划定的国家与行政疆域限制革命组织的发展。中华国家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必须支持全世界中国和华人无产者在绝对联盟、甚至完全统一的革命组织内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革命党在建制上跨越资产阶级国家疆域的统一绝非沙文主义，而是求得革命团结的唯一途径。一个属于华人的跨国革命党也绝非寻求超民族主义，而是借助同先进的中国革命者间友好、坦诚的结盟，将我们的革命传遍寰宇内的五湖四海，帮助全世界受剥削压迫的人民寻得解放！

在此，我们呼吁建立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共产主义革命党，一个代表劳动者的先锋队，一个铲除一切懦弱和盲动的组织，一个能够真正对抗国家机器、资产阶级建制和血腥镇压并寻回我们革命左派已经丢失数十年的纪律、纲领和统一组织的政党。

我们是建党者，是先锋队，我们呼吁所有想要开创更美好明天的革命者与我们共同奋战。  
为了有朝一日，我们能够亲眼见证我们以双手开拓的、属于新世界未来的晨曦！

官方网站:

[bolshevikleninists.com](http://bolshevikleninists.com)

Telegram (电报) 频道:

<https://t.me/revcommunist0cn>

电台 Youtube 频道:

<https://www.youtube.com/@revcommunist0cn>

Instagram 账号:

<https://www.instagram.com/revcommunist0cn/>